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环境与历史

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

— William Beinart Peter Coates

[英国]威廉·贝纳特 彼得·科茨 著 包茂红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环境与历史

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 / (英) 贝纳特 (Beinart, W.), (英) 科茨 (Coates, P.) 著; 包茂红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3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The Taming of Nature in the USA and South Africa

ISBN 978-7-5447-0741-1

I. 环… II. ①贝… ②科… ③包… III. 环境—历史—对比研究—美国、南非 IV. X-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2094 号

Copyright © 1995 by William Beinart and Peter Coates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8-406 号

Yilin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译林出版社独家出版并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
作 者 [英国]威廉·贝纳特 彼得·科茨
译 者 包茂红
责 任 编辑 马爱新
原 文 出 版 Routledge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电 子 信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 团 网 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375
插 页 2
字 数 119 千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741-1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握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圈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遂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前　　言

绿色问题正在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和政府政策关注的前沿问题。当我们不顾一切地冲向第二个千年之末时,许多绿色问题仍然被看成是人类破坏能力的新近突然显现。然而,环境变迁的进程深深植根于过去。对危机的感知和应对这些危机的尝试同属于人类历史的核心内容,虽然可能曾被忽略。现在,从历史的视角来探讨当前的环境困境以及人类的应对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最让人着迷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领域。

正在兴起的环境史特别适合使用比较研究方法,它能打破政治、地理的界限和对相互关联的历史研究原始资料进行画地为牢式分割的学科分野。要探索人类经济和文化的生态影响,特别有收获的研究领域就是欧洲人在过去500年席卷的那些地方。本书是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中,从跨国家的环境角度尝试研究历史的第一批著作中的一本,具体而言,就是对美国和南非进行比较研究。

《环境与历史》确实是合作的结晶,是许多非正式的讨论滋养出来的。尽管我们两人的专业知识领域差异甚大,但这些讨论常常会撞击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性。在这个项目即将结束时,这两个地区的历

史聚合所产生的共鸣仍在继续着。在分头撰写三章的草稿之前，我们对每一章的内容从头到尾进行了仔细讨论。最后的定稿是我们多次在蓝色屏幕前研讨的结果。（本书构思于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这样的房间很适合环境史学家，我们通过观察户外白桦树和苹果树上四季的变化来更新自己的心情。）老实说，本书的大部分段落——甚至句子中都渗透着我们两人的思想，都打上了我们两人风格的烙印。如果美国方面的内容有时稍微多一些，那只反映了近年来对美国的研究更多的事实。

我们感谢格兰齐拉和特罗斯在本书写作最紧张的时候给予的支持。还要感谢简·卡拉瑟斯对书稿做出的详细评论。

图号：GS (2008) 67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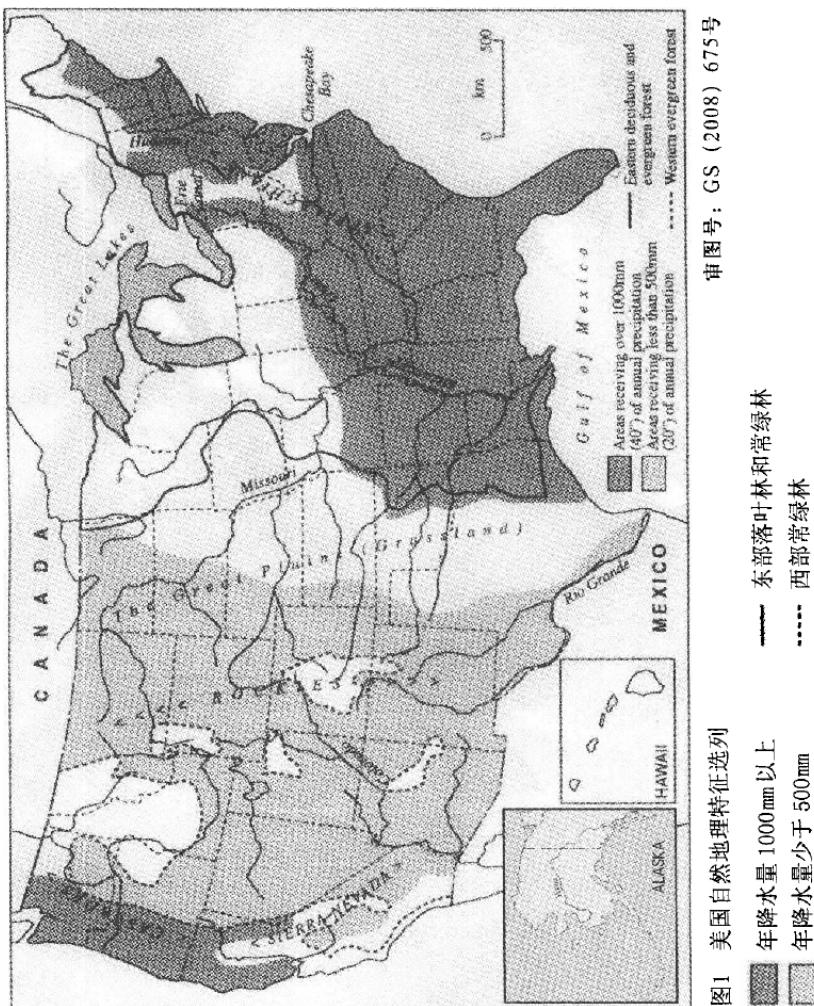


图1 美国自然地理特征选列

— 年降水量 1000mm 以上
---- 年降水量少于 500mm
—— 东部落叶林和常绿林
.... 西部常绿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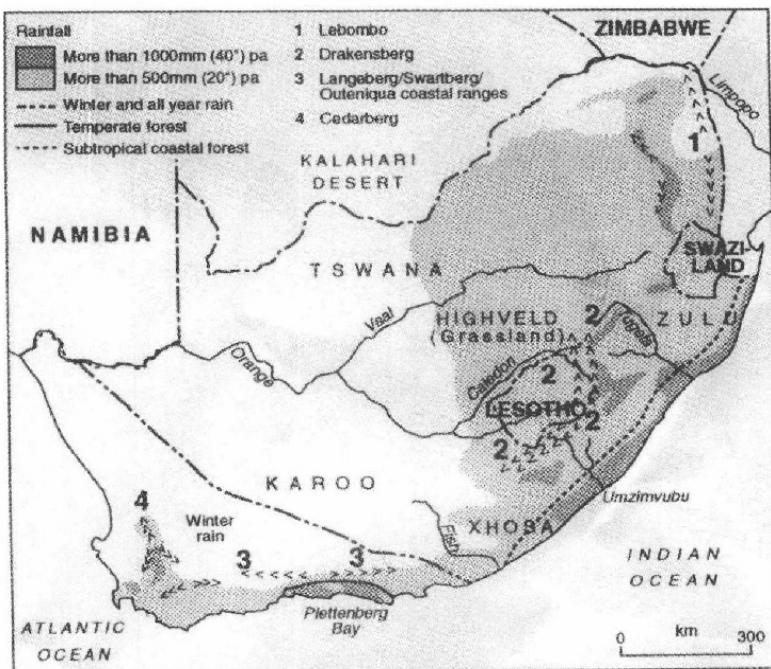


图2 南非自然地理特征选列

审图号: GS (2008) 675号

- 年降水量 1000mm 以上
- 年降水量 少于 500mm
- 冬季和全年降雨
- 温带森林
- 亚热带海岸森林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环境史的特点:美国与南非的比较	001
环境史的特点	001
比较	008
边疆环境	011
第二章 狩猎和动物:从猎物到野生动物	022
前殖民时期的狩猎	023
殖民者的狩猎	026
狩猎管制	034
第三章 树木的兴衰:森林、采伐和林业	044
树木与人	045
林业与资源保护	054
第四章 农业:无限和有限的开发	065
无限的开发	065

资源保护主义的政府	076
第五章 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	
荒野的重新估价和自然化	091
非功利性保护主义、旅游业和对自然的描述	091
生物中心主义与公园政治	102
第六章 从资源保护到环境主义运动和其他	117
环境思想	117
种族、环境主义与社会不公	124
后记：驯化野性	135
索 引	145

第一章

环境史的特点：美国与南非的比较

环境史的特点

环境史致力于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其他组成部分的各种对话，它关注的焦点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这种新视角是史学女神（克里奥）的新暖房，它认为人本身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游离于自然之外。正如克罗斯比所强调的，“人在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或资本家或其他什么之前，首先是一个生物体”（1972:xiii）。历史学的大多数其他分支学科不论涉及高层政治还是经常被遗忘的百姓，往往都只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史的出发点与这些分支学科的基本假设大不相同。用克罗农的话来说，“环境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把研究范围从人类制度（经济的、阶级的和性别的制度，政治组织，文化礼仪）扩大到给这些制度提供舞台的自然生态系统”。他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历史“必然要把一系列非人类的因素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而在此之前，这些因素即使出现在历史叙述中，通常也只处于历史分析的边缘位置”（1983:vii）。

尽管这个分支学科是新兴的，正在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但它

在学术上仍有着深远的渊源,许多学科为它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包括历史地理学、人类生态学、边疆史、法国年鉴学派的“整体史”,以及关系不那么明显而自觉的非洲史和人类学。美国人通过对本国历史的研究促使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名列前茅。最初,北美作者主要关注对自然的掠夺和自然保护运动的英雄般的崛起。他们热衷于研究自然资源政策及其保护制度和机构,热衷于研究诸如亨利·大卫·梭罗、约翰·缪尔、奥尔多·利奥波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出现

- I 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因为环境史研究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现代环境运动兴起及环境问题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这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不过,这种形式的环境史仍然局限于已有的政治史、行政史和思想史的视角之中。

当美国历史编撰学影响南部非洲环境保护研究的时候,前大英帝国的环境史学家表明要反对这种“美国佬帝国主义”的表现。格罗夫(1994)考察了英国扩张激起的环境关注的悠久历史,指出这比美国作家乔治·珀金斯·马什那本很有影响的名著《人与自然》(1864)(参见第三章)要早。这说明存在着一个跨国的、相互联系的、对相似的环境状况做出反应和思考的认识体系。

与此同时,环境史的研究范围也在其他令人兴奋的方向上扩展开来,其中大多数研究的是环境的历史而不是环境主义的历史。在当前相对凸显的内容,主要是在强大的、充满焦虑的现代环境主义驱使下,特别仔细地考察现代西方社会破坏环境的能力。一些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环境史著作探讨了自十五世纪末以来欧洲扩张造成的多方面的、全球性环境破坏,不过,它们把环境变化等同于环境损失。克罗斯比认为,殖民主义研究中一个有待开垦的领域就是研究环境变化,他强调生物生态因素在世界温带地区的欧洲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克罗斯比还指出,他所谓的由植物、动物和疾病组成的“生物旅行箱”在这场全面的景观替代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学者们不但以白人（及其非人类的盟友）如何控制自然界为研究重点，而且对生态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奇特行为如何影响人类社会越来越感兴趣。克罗斯比研究生态帝国主义的著作也是呼吁把自然界纳入历史解释中的一种尝试。对于迫切希望写出这种环境史而不是满足于写一个动物保留地、国家公园或环境保护运动著名人物的历史学家来说，这里是问题与挑战并存。无论是从字面理解还是从象征意义上讲，这都需要一个走出书斋的开放的研究取向。阐明自然界本身的变化不仅需要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训练中得到的分析工具，而且需要来自植物学、动物学和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全方位的视野似乎需要拥有比普通科学家更多的技巧。掌握这些不同的专业知识和方法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难以完成的工作。但作为通才，历史学家能在讨论环境变化及其连续性中把握住核心问题。²

我们应该能对生态破坏的特征和程度做出一些评估。在目前的环境史研究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核心概念，那就是退化。然而，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会改变本身从未静止过的自然界的构造。把所有变化看成衰退的批评都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不论在什么经济或意识形态体系下，人类生存都具有合法性。区分退化（尤其是长期的）与变迁或转型（这是较少感情色彩的表述）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然界已被人类打上了深刻而复杂的烙印，要探求一种能得到承认、可以定义的自然很可能是徒劳无功的。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棘手的现实。其实，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稳定的生态系统的概念可能更多是形而上学的而非实际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底线，企图描述环境变迁的特征就会更加困难。

自然的概念永远都是文化的表述。对欧洲人来说，这种表述也许不会令他们震撼深思，因为欧洲的景观本身就差不多是一个混合体。但在新世界——起码对欧洲人来说是“新”的世界，这种差别不但对欧洲殖民者和来访者来说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对他们的后代来说也是如

此。因此,后来在表现荒野崇拜的描述中,可以找到对那种没有遭到人类社会改造的原始自然的想象和偏爱。生态关系肯定有自己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可以看成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动力学体系,但并不一定是不受人类干预的稳定动力学体系。生态相互作用的环境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类的影响。我们不能决定狮子怎么吃或吃什么,但我们肯定能限定它在哪儿吃。

当前的环境史并非仅仅沉溺于对现代环境破坏的(常常是)痛苦的思索。前工业化时代的人也得到了重视,对他们在环境问题上发挥的作用的判断是相当矛盾的。在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存在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那就是认为前殖民时代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然是和谐和平衡的关系。这种思想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一种是他们被指责为不能把自然资源资本化的“粗野、懒惰的野蛮人”;另一种是十分赞成甚至崇拜他们,特别是在采用当前的绿色思想后。许多今日流行的环境主义文献都把前殖民社会、尤其是“石器时代”的土著美洲人和桑人^①描绘成“自然之子”。他们只是轻微地利用土地,从未达到足以破坏环

3 境的技术水平或人口压力。

专业的人类学和人种史对这种描述进行了更多批评,转而把土著人更多地看成是调节者,完全有能力使自然界为他们所用,纵然土著的礼仪、流动性和生活方式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限制了其行为对环境的破坏作用。我们应该牢记,北美的土著本身就是闯入新世界的入侵者。在1.2万年(或许是3万年)前,他们从亚洲迁到阿拉斯加,再从阿拉斯加向南扩散,一直到火地岛。狩猎采集者对南部非洲的占领至少与北美当地人从阿拉斯加南移到火地岛的历史一样悠久,但说班图语的非洲

^① 几千年前就在南部非洲建立的、最初的狩猎采集社会,后来被非洲人扩张部分地取代。

人^①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穿越了非洲次大陆,在不到 2000 年前占领了南部非洲。

这些超乎寻常的扩张想必是由人口增长、机会主义的掠夺和当地资源的耗竭促成的。美洲、澳洲和其他地方的古代移居者至少要在最近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发生在更新世的大型动物的灭绝负一部分责任,这种灭绝要么是过度狩猎造成的,要么就是对植被进行持续大面积的烧荒造成的。克罗斯比把这些早期移民刻画成随心所欲的、富有侵略性的殖民地开拓者。在最近为纪念哥伦布航行这一震撼世界的事情五百周年而举行的活动中,既有普通的庆祝,也有谴责。或许我们也应该为跨越白令大陆桥举行纪念活动。

两大半球相接触之前的土著社会肯定不是游离于变化进程之外的“没有历史的民族”(Wolf, 1982)。他们与自然共存的能力遭到怀疑,他们至少也面临着生存和毁灭的潜在危机。毁林恐怕是十三世纪美洲西南部阿纳萨齐农耕社会崩溃的主要因素,其文化越来越依赖方圆五十英里通过严密的朝贡体制供应的木材,可惜的是这种体制最终也被打破了。^② 同理,大津巴布韦(坐落在今津巴布韦疆域中心的一个古代王国)在十六世纪的衰落可能也是在心脏地带周围过度放牧了数世纪造成的。土著与自然的关系很可能经历了不同阶段:可持续的实践和思想代表着在错误中摸索的结果。历史地理学家克拉伦斯·格拉肯

① 我们使用的“非洲人”这个术语意指在遭遇白人时生活在这一地区已有政治体制中的当地人。在北美,“印第安红种人”这个术语已被抛弃,代之以更敏感的标签“土著美洲人”(Native American),但“美洲印第安人”的称谓即使不在行动主义者的圈子里使用的话,也仍然在学术话语中大方地使用。不过,在南非,“土著”(native)这个词被殖民者所采用,并逐渐披上了种族思想的外衣。长久以来,当地人拒绝使用这个词,他们更喜欢用“非洲人”或“黑人”这样的称谓。

② 现在的无树沙漠曾经树木葱茏,保存在狐尾大林鼠的尿液结晶体中的针叶松是一个证明,这些结晶体取自狐尾大林鼠的巢穴化石。

(1967)指出,尽管所有社会都产生了环境“问题”,但是大多数社会都有一些成员认识到了这些影响的潜在严重性,一些社会还为抑制这种关系失调的方式发生了争论。

在以前的历史编撰学中,土著“牺牲品”在被征服后就不再发挥作用了。许多土著本身也(可以理解地)接受了这个观点,即在白人取得霸权时,他们的历史“终结”了。一种更复杂的历史旨在考察被征服者如何适应新环境、技术和文化输入,并试图为自己谋求一个积极的角色。重要的是要研究十六世纪以来在美洲和非洲与欧洲贸易网络接触后,这些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历史的中断给大平原的印第安人创造了机会,譬如说驯化野马的过程。民间传说和电影中骑在马背上的苏人形象就是殖民接触的产物。在南非山区,索托人养起马匹并培育出自己的矮种马,然后骑着马与布尔人进行战争。在美洲和非洲,马和火器都超越了种族分野,增强了人们的狩猎能力。不管土著在十五世纪对自然的态度怎么样,到十八世纪新的机会和市场很可能改变了这种态度。土著民族后代对“原住民”自然思想的复兴只是一种强有力意识形态的表述,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证明,这种表述对那些对现实失望,而希望从前资本主义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中寻求灵感的人来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资本主义并未激起环境变迁,但大多数研究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环境史学家都非常强调主导文化的经济体制,比较明显的是沃斯特和克罗农。称之为“资本主义”也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在过去五百年发生了演变,并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和剥削^①资源的要求。它对原材料贪得无厌的需求也包括新英格兰的木材,这里的木材早在

① Exploitation(剥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滥用人类劳动力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概念是环境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它通常被当作滥用自然的代名词,但也可以简单指利用。

十七世纪就取代了英国橡树，成为英国海军军需的一个来源。正像养羊和牛的大牧场在澳大拉西亚、南部非洲和美洲不断扩大一样，给欧洲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食品和衣物的种植园也要扩大土地面积。资本主义把自然商品化了，并按新的价值观念解释了自然，它使社会具有专业化的能力，能生产剩余产品并以相当独立于当地自然环境的方式来运作。

迅速的技术变化，尤其是十八世纪末的工业化之后的技术变化，是新经济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为关注资本主义的转型能力的环境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研究课题。并非所有的技术都是新的。⁵ 最基本的工具——火，有助于规范殖民者农业世界以及土著民族的狩猎战略（参见第二、三章）。克罗农评论道，早期到新英格兰的访问者对这样一个事实印象深刻，即尽管有大量树木，但森林在那时“相当开阔，差不多像公园一样”（1983:25）。放火刺激了树木的新生，吸引了动物，这种生产实践与非洲科依桑人的一样。在十九世纪末经过奥兰治自由邦殖民者牧场的旅行者也看到了大面积的烧黑的谷茬，等待春雨后复生。

但是，力图超越自然束缚的欧洲新技术的应用产生了更大影响。在这两个地区，原来被认为毫无价值的内地在技术进步（如钢犁和风车）的情况下得到了重新评价（参见第四章）。沃斯特的著作《帝国河流》解释了水坝和灌溉运河用水怎样让大公司农业在十九世纪末以后占据了美国西部的大面积土地。沃斯特在断然批驳了以个人主义和挣脱束缚为主导的传统边疆概念后，假定了一个等级化的治水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征服自然和土著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不论是以火还是以具体的灌溉渠道的形式表现，技术的威力都取决于科学知识。因此，科学史便以复杂而也许出人意料的方式与环境史结合在了一起，先期涉及一些它所关注的问题。麦茜特（1980）把源于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笛卡尔式知识看成是与环境破坏的逻辑密不可

分的十足的男性体系；她还考察了最近几个世纪对自然的家长制的、机械论的、无机论的和功利主义态度的胜利。

在新殖民世界，科学史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对专家如何努力使资源剥削最大化的研究。布罗克韦的著作《科学与殖民扩张》(1979)考察了植物学作为把商业物种散布到整个大英帝国的一种方式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殖民地植物园已经建立起来，开普敦植物园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正是以这种方式，茶被引进到印度和非洲，枣椰树和柑橘被移植到加利福尼亚。在本书的比较框架内，我们的目标6是让大家尝一尝正在走向成熟的环境史研究成果的独特风味。

比 较

由于重视历史发生的时间和地方的特殊性，历史学家历来比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更少接纳比较研究方法。不过，北美和南部非洲的比较分析已有很长的历史了。比较的核心问题是种族关系和边疆，双方都有令人着迷的对应之处。说到已有的学术成果，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单向的：美国学者把南部非洲当成是考察自己历史的陪衬。^①

种族关系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殖民征服和镇压当地人的结果。尽管奴隶制在南非从未达到它在美国南部的规模，也未发挥如此关键的作用，但这两个殖民社会都输入了奴隶。殖民征服和奴隶制的结合催生了等级制的种族关系体系。在十九世纪也有可能形成不太僵化的体制，但是，这种可能在世纪末面对种族隔离势力

^① 本书主要着眼于后来成为美国和南非的政治单位，但经常涉及北美和南部非洲的其他地区。

时就只好退却了。所以,一些最出色的比较研究著作(Fredrickson, 1981, 1988; Cell, 1982)只是探讨了这一时期白人霸权的形成。

发现比较研究能产生丰硕成果的,不只是专业历史学家。对非洲知识分子来说,美国历史也是他们分析自己种族压迫历史的丰富的灵感之源。十九世纪末的一些非洲人教堂也有非裔美国人的渊源,与此同时,按布克·T.华盛顿模式进行的“自我改进”运动中的一些行为也影响了南非黑人的教育制度(Jabavu, 1920)。带有强烈的泛非主义特点的贾维主义在1920年代着实让南部非洲城市激进派着迷,五十年后在斯蒂夫·比科和索韦托起义时代,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这样的黑人权力政治理论家的著述亦产生了相似影响。

如果说种族关系让白人和黑人都觉得是有可比性的经历的话,那么,边疆扩张就构成了历史研究中的另一流派。南部非洲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陆唯一遭受殖民者入侵的区域,这次入侵发生在1652年(在葡萄牙先驱者之后)——比北美发生类似事件晚了半个世纪。大多数美国边疆史研究都打上了深重的例外论的烙印,但即使它披着温柔、委婉的“移居地”的外衣,与当地人和自然界对抗的美国边疆斗争与白人帝国主义者在南部非洲的作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欧洲殖民者对我们研究的这两个地区的征服只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两个方面,在哥伦布和达伽马之后,资本主义的触角伸到了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⁷

埃里克·沃克对南非边疆传统的分析(1930)明显地借用了美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环境决定论思想(1893)。特纳认为,原始边疆形成了美国激动人心的历史,它也是美利坚民族独特性的源泉。沃克对边疆传统的表达并不像特纳那样乐观,他只是从边疆传统中看到了种族隔离的根源。但是,无论是沃克还是特纳都对边疆对殖民地社会的影响感兴趣。在最近的比较研究中,最著名的是拉马尔和汤普森的研究(1981)。这些研究都承认边疆概念中的种族中心论,

都不再集中探讨移居者的性格,转而更多地研究入侵者和当地人的冲突。关注环境的历史学家能通过探讨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把边疆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任何比较研究都是有限的,如果超越了这种限度,展示相似性就没有用或不可能。此外,我们把两国的历史经验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无意削弱其中任何一个的独特性。这种比较方法也能突出差异性,差异也经常同样有启发性。除了在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上的明显差别外,还有两个特别差异需要强调。

第一,殖民者对南部非洲的冲击比较弱,而美洲却是欧洲殖民者自1492年以来殖民扩张的关键边疆。在这许多为欧洲殖民运动开放的温带新世界中,后来变成了美国(1783)的北美部分地区是欧洲移民的首选目的地,尤其是在十九世纪移民成为大规模运动的时候。

第二,北美土著人比非洲人在面对白人入侵时更脆弱,因为非洲人并不像美洲土著人那样与世隔绝。虽然科伊桑人^①迅速被疾病、战争和竞争击败,但是非洲人总体上有较强的免疫力、经济和人口的动力来应对白人殖民者的征服。与科伊桑人和许多土著美国人群体不同,非洲许多酋邦发展出更多样化的、农耕的、畜牧的和使用铁器的经济。殖民者在这一地区的入侵越是深入,其影响就越是苍白。美国内战(1861—1865)后,殖民者取代了最后残存的、多少有点独立性的土著美国人群体,但在南非,殖民者却不得不与数量占优势的征服对象妥协并共同生活。在1880年代完成军事征服时(Gump, 1994),土著美国人的数量从8 1492年保守估计的500万高点降到了最低点25万。对比之下,南非黑人的数量(此时是300万以上)似乎并未下降,反而开始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上升。

^① 南非最早的土著居民为科伊桑人和班图人。科伊桑人又分为科伊人(Khoikhoi)和桑人(San,亦称布须曼人)。——编注

这些过程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北美保有一个明显不同的人口结构，它进一步确定了白人的霸权，强化了白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这一方面，美国就是克罗斯比所谓“人口置换地”（1986）最好的范例，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阿根廷相似。南非在进入二十世纪时，它的500万人口中只有20%被划为“白人”。相反，美国白人在1亿总人口中约占90%。美国10%的人口是黑奴的后裔。南非也有相同比例的人口至少部分是进口劳工的后裔，这些劳工是奴隶和十九世纪来自亚洲的契约劳工。当地黑人占到南非总人口的近70%，但是土著美国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0.33%。

边疆环境

如前所述，美国历史学家和少数南非历史学家正在重新探讨殖民征服史中的环境因素。据我们所知，对这个难以回避的核心要素进行比较研究的尝试几乎还从未有过。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历史不但要记录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还要记录自然界是如何融入人类世界的。在伴随殖民化进程而来的迅速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时期，这些问题切中要害又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不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自然资源的可利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两个地区历史的模式和特点。殖民者定居在不断扩展的商业帝国的边缘加快了把自然储备转化为商品的进程。

无论是对当地的动植物还是当地人和殖民者来说，水都是使生命存在成为可能的关键资源。在南部非洲，降雨从东海岸向西减少，从南向北减少（不平衡地）。在前殖民时期，一半以上的南非土著人口生活在德拉肯斯堡山脉北面、位于东海岸温暖水源充足的狭长地带——不到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部广阔的区域人口稀少。同样，充足的降水和温带气候也意味着，北美东海岸（阿巴拉

契亚山脉把它与大陆的其他部分隔开)居住着土著人和殖民者,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有非常精细的农业经济。经常被人们忘记的是,美国大陆三分之二的西部地区(大约相当于南非的比例)当中大部分是干旱(降水低于10英寸)或半干旱(降水不到20英寸)地区。

在南部和中部非洲,殖民和占领模式深深受到了疾病的影响。疟疾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的障碍,非洲人已经与这种疾病共处了几百年。但在奎宁和其他药物被广泛使用之前,疟疾的存在确实阻碍了殖民者对疟疾盛行地区的占领。锥虫病是采采蝇携带的一种寄生虫病,它会导致人得昏睡病,也会杀死牛和马,这就抑制了白人殖民者的入侵。欧洲殖民者在南部非洲定居点的分布恰好与疾病较少地区的分布一致。

尽管恶性疟疾、黄热病和钩虫病随着非洲黑奴一起被带到南部殖民地,但是在北美并不存在一个与非洲类似的“不可进入”的地区。在切萨皮克流行的这些亚热带疾病沉重打击了最初几代移民(Cowdrey, 1983; 26—28, 36—39)。所谓非洲人对疾病有抵抗力的说法确实是促使劳动制度从白人农奴制向黑人奴隶制转变的重要因素。但是从较长时期来看,这些疾病(几乎都是从外部输入的)都差不多完全为入侵者的利益服务。疾病的后果相当复杂,天花造成的灾难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天花被认为是“处女地流行病”中最致命的一种。我们虽然反对纯粹的决定论观点,但却应该承认新的疾病在解释殖民者进行人口替换的相对难易程度和规模大小上是有用的。正如一位种族史学家(Jennings, 1975)所说,“寡妇地”比传统的“处女地”说法更能准确地概括移居殖民地时期北美的特征。

在这两个地区,当地人口被替换或融合并非是整齐划一的。到十九世纪中期,科伊桑人这样的群体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大部分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但是内陆一些大的非洲酋邦尚未目睹欧洲殖民者的现身。在北美,人口替换和当地人被逐出家园的规模要比南非大得多,步伐要迅速得多。但即使是在那里,占据内陆草原并与白人进行交

易的土著美国人社会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仍然存在。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最北部,一些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小群体占据着对农耕定居者而言的边缘地带,在很长时间维持了自主性,也没有遭受相似程度的土地蚕食。¹⁰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同样与现代经济交流,但在方式上维持了他们在沙漠边缘地带的文化存在。

另外,当地人重新聚集起来并再次申明自己的利益,于是十八和十九世纪涌现出来一些新酋长,它们的强盛并不是与获得欧洲贸易商品一点都没有关系。在南非,早期殖民阶段与集权化时期恰好一致。集权化时期产生了十九世纪的新的权力中心和具有相当包容度的集团,例如高地草原的索托人和东海岸的祖鲁人。祖鲁人的扩张强制性地吸引同化了周边的群落。苏族人骑马西进向大平原的扩张也不像后来广为人知的白人描述那样是占有无人的空间,而是以牺牲当地定居部落为代价的。所有这些对地盘和控制权的争夺都包含大量知识和生活方式的交流。特别是当地人教会了殖民者如何对付陌生的环境;尤其是水源和猎物的位置以及如何狩猎捕鱼。当前的美国研究文献(Kupperman, 1980; White, 1991a; Farager, 1992)已不再只专注于最初的敌对关系,而是转向研究适应与妥协的方面。在有重要的资本被引进之前,早期边疆上的一些殖民者事实上“走向土著化”,或被认为如此。在特纳的论述中,美国边疆人“剥去了文明的外衣,给自己装扮上狩猎服和鹿皮靴。他住在切罗基人的小木屋……在四周围起了印第安人的栅栏。不久,他就去种植印第安人的玉米”(Turner, 1893:4)。北方森林中的法国天主教捕兽者(非法猎取毛皮者)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们利用那些发挥了重要的向导作用的土著伙伴(Van Kirk, 1983)。南非“布尔迁徙者”(流动牧农)把当地肥尾长毛绵羊当做主要资源。由于他们拿着滑膛枪、穿着生皮短统靴(动物皮鞋),就被来访的欧洲人看成是半野蛮人。布尔迁徙者像他们在欧洲的荷兰先人一样种植玉米,喜欢美洲烟草(Schama, 1987)。这两种作物都已被非洲人驯化得适应了当地的

环境。

- 所有的边疆都有不同的阶段性,这部分是由当地资源的特点决定的,部分是由欧洲和殖民地小都会对原料的需求和增长模式决定的。有时是迅速的演替,各阶段的边疆开拓也重新塑造了自然环境。虽然
- 11 不存在一个简单的时序,但狩猎和捕兽经常是先驱。探寻白银和钻石一类的地下财富会招致大量人口进入尚未有人居住的地区,产生像丹佛和金伯利那样的城市飞地,这些城市对资源的新需求会向外辐射。随着向集约农业的转化和带倒刺铁丝围栏的使用,边疆也被“关闭”了。

与把扩张仅仅看成是从东向西的单向运动的盎格鲁中心论的主流说法相反,北美遭到来自四个方向的扩张的渗透,其中三个在十七世纪初就已经启动了。法国捕兽者南下圣劳伦斯河,越过五大湖区,进入密西西比河谷地。西班牙殖民者从墨西哥北上,穿过以畜牧为主的边境进入西南部,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了土著美国人的经济,因此,在横穿美洲的铁路贯通之前很久,西部内陆地区就放牧着马、绵羊和山羊。俄国人在西海岸从阿拉斯加沿海水域南下加利福尼亚北部,并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因为他们的主要兴趣是收获海洋哺乳动物的皮毛。但是,第四支扩张广为人知,是多方向的泛欧洲扩张中农耕殖民者的扩张。这一支主要起源于英伦三岛,后来壮大为著名的西进运动,是最终塑造了美国的主要力量。

南部非洲受到了来自三个方向的袭击。以莫桑比克海岸为基地的葡萄牙人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建立了一些港口。正如第一批西班牙征服者向北渗透到远至现在的堪萨斯的北美内陆地区一样,这些葡萄牙人派军队进入津巴布韦高地草原寻找黄金和奴隶。葡萄牙人在十七世纪末被挫败,但是如果他们成功征服这一地区,南非可能就是从北部而不是从南部开始被殖民。正像曼哈顿(新阿姆斯特丹)和布朗克斯一样,开普敦起初是荷兰人的前哨基地:就像纽约的哈莱姆区(新哈莱姆)一样,其古老的街道和郊区都采用了荷兰名称(奥兰杰兹赫特和坦布尔斯

克卢夫)。

荷兰狩猎者和布尔迁徙者坐在牛车中从定居的农业社会向外扩张,这是十八和十九世纪殖民者扩张的主要形式。迁徙一般从西南向东北进行,长驱侵入德兰士瓦北部主要是由寻找象牙的贪欲决定的。从开普到德兰士瓦北部的距离与从阿拉契亚山顶到密西西比以西半湿润地区的东部边缘的距离大致相等。这些“新荷兰”最终屈服于占优势的英国殖民竞争。在北美是 1664 年,在南非是 1806 年。英国殖民者 12 强化了次大陆的商业化,并逐渐把它连成一体。

入侵的殖民者在某种程度上永远不会脱离自己身后的海洋和市场经济。那种大都会倾向意味着:他们有时虽然披上了本地人的外衣,但不可能复制出同样自然经济型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经济被纳入了日益扩大的、围绕欧洲核心的卫星轨道上。在南非,当地市场总的来说受到更多的限制,其经济更多的依然是殖民地经济。城市市场的相对缺乏意味着:在 1860—1880 年代金矿和钻石矿发现之前资本主义的发展机会是有限的。在独立前后,美洲殖民地都对外来投资更有吸引力得多。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在自给自足方面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例外。在二十世纪公司工业化时期,美国的增长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比较的方法受到了严重的局限。到 1920 年代,大多数美国人被划为城市居民,这一分水岭在南非直到 1980 年代才达到。

总之,环境史本身适合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超越了从国家或民族的角度写历史的界限。这种更具自然色彩的环境史是研究相互作用的丰富源泉,是历史学和科学,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交叉的焦点。我们对人与其他动物(野生的和驯化的)、树木、草地和农业的关系特别感兴趣。人造的或城市环境是一个更为隐性的议题,它

主要是以农村环境的压力之源的形式出现的。^①

我们希望能平衡关于政治经济和生态变迁的讨论，阐明它们相互作用的关系。人对自然的态度，尤其是对感知到的环境退化的回应，包括对问题的诊断和解决方法的形成，作为梳理的主线，反复出现，并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得到特别的关注。因为是人类创造了历史，甚至包括环境史。不管我们研究的环境史聚集了多少配角，人类（有时实际上是个人）仍是我们研究的焦点。虽然我们也关注前殖民时期土著人的行为造成的环境变迁，但是主要关注的还是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中期这一时间段的环境变迁。这正是自然环境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剧变、

13 现代环境保护和环境主义思想生根发芽的时期。

^① 我们关注的焦点肯定是陆地，因篇幅限制而不得不省略掉近海水域、那里的生命形式，以及像海洋污染这样的论题。

参考文献和阅读书目

环境史

- Anderson, David and Grove, Richard (eds) (1987) *Conservation in Africa: People, Policies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inart, William (ed.) (1989) ‘The politics of conserv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5 (2), 143—392.
- Brockway, Lucile (1979) *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 The Role of the British Royal Botanic Garde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oates, Peter (1994) ‘Chance with wolves: renaturing wester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8 (August), 241—254.
- Cowdrey, Albert (1983) *This Land, This South: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Cronon, William (1983)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al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Hill & Wang.
- Crosby, Alfred (1972)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 (1986)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 900 to 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lacken, Clarence (1967)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ove, Richard (1990)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Nature*, 345 (3 May), 11—14.
- (1994) *Green Imper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cobs, Wilbur R. (1980) ‘Indians as ecologist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themes in American frontier history’, in Christopher Vessey and Robert W. Venables (eds), *American Indian Environments: Ecological Issues in Native American History*,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Merchant, Carolyn (1980) *The Death of Nature: Woma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 (ed.) (1993)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Lexington: D. C. Heath.
- Nash, Roderick (1970)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Herbert J. Bass (ed.)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 Chicago: Quadrangle.
- Petulla, Joseph M. (1977)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Exploit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San Francisco: Boyd & Fraser.
- Pyne, Stephen J. (1982) *Fire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of Wildland and Rural F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immons, I. G. (1993)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 White, Richard (1985)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historical fiel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4, 297—335.
- Worster, Donald (1985) *Rivers of Empire: Water, Arid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Pantheon.
- (ed.) (1989)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通 史

Wolf, Eric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南部非洲

Beinart, William (1994) *Twentieth-Century South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enport, T. R. H. (1991) *South Africa: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Elphick, R. (1977) *Kraal and Castle: Khoikhoi and the Founding of White South Af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lphick, R. and Giliomee, H. (eds) (1989) *The Shaping of South African Society, 1652—1840*, Cape Town: Maskew Miller Longman.

Marks, Shula and Atmore, A. (eds) (1980)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 London: Longman.

Maylam, P. (1986) *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People of South Africa*, Cape Town: David Philip.

Schama, Simon (1987)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London: Collins.

Thompson, Leonard (1990)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美 国

Faragher, John Mack (1992) *Daniel Boone: The Life and Legend of an American Pioneer*, New York: Henry Holt.

- Jennings, Francis (1975)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Indians, Colonialism, and the Cant of Conquest*, New York: Norton.
- Kupperman, Karen O. (1980) *Settling with the Indians: The Meeting of English and Indian Cultures in America, 1580—1640*, London: J. M. Dent.
- Meinig, Donald W. (1986) (1993) *The Shaping of America: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on 500 Years of History*; vol. 1, *Atlantic America, 1492—1800*; vol. 2, *Continental America, 1800—186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1893)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in F. J. Turner (1920)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 Van Kirk, Sylvia (1983) ‘*Many Tender Ties*’: *Women in Fur Trade Society in Western Canada, 1670—1870*,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White, Richard (1983) *The Roots of Dependency: Subsistence,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hange Among the Choctaws, Pawnees, and Navajo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1991a)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1650—181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1b) ‘*It’s Your Misfortune and None of My Own*’: *A New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比 较

- Cell, John (1982) *The Highest Stage of White Supremacy: The Origins of Segregation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American Sou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edrickson, George (1981) *White Suprema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 American and South Af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 *The Arrogance of Ra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Slavery, Racism and Social Inequality*,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Gump, James (1994) *The Dust Rose Like Smoke: The Subjugation of the Zulu and Sioux*,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Jabavu, D. D. T. (1920) *The Black Problem*, Lovedale: Lovedale Institution Press.
- Lamar, Howard and Thompson, Leonard (eds) (1981) *The Frontiers in History: North America and Southern Africa Compar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alker, Eric (1930) *The Frontier Tradition in South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二章

狩猎和动物：从猎物到野生动物

打猎是开普的布尔年轻人、阿拉契亚的苏格兰—爱尔兰农家男孩以及桑布须曼人和苏人男孩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仪式，是他们进入广阔社会的一个庆典，还是这些当地人和殖民者维持其社会凝聚力的一个工具。作为前殖民社会和早期殖民社会的一种生存方式，狩猎的重要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但越来越得到历史学家的承认。猎获物在早期国际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有关猎杀野生动物的资料逐渐引起重视，被认为是研究环境史，尤其是男性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个绝佳切入点。

本章主要论述狩猎在环境变迁中的作用。人们通常认为狩猎在环境变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人类进化的大部分时段，狩猎都是男人的基本活动（与妇女的不同）。但是，如果把狩猎当成一件没有丝毫差别的事，从分析上讲就像一支钝矛那样没有价值。我们有必要对狩猎者进行分类，对狩猎划分阶段：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当地人的狩猎；殖民者为了生计和贸易而进行的狩猎；精英们为了获得追逐的刺激而进行的狩猎，这一种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通常被称为运动型狩猎。在血腥杀戮的十九世纪过后一段时间里，当猎杀野生动物登峰造极之后，随着一些人类“鹰隼”改变了目标，对狩猎活动的各种反应也开始凸

显出来。在本章的结束部分，通过分析严格的狩猎控制措施、早期的猎物保留地和野生动物避难所，我们试图解释这种犹犹豫豫的转变。

前殖民时期的狩猎

美国第一个狩猎边疆可能是在亚洲人迁徙到美洲后打开的，很可能是在亚洲人追逐移栖的兽群、直达巴塔哥尼亚顶端的迁徙过程中打开的。这场迁徙现在看来是一场相当快速的运动。据一位古生态学家估计，迁徙的速度是每年 10 英里。早在 3 万多年前，桑人狩猎者就居住在南非。他们的生存严重依赖以获取肉食为目标的狩猎，这就决定了他们流动性和适应性很强的、逐兽群而居的生活方式。但是，至少在有史时期，狩猎并不仅仅是指猎杀碰巧发现的动物。土著的生计需求支配着广泛的“户外家务”。定期的焚烧能增加牧草的营养含量，改变植物演替的进程，进而招徕更多的猎物。因此，充足的猎物有时就是当地植被被改造的标志。焚烧也扩大了猎人的视野和活动空间。加利福尼亚沿海放牧区独具特色的灌木丛景观（敞开的常绿橡树和熊果树森林）就是印第安人使用和管理火的产物。有些学者还认为，在形成大平原草地这种表面上似乎是“自然的”环境的过程中，原住民发挥了核心作用。人类学家理查德·李在 1950 和 1960 年代研究卡拉哈里的桑人时，发现即使是在半干旱环境都有广泛使用火的现象，有时是失控的用火。西开普的植物学家发现，自然的和人为的焚烧都助长了一些独特的凡波斯（fynbos）树种的繁殖，这种植物群是小叶灌木和杂草的独特混合物，包括山龙眼（proteas）。（不过，经常焚烧会破坏这些植物的自然繁殖周期，有利于那些适应了当地环境的、来自澳大利亚的外来物种的生长。）

虽然非洲人（与桑人不同）社会比北美印第安人社会的农业化程度更高，但狩猎仍然是非洲人生活的一部分。非洲人和土著美国人的一

一个最重要不同是，在与殖民者接触之前，土著美国人经济中普遍缺乏驯化动物——唯一的例外是在北美大平原上使用拉雪橇的狗。因此，在非洲，狩猎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可获得食物，还在于保护牲畜免受猫科和犬科动物袭击。因撰写早期狩猎传奇故事而出名的作家威廉·康沃利斯·哈里斯上尉在1830年代因为缺乏猎物而不得不从开普迁入内陆。在参观恩德比利国王的王宫时，他发现，王宫“点缀着野生动物的骨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猎食牲口而被捕杀的狮子的头骨（Beinart, 1990: 163）。当非洲人在十九世纪饲养产毛的绵羊时，以日益壮大的羊群为生的豺就逐渐被牧民视为祸害。于是，茨瓦纳人加强了自己的狩猎活动，其酋长还发现用带有条纹的毛皮可以缝制外套和帽子。北美18印第安人饲养的欧洲品种的牲畜数量比较有限，但在十六世纪畜牧化时纳瓦霍人也同样把掠食动物视为不受欢迎的邻居。

大多数评论家都强调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土著人狩猎采集活动的可持续性。他们所谓的可持续性是指生态系统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之后仍然保有生存平衡的能力。通常认为，土著美国人和桑人在狩猎时很有节制，只猎杀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数量的动物。桑人还妥善利用动物肠线制作弓弦，利用鸵鸟蛋壳制作盛水器皿，利用动物毛皮制作阴茎保护套。研究桑人的人类学家对此进行了详细记载。在解释前殖民社会的可持续性时，土著的意识形态体系也经常被强调。一个颇为流行的关于沙漠地区桑人的传说是：桑人认为他们敬重的一个相邻部落的人貌似大羚羊。他们外出狩猎时，竭力避免伤及这个部落的人。“如果一群貌似羚羊的人在外出放牧之时发现一个布须曼猎人正引弓瞄准他们，就会对他说：‘不要射杀我们，我们不是羚羊’，猎人自然就不会伤害他们。”（Thomas, 1958: 147）

同样地，每一份记载十九世纪达到鼎盛的苏人文化的叙述都列出了野牛各部分的多种用途，包括用肩胛骨做锄头，用背部脂肪做头油，用舌头（非常粗糙）做发梳。加里·拉尔森在名为《远方》（*The Far*

Side) 的卡通片里画了一个印第安人手持一片形状奇特的野牛骨头, 对一群人解释说: 虽然他不清楚这是什么, 但他知道这是野牛身上唯一不能利用的部分。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的土著神秘宗教信仰都会鼓励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环境保护意识, 尤其是在与野生动物数量减少的关系方面。很多美国土著人相信, 动物的数量是由超自然力量决定的, 与人类活动没有多大关系。

不管这些信仰的实际影响如何, 一个错综复杂的、围绕前殖民时期狩猎的符号图腾世界被建构出来。酋长和其他显贵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 喜欢穿戴一些动物制品标识, 如象牙手镯。精心策划的、长达数天的表演活动是大平原印第安人的礼仪世界的重要内容, 这是为了狩猎成功而召唤神灵, 比如苏人的太阳舞。在这些表演中, 狩猎者变成了猎物, 箭袋是桑人男子汉气质的象征。对非洲的首领来说, 控制了对狩猎所得的猎物的分配权, 特别是控制了象牙贸易, 就等于掌握了维护权力、确立控制领地的权威以及界定性别角色的机制。几乎没有发现女人参与狩猎的证据, 至少没有捕猎大型动物。但是, 女人和小孩从事了驱赶动物、保护庄稼的工作。¹⁹ 虽然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艺术家阿尔弗雷德·雅各布·米勒描绘了印第安女人猎捕野牛的场景, 但是, 她们一般只在剥皮、烹调和制作等加工阶段发挥作用, 展示其参与狩猎的价值。由于大平原各部落在马背上拓展了狩猎的能力和范围, 适合女性参与的农业活动领域缩小, 女性的影响力也因此而逐步被削弱。

新近有人把“高贵的野蛮人”的神话重新包装, 把土著视作最先的生态学家, 但有些人不满意这样的做法, 他们强调土著人过度狩猎在野生动物减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即使在前殖民时期也是如此。刘易斯和克拉克在 1804—1806 年被派往新近购买的领土(把美国领土的边界扩展到了太平洋)进行探险。在他们的探险日志中保存着这样的资料: 土著美国人的野牛数量急剧减少; 整个兽群被逼下悬崖。这些记录后来被在该地考古发掘出来的、杀戮场上堆积如山的动物残骸和用于

保护猎人营地的石堆所证实。查尔斯·达尔文的近亲，十九世纪中期在南部非洲活动的旅行家弗朗西斯·加尔顿发现，科依桑人把大量猎物赶进了捕兽陷阱(Wilson and Thompson, 1969:48)。一些多余的肉被晾干，但猎杀的动物不可能被全部消耗掉。

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些证据，因为在殖民者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那就是抱怨土著造成了野生动物数量减少。欧洲人反对北美印第安人“肆意粗暴的”狩猎方法，殖民者也谴责非洲人用陷阱和圈套狩猎的方法过于浪费和残忍，两者遥相呼应。就欧洲人如何看待土著管理自然资源而言，土著似乎永远被锁定在不利的境地；与滥用猎物的罪名相反，土著对资源利用不足又成为白人掠取“空地”进行耕种的借口。

殖民者的狩猎

在北美进行殖民的速度和密度都说明，美国边疆的自然资源比南部非洲的更丰富。北美确实拥有大量有价值的耕地和木材，但在野生动物方面，北美肯定比南部非洲的物种要逊色，特别是南部非洲拥有大量的肉食动物。德基维特自豪地说(1941:11)，南部非洲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富饶的狩猎国度”。就大型食草动物种类的多样性来看，这句话很可能千真万确，不过，北美拥有大量的毛皮动物。

对野生动物制品的渴望是国际经济的先驱、野心勃勃的资本家(经常被错误地描述为逃离文明的受难者)开拓边疆的主要动力。欧洲人和亚洲人对兽皮、毛皮和象牙的需求(常常取决于消费者的狂热)给狩猎产品赋予了前殖民时代没有的新的经济价值。像南部非洲那些在殖民者移居之前已经深入内地的猎象者一样，十九世纪初叶在落基山一带猎捕皮毛兽的白人和混血人也推动了西进运动。美国的公司资本主义是随着皮毛贸易成长起来的，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美国皮毛公

司”（1808 年成立）是那个时代最大的美国公司。在矿藏开采以前，象牙以同样的方式主导着德兰士瓦的出口经济达三十年之久。对雄心勃勃的土地所有者（通常都是农民的儿子）来说，商业性狩猎是他们致富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在肥沃的、灌溉条件良好的、能获得的田地在南非比在美国更宝贵的情况下。

大象之所以被猎杀，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供象牙刀把和弹球一类的物品。二十世纪初以前，对象牙的主要需求来自美国市场，直到 1940 年代在美国市场上塑料取代了象牙。在中东，犀牛角为人们提供了匕首的手柄；在东方，它被研磨成粉末，当做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来使用。巴黎的女帽制造商在 1830 和 1840 年代决定改用丝绸，这让身处绝境的北美海狸获得了一线生存的机会，使之能在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活跃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能确保自己的生存。穿戴饰有鸵鸟羽毛的帽子和华丽的绞蟒围巾（竟然以南美的绞蟒蛇来命名）的流行时尚把一种野生鸟类变成了饲养动物。有时，美洲野牛的舌头是其身上唯一被取下的部分。经过熏制成为欧洲餐馆里的一道美味佳肴。仔细阅读维多利亚时代的食谱，就会发现野味肉食在那时享有崇高的地位。

当地人的狩猎被纳入白人的殖民网络之中，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人对当地人知识的依赖就意味着，俄国皮毛商（*promyshlenniki*）胁迫阿拉斯加的阿留申人不得不大量猎杀水獭，因为阿留申人的家人总是被扣做人质。桑人狩猎者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献记载中都以追捕猎物的天赋而闻名于世，这是土著特有的卓越技巧得到承认的少数几个方面之一。在他们的布尔主子因为害怕疾病而裹足不前时，非洲雇佣猎人在 1860 年代突入了疟疾和采采蝇肆虐的地带。

到十七世纪中叶，从事皮毛贸易的印第安人实际上已经灭绝了新 21 英格兰的海狸。在十九世纪穿越密西西比河以西土地的运动中，印第

安人也提供了牛皮袍子^①。作为这些动物制品的交换,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们获得了铁器和纺织品时代的益处,还有威士忌酒、烟草、珠子、咖啡、蔗糖和小镜子——他们已经习惯了精心组织的交易和讨价还价。印第安人面向市场的商业性狩猎或许是导致大平原上最后一块野牛栖息地消失的原因之一。在应用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数据复原了野牛的数量之后,弗洛雷斯(1991)指出,发生在1870年代的那场记录较翔实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实际上只是对野牛的最后一击。另外,十九世纪初,南部大平原上野牛的食物也受到了25—50万家养马群和200万野马的威胁。干旱和外来的牲畜疾病也是造成动物数量减少的原因。

尽管存在着许多当地人被强迫狩猎的事例,但是当地人的自愿参与程度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某些人来说,商品交换和杀伤能力的增强足以削弱原有的可持续生活方式。但是,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只有在全面考察由疾病、领土侵犯、基督教传播以及相当重要的酒因素所引起的几乎是天翻地覆的混乱后,才能对这种看似短视的掠夺行为做出适当的解释。

但是,和大象一样,野牛的命运最终还是由白人的直接狩猎决定。在1870年代,德国制革工人发明了把柔软的野牛皮制成既便宜又耐用的皮革的办法,而英国军队成了最好的买主。野牛曾经遍游整个北美,而今英国军队逡巡全世界,与之适成对比。1894年的政府调查显示,仅存85头野牛,另有1000头作为珍稀动物生活在公园或牧场中。同样地,只是稍早一些,南非境内只剩下数百头大象,不是躲在遥远的北方,就是隐身于东开普阿多草原的茂密灌木丛中。如果大象的活动范围不幸被局限于南非,那么它肯定会濒临灭绝。

在记录环境变迁的文献中,主要内容是对诸如信鸽、蓝羚和斑驴

^① 一夫多妻制是大平原地区印第安人社会的一个特征。它与皮袍贸易紧密相关。一个男人妻子越多,就有加工更多兽皮的能力,也就能猎杀更多的野牛。

(条纹较少的斑马)这些传说中的物种的灭绝的描述。在美国历史上，最知名的两位是“玛莎”(最后一只信鸽)和“印加斯”(最后一只卡罗来纳长尾小鹦鹉)，它们分别在 1914 年和 1918 年死于辛辛那提动物园。而 1883 年死于阿姆斯特丹动物园的最后一头斑驴或许就很少有人知晓了(Skead, 1980:369)。

猎杀野生动物还与白人的其他多种需求密切相关，其中包括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对其他食物的需求。对北美和南非的大多数第 22 一代殖民者来说，野生动物主要是食物来源，因为他们要节省自己宝贵的牲畜。被迫来到北美的非洲移民也意识到了野生动物的食用价值。一般情况下，北美的奴隶被禁止拥有枪支，但他们想尽办法来补充自己食品中缺乏的蛋白质。十九世纪末叶，乔尔·钱德勒·哈里斯在他的雷默斯大叔系列故事中对此做了描写。奴隶们通过设圈套、挖陷阱、装捕网、竖树桩来捕获兔子、松鼠、负鼠、浣熊，偶而还有鹿。

狩猎被视为殖民者的基本权利，是比较平等的边疆社会的关键原则。法律规定猎物是允许自由获取的公共财产。

尽管有时会以非法侵入领地为代价。在南非的边疆地区，参加狩猎团体(jagtersgemeenskap)能让布尔年轻人有效地社会化。美国内战前南方大种植园主阶层的一位成员认为，英国对狩猎的严格限制是迫使人们移民外迁的所有灾难中“最令人心痛和难以忘怀的”(William Elliott, 转引自 Marks, 1993:33)。因此，很难给偷猎者定罪。无论是到访的英国猎人还是殖民者，他们也都为在非洲获得猎杀动物的自由和缺乏社会约束而欢欣鼓舞。

因此，狩猎英雄大量出现于这两个地区的白人神话和文学作品就不足为奇。美国第一个家喻户晓的文学人物形象是皮袜子(化名纳蒂·邦波/鹰眼)，他最早出现在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创作的《拓荒者》(五部曲之一)中，是以传奇式的森林人丹尼尔·布恩为原型塑造的。在 1870 年代，赖德·哈格德在德兰士瓦生活了一段时间，并根据

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所罗门王的宝藏》中塑造了白人大象猎手的典型阿兰·夸特曼。具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保罗·克鲁格是独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末代总统，非洲最大和最知名的国家公园之一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克鲁格以大象猎手的形象为人熟知，在民间传说中他被刻画成赤手空拳打死一只雄狮的英雄。来自田纳西州的“浣熊皮议员”达维·克罗凯特（他回忆说，博取选票就像积累熊皮一样。）就是凭着他的不屈不挠的猎熊者之名进入政坛的。在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文献中，字里行间都鼓吹狩猎的价值，把它美化成训练士兵的场所和缔造帝国伟业时易于传授的技巧。

第一代白人猎手兼农民和他们的土著先辈一样都以猎物为生，但其后更稳定的定居农耕社会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比先辈要更少利用野生动物。²³ 研究思想史的历史学家都强调驯化景观和消灭荒野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以牲畜为对象的掠食动物如豺、鬣狗、野狗、大型猫科动物、郊狼、狼、鹰、美洲狮和灰熊被称为害兽（南非荷兰语叫 *ongedierte*），成了令人厌恶的畜牲。射杀、毒杀和捕杀这些害兽是农耕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这些野兽很少用来吃。早在十七世纪，就对猎杀这些害兽设有悬赏（参见第四章）。由于殖民者的狩猎消灭了它们的天然食物，一些掠食动物（主要是豺和郊狼）只好以家畜为食。其他动物如北美的鹿、狒狒和河马（河马的牙齿因为常被用于制造假牙而受到格外重视）也会践踏庄稼。人们认为像跳羚和叉角羚这样的食草动物也与家畜争夺牧草^①。

然而，如果栖息地能够保存下来，野生动物数量下降的趋势就可以扭转。旅行家和猎人都注意到，在1840年代时尚变化之后的三十年，

^① 对叉角羚饮食习惯的研究表明，它们几乎不吃牧草，以吃杂草和灌木为主，这实际上有利于牲畜的觅食。大部分非洲跳羚是吃嫩叶的动物，而不是吃草，但这并没有让它们得以幸存。

海狸又回到了美国西部。另外，由于某些动物的适应能力，人类的介入有时也会造成动物数量短时激增。狼群就曾一度受惠于鹿皮猎人抛弃的大量鹿肉。一旦狼在森林里湿软的栖息地被砍伐或排干，体形更小、善于利用机会的郊狼就会借机获利——迅速四散占据昔日狼在北美的大部分势力范围。与郊狼在北美扮演的角色类似的动物在南非是豺。它的兴盛是因为，在其竞争者如野狗实际上消失的时候，羊群却正在扩大。当鹰（包括一种常被认为是“羔羊杀手”的鹰（lammervanger））^①由于对嫩羔羊的特殊偏好而受到攻击时，它们主要的天然食物蹄兔（石蹄兔）却成倍增加，并从山区蔓延到平原。在农民西进后，新英格兰地区的次生（和再次生）落叶林复苏，嫩草嫩叶丰富起来，导致白尾鹿的数量大大增加。猎人和动物的死亡率绝对不能单独决定物种数量的变化。以栖息地和适应性为条件的出生率也肯定是这个因果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如果说狩猎是农耕活动中必要的一部分，它也渗透到殖民扩张进程中那些不太明显的领域。很少有历史学家注意到野生动物资源是如何决定边疆开拓进程的速度和性质。野生动物的肉能为各种各样的殖民侵略（从传教、军事远征、捕鲸活动到采矿和修建铁路）提供补给。为了其他目的而在南部非洲进行的远征也因为能提供新鲜肉类而对那些不大情愿参加的脚夫和仆人具有一定诱惑力。相当重要的是，易于得到的猎物有助于布尔迁徙者在1830年代逃出英属开普殖民地，并减少了对补给线和大批资本投入的依赖。无论是北美还是南非，生活在边疆的人们都酷爱肉干。在南非，土著使用精心设计的工艺制作各种各样的干肉条，包括用盐腌制、风干，有时还用醋浸泡。在北美，人们喜欢的是牛肉干，不过，印第安人和大平原上的白人移民都随身携带不易变质的干肉饼（女人们把干肉舂烂拌入野牛油脂，有时也拌入浆果）。在

① 这个词可以指称任何以家畜为食的鹰，但比较准确地说应指称黑鹰。

十九世纪后期牛仔的菜谱上,大草原上的鸡和羚羊逐渐取代了熏肉和豆类成为主要食品。肉类也惠及某些家畜,北美边疆的农民把猪赶到屠宰场,让它们享用信鸽和野牛的下水来催肥。

在整个十九世纪,促使来访的英国精英狩猎的强大动力来自体育运动的思想。另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北美和后来的南非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改变,当地精英扩展了作为体育运动的狩猎的范围。野生动物的状况再次被改写,但这一次依据的不是其经济价值。可想而知,武器技术从前膛到后膛装载的进步以及连发步枪的发明都增强了1870年代所有猎手的杀伤能力。快捷的跨洋汽船运输给冒险家和移民都提供了帮助,戴着巴拿马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把美国西部看成是英帝国非正式的属地,它不但吸引了那些拥有相当资本而想成为牛肉大王的人,也吸引了渴望猎杀(正在被牲畜王国所取代的)野牛、羚羊和麋鹿的贵族出身的运动家。近来的狩猎文献强调殖民地运动狩猎的掠夺性和似乎漫无目标的屠杀。哈里特·里特沃(1987:288)认为,猎杀大型动物反映了“人与动物之间最具返祖性和敌对性的关系”。现代环境主义大多反对狩猎,体育运动型猎手就成了易受攻击的靶子。这是一个对野生动物权利越来越敏感的时代,但人们必须牢记,狩猎是当年体育运动的本质和内容。

描写在非洲和北美进行体育冒险的作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出版,并能在欧洲广泛发行。陶醉于J.费尼莫尔·库珀小说的英国猎人越过了大西洋。R.G.卡明尤其擅长把自己的功绩转化为文学作品和经济效益。他在1850年代环游英国,展示他的纪念品和战利品,同时既获得了乐趣又收获了利润。南部非洲后来的猎人常常从卡明和康沃利斯·25哈里斯上尉的作品中得到启示。非洲狩猎的书籍同样畅销美国。显然,卡明发现北美的狩猎太过温和。如同许多游历过帝国的英国贵族一样,他哀叹北美缺乏狮子和老虎,认为野牛是缺乏挑战性的对手。他的著作甚至引起了美国著名的自然主义者、原初生态学家亨利·大

卫·梭罗的注意。梭罗反对狩猎，但还是阅读了他的著作。像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样，他深受残酷仪式的吸引，并相信通过杀戮行为可以与原始自然建立更密切的联系：“非洲猎手卡明告诉我们，大羚羊的皮毛散发着最怡人的草木芳香”(1862:610)。

虽然殖民地一般都是只有小群骑马猎手带着随从领略追猎的乐趣，但是英国携带猎犬狩猎的习惯在南非和北美也被采用。在1820年代，查尔斯·萨默塞特勋爵在开普养了一群猎犬，但当贝专纳警察局上校弗雷德里克·卡林顿在马沸京经营猎犬后，猎犬的数量更是急速上升。由于缺乏狐狸，豺就成为他们猎取的主要对象，被认为是同样有价值的。作为一种亲英的表示，华尔街的经纪人在长岛建立了一个提供午后猎狐的俱乐部；由于日程安排紧凑，猎狐者必须带上香包，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晚餐前结束一切。

由这些放纵的猎杀活动提炼而成的情节紧张、令人激动的文学作品表明，英国人在尽情和肆意的杀戮方面举世无双，他们的著作为这些破坏行为留下了最惊人的证据。美国最著名的精心策划的游猎（他们需要购买装备，这大大刺激了边疆据点经济的发展）是圣乔治·戈尔爵士历时三年（1854—1856）的远征；这次远征穿越了科罗拉多、怀俄明、蒙大拿和南北达科他，长达6000英里。根据一位军官的记载，特地为来访奥兰治自由邦的爱丁堡公爵安排的皇家狩猎仅一天就猎杀了600头羚羊。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戈尔在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仅猎杀了2000头野牛、1600头鹿和麋鹿（Spence, 1959:56）。十九世纪后期，北美和南非都开通了独特的游览列车，猎手可以舒适地进行近距离打猎。但是，这种国际性的体育运动的规模相当小。同时，尽管非洲人和土著美国人对体育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无疑都享受着狩猎及其带给他们的身份地位。边疆的拓荒者亦如此。

不论是来访的还是本地的，绅士猎手不仅根据从狩猎中获得的乐趣，而且用自己对博物学正在做出的贡献来为狩猎活动辩解。F. C. 塞

- 26 卢斯是英国最后一批在南部非洲从事带有体育娱乐性质的商业猎象的猎手中突出的一位。像他这样的英国猎手用越来越多的时间致力于为博物馆收集藏品和标本。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寻求探险的美国旅行家想在南部非洲和东非发现类似美国西部的景观(McCarthy, 1976—1977)。十九世纪末,美国西部的荒野越来越少,非洲的猎物逐渐进入美国运动家的视野。就奢侈而言,西奥多·罗斯福比得上戈尔当年的作为。他于1909—1910年在英属东非的铺张旅行得到了史密森协会的赞助,还得到了肯尼亚总督的特别豁免,其狩猎不受任何猎物法的制约。这位前总统的游猎是由塞卢斯安排的,此人在1890年代后期曾在美国猎捕猞猁和狼。西奥多·罗斯福给塞卢斯的最后一部著作撰写了前言。他们两人都是纽约那家把狩猎、标本制作、科学和探险融为一体“天涯海角俱乐部”的成员。

狩猎管制

当精英猎手试图加紧建立对猎物资源的垄断权时,他们与为了生计而狩猎和为了商业目标而狩猎的人(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发展。在南非,饱受十九世纪末工业化压力的贫穷布尔人只能利用残存的狩猎机会来维持自己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自主权。据说,保罗·克鲁格在1880年代发出了这样的评论:“一个男人宁愿花三天时间追捕一只小羚羊而不愿去赚三英镑工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Trapido, 1984)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中赚取资本的前景越来越渺茫。美国最重要的体育爱好者杂志《森林与溪流》的贵族编辑乔治·博德·格林内尔用同样的腔调在1894年撰写了社论——正是在这一年,采取了行动打击那些为了获取利润而在黄石国家公园偷猎的行为。在肯定了狩猎在边疆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后(“对于几代人来说……杀死猎物获取食物是正确的、适当的、明智的和有利

可图的”),他进一步写道:“但是时代已经变了……猎物作为这个国家食物供应中的一个经济因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从农业生产中获取食物,饲养家畜比打猎能提供更廉价的肉食”(Reiger, 1986: 70—71)。殖民者的狩猎活动被认为是经济进步的一种障碍,遭到了工业家和更加富裕的农场主的反对。为了保护私人土地免遭狩猎者的入侵,非法侵入法逐渐得到广泛应用。

简言之,狩猎管制就是要消灭竞争。殖民官员渴望保留的是,狩猎 27 的机会可以发挥安全阀和兴奋剂的作用。狩猎能使那些偏远的地区更具吸引力。于是,保护猎物就成了更广泛关爱帝国的一部分。在美国,对社会和种族进行管制的考虑也得到实施,精英阶层同样从整体上设法排斥下层阶级、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商业捕猎。这时,他们对自己在生物学和文化意义上的优越感的坚定信念达到了顶峰,这种优越感是基于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转用于社会领域。狩猎管制是用来确保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的帝国领地,以凌驾于文化和种族日趋多元的国家之上。像英格兰乡间的偷猎者一样,非洲人因为使用罗网、陷阱、圈套而受到批评。美国各州的法规禁止使用粘鸟胶和猎鸟网,对非本地居民征收狩猎许可费,禁止外国人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或者拥有枪支),甚至禁止他们一起狩猎,这些限制都表现出了对意大利人的反感,偏好美国燕雀这一点在意大利人的菜谱里太突出了。

从声称拥有捕猎动物的权利到声称要在更大程度上承担责任,这对权贵来说并不是很大一步。从马萨诸塞到开普的殖民政权都注意到了自殖民以来过度捕猎带来的危害,迅速依照传统的欧洲方式制订了保护有用动物资源的法规。包括设置禁猎季,保护幼兽和完全禁止猎杀某些动物种类(Leopold, 1933:12—18)。尽管如此,欧洲评论家还是指出开普猎物在 1790 年代的枯竭,包括鬣狗、大象、犀牛和各种各样的食草动物。甚至在布尔人占据的德兰士瓦这种狩猎对生存至关重要的地区,人民会议(Volksraad)从 1850 年代就尝试规定要明智利用猎物,

并确保白人对猎物拥有垄断权。有一条法令特别规定，狩猎应该仅限于维持生计，每一次的猎杀量不能超过一辆马车的载重量。一些非洲酋长如茨瓦纳的卡玛和恩德贝勒族的洛本古拉也试图在其领土内对狩猎进行限制。但是，由于政治权威分散和猎人有意逃避，这些措施大体上有名无实。

到十九世纪后期，体育运动型狩猎组织已经意识到了现有法规实践的失败，再次面临猎物急剧减少的紧迫局面。从 1870 年代开始，在美国和南非均诞生了第一批狩猎俱乐部和保护性协会。英国庄园传统和公平追捕的狩猎信条通过建立私人狩猎保护区而再生。如果中世纪 28 的围场和皇室与贵族的追猎提供了一个文化参照，那么，这些现代版的狩猎保护区似乎更像是为富人提供机会的联合企业或者公司企业。1887 年，西奥多·罗斯福和其他杰出的纽约人成立了不轻易吸收新会员的“布恩与克罗克特俱乐部”，致力于在保护区保护诸如野牛、麋鹿、山区野羊和羚羊这样的大型猎物。此后不久，“德兰士瓦猎物保护协会”也集狩猎和鼓吹建立第一批保护区两种角色于一身。在帝国层面上，成立了由殖民地核心集团精英分子组成的“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SPWFE, 1907)，西奥多·罗斯福是荣誉会员。

其他重视自然资源保护的团体也同时在联合王国兴起。“皇家鸟类保护协会”(1891)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女性发起并受中上层阶级妇女支配的组织，它是在 1880 年代“美国奥杜邦运动”发起的反对鸟类羽毛贸易的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这些英美女性发起了堪称世界上第一次的“绿色”消费者抵制运动(Merchant, 1985: 159—161)，展示出钱袋的力量。时尚再次成为解救动物的有效手段。在 1920 年代，当大而无当的帽子(有的会装饰六只鸟)绝迹时，某些鸟类的生存就得到了保障；时髦的短发使女帽饰针失去了用武之地。

“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往往被当时的怀疑论者描绘成“幡然悔悟的屠夫”。然而，他们几乎没有人完全放弃狩猎，或者为一直

追求的狩猎乐趣而忏悔或道歉。即使当他们在猎物保护中的角色得到承认时，也仍被认为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体育运动而想永远保障猎物供应。约翰·麦肯齐(1988)指出了非洲猎物保护的狭隘目标与野生动物保护的更广泛关注之间的区别。在美国，狩猎的体育爱好者不仅为可供狩猎的国有森林而战，也为一般情况下禁止狩猎^①的野生动物庇护所而战，还为彻底禁猎的国家公园而战。那时的体育爱好者和今天他们的历史学家都认为，作为体育运动的狩猎没有造成任何物种灭绝。

自1880年代以来，猎物保护区相继在英属殖民地和布尔人国家里建立起来。1890年代在祖鲁兰建立的保护区之一的乌姆弗洛齐，就是专门保护仅存的白犀牛。1898年德兰士瓦东部动物种类丰富的地区被划为萨比保护区，其范围后来大大拓展了。1900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列强代表签署了《非洲野生动物、鸟类和鱼类保护协定》。²⁹这个国际条约是由英国和德国发起的，旨在对据信濒临灭绝的少数动物种类进行全面保护，对捕杀其他动物种类提出了限制措施，禁止使用某些狩猎方法，并倡议建立更多的猎物保护区。

猎物保护区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脆弱的实体，其规模和保护意愿都受到制约。保护区的设立（通常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的）与有意义的保护相去甚远。美国保护区的面积经常是微不足道的，它的第一个官方保护区——佛罗里达的鹈鹕岛保护区（1903，保护褐色鹈鹕的筑巢地）的面积只有五英亩。保护区还经常要面对当地人强烈的敌视态度。

① 美国国家（联邦）野生动物庇护所原本是为动物提供禁猎区，但有些庇护所的部分区域在每年的特定时期是向狩猎者开放的。许多州都以此为同意购买土地建立国家庇护所的前提条件。自独立以来，联邦土地以外的野生动物管理属于各州的权限。州立野生动物庇护所允许打猎，因为它的大部分资金源于出售狩猎和捕鱼许可证。自1930年代以来，通过购买“猎物印花税”和交纳武器弹药税，体育运动型猎手成为国家和州的野生动物庇护所土地征购和管理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

撤销保护区或缩小面积在二十世纪初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对野生动物进行无私保护的态度尚处在萌芽状态,关于土地规模及其管理的理论也是非常初步的。许多历史学家把对动物更敏感的态度的出现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联系起来(Thomas, 1983; Tuan, 1984; Turner, 1980)。但是,这些变化基本上只适用于驯化的动物。十九世纪后期起源于英国并对美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新”人道主义运动也没有改善野生动物的状况,尤其是那些食肉动物。人道主义者企图消灭野兽的“不人道”的兽性。许多人道主义者都是素食者,他们非常厌恶那些吃生肉的动物。

从现代环境主义的观点来看,猎物保护区的另一个局限是缺乏以所有物种为本承认其整体价值的生态学理论基础。没有完全顺其自然,某些动物受到了特别优待。农民对害兽的传统而宽泛的定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猎物保护区的工作。萨比保护区的第一任主管詹姆斯·史蒂文森—汉密尔顿急于恢复该地区动物的数量,提倡在管制猎手和偷猎者的同时,也要捕杀诸如豹子、狮子、野狗和某些蛇类的食肉动物。在美国的动物庇护所,这些“恶棍”也没有获得特赦。美国的动物庇护所大多是为了保护迁徙的野禽并改善其生存环境而设计建造的,管理人员不仅要恢复湿地原貌还要射杀枭和鹰。同样,美国的国家公园也“清理”了山狮(美洲虎)和狼。相反,被认为有用的或受欢迎的物种却得到精心饲养,并分散到了保护区之外进行繁殖。

另外,野生动物保护不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把野生动物数量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无论这一点如何来衡量,而是要在严格划定的区域内抢救某些濒危动物。由于这些濒危动物不再对文明构成威胁,
30 所以它们能够得到保护成为幸存者,这表达了更高一级文明慷慨大方的伦理。在其他地方则一切如故,对经济增长、民族进步或人类至上思想几乎没有限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变成了严格附属的土地使用部门,是与处于支配地位的私有财产权并立的另类。如果一只动物跨越

了保护区那条看不见的行政管理界线，它就会从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沦为被捕杀的猎物或害兽。“吃羔羊”的秃鹰既是小毛皮动物和鲑鱼的克星，也是美利坚的民族象征。但只是到了1940年，白头鹰才摆脱被冷落的状态，开始作为“美国自由理想的象征”而受到推崇，不过，对它那白头的捕杀奖励在其最后的据点阿拉斯加一直维持到1945年。

殖民者的狩猎活动及其狩猎法规剥夺了当地居民珍贵的食物资源。在十九世纪那个极度狂热的时期，狩猎几乎摧毁了南非和美国物种的丰富性。欧洲人及其后裔构想的进步要想发生，就需要一块清理干净的地基，在这块地基上，主要靠引进的新的生产方式才能落地生根。复杂而又傲慢的殖民地图突出了新的不熟悉的道路、城镇以及界定私有财产的栅栏。不仅土著居民被排除在外，甚至连那些前殖民时期“旧”世界的居民也不例外，其窝巢、饮水点以及杀戮场都曾帮助界定和构建昔日景观中的空间关系。虽然一些物种和栖息地在新的物质世界的夹缝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它们基本上都被严格束缚住了，繁衍的机会也受到极大的抑制。跳羚曾经徜徉生活的地方，现在只能看到美利奴羊、蹄兔和豺。野牛让位于赫里福德牛。曾经显著鲜明的特征景象早已随风而去，留下的是残存的蛛丝马迹。

31

参考文献和阅读书目

- Audubon, James (1831—1839) (1971) in David D. Anderson (ed.), *Sunshine and Smoke; American Writers and their Environment*,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Beinart, William (1990) ‘Review article: Empire, hunting and ecological change in southern and central Africa’, *Past & Present*, 128 (August), 162—186.
- Brody, Hugh (1986) *Maps and Dreams*, London: Faber & Faber.
- Caitlin, George (1844; 1989) *North American Indians*, 1989 edn edited by Peter Matthiessen, London: Penguin.
- Carruthers, Jane (1988) ‘Game protection in the Transvaal’,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 (1989) ‘Creating a national park, 1910 to 1926’,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5 (2), 188—215.
- (1994) ‘Dissecting the myth: Paul Kruger and the Kruger National Park’,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20 (2), 263—284.
- Cumming, R. G. (1856) *The Lion Hunter of South Africa: Five Years' Adventures in the Far Interior of South Africa*, London: John Murray.
- De Kiewiet, C. W. (1941)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phick, R. (1985) *Khoi Khoi and the Founding of White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Ravan Press.
- Fitter, Richard and Scott, Peter (1978) *The Penitent Butchers: Seventy-Five Years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London: Collins.
- Flores, Dan (1991) ‘Bison ecology and bison diplomac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 (September), 465—485.
- Gard, Wayne (1959) *The Great Buffalo Hun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Guy, J. (1980) ‘Ecological factors in the rise of the Zulu kingdom’, in S. Marks and A. Atmore (ed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 London: Longman.
- Hall, M. (1987) *The Changing Past: Farmers, Kings and Traders in Southern Africa, 200—1860*, Cape Town: David Philip.
- Harris, W. C. (1839) *The Wild Sports of Southern Africa*, London: Bohn.
- Irving, Washington (1835; 1985) *A Tour on the Prairie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Lee, Richard (1979) *The !Kung San: Men, Women and Work in a Foraging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opold, Aldo (1933) *Game Managemen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 McCarthy, Michael (1976—1977) ‘Africa and the American West’,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11, 187—201.
- MacKenzie, John (1988) *The Empire of Nature: Hunting, 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arks, Stuart A. (1993) *Southern Hunting in Black and White: Nature, History and Ritual in a Carolina Commun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erchant, Carolyn (1985) ‘The women of the progressive conservation crusade: 1900—1915’, in Kendall E. Bailes (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Critical Iss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Amerci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 Merritt, John I. (1985) *Baronets and Buffalo: The British Sportsman in the American West, 1833—1881*, Missoula: Mountain Press.
- Reiger, John (1986), *American Sportsm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servation*,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Ritvo, Harriet (1987)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Glen O. (1975) *The Forest Service: A Study in Public Land Manage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Roe, Frank Gilbert (1970) *The North American Buffalo*,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Sansom, B. (1974) 'Traditional economic systems', in W. Hammond-Tooke (ed.), *The Bantu-Speaking Peoples of South Africa*, Cape Tow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erwood, Morgan B. (1981) *Big Game in Alaska: A History of Wildlife and Peopl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kead, C. J. (1980) *Historical Mammal Incidence in the Cape Province*, vol. 1, Cape Tow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 Spence, Clark C. (1959) 'A Celtic Nimrod in the American West', *Montana: The Magazine of Western History*, 9 (Spring), 56—66.
- Stevenson-Hamilton, James (1952, 1993) *South African Eden: The Kruger National Park 1902—1946*, Cape Town: Struik.
- Taylor, S. (1989) *The Mighty Nimrod: A Life of Frederick Courtenay Selous, African Hunter and Adventurer, 1851—1917*, London: Collins.
- Thomas, Elizabeth Marshall (1958) *The Harmless People*, New York: Vintage.
- Thomas, Keith (1983)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London: Penguin.
- Thoreau, Henry D. (1862; 1895) 'Walking' in Carl Bode (ed.), *The Portable Thoreau*, London: Penguin.
- Trapido, Stanley (1984) 'Poachers, proletarians and gentry in the early

- twentieth-century Transvaal', unpublished paper given at the African Studie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 Tuan, Yi-Fu (1984) *Dominance and Affection: The Making of Pe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James (1980) *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Animals, Pain and Humanity in the Victorian Mi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agner, R. (1980) 'Zoutpansberg: Some notes on the dynamics of a hunting frontier, 1848—1867', in S. Marks and A. Atmore (ed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 London: Longman.
- Wilmsen, E. (1993) *Land Filled with Fl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son, Monica and Thompson, Leonard (eds) (1969)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 1, *South Africa to 197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ishart, David (1979) *The Fur Trade of the American West: A Geographical Synthesi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第三章

树木的兴衰：森林、采伐和林业

由多种硬木和软木树种组成的盘根错节的茂密森林经常是人们脑海中北美自然环境的主要内容。最近拍摄的电影强化了这种树木茂盛的形象，例如，根据 J. F. 库珀的小说（1826）改编而成的《最后的莫西干人》，其背景是覆盖着白桦、山毛榉、槭树、铁杉、冷杉和云杉的纽约州北部的荒野边疆。与此相反，如果想描绘南非的自然界，树木（尤其是森林）很少会在脑海里闪现。其实，南部非洲生长着种类繁多的树木和灌木，特别是硬木树种，有将近 900 种之多。但是，由大树组成的密林是其植被覆盖中数量最少的。大多数林木茂密的地区亦即降水最丰沛的地区——东海岸和开普南部海岸地区的亚热带森林。

常用的统计数据强化了人们固有的观念，即这两个区域的林地比例存在巨大差异。南非的原始森林只占国土总面积的 0.25%，商业种植园的森林只占 1% 多一点。而据估计，1492 年美国本土的林地面积超过了 40%。现在美国的森林覆盖率是三分之一，远远超过二十世纪初的数字。但是，我们应该发掘出概念和死板的统计资料背后的东西。在美国，树木过去和现在都是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的主要植被类型。西北地区的太平洋沿岸也同样林木茂盛，这里有阿拉斯加狭长地带世界上最大的温带雨林，加利福尼亚沿海山脉和内华达山脉坡地。不过，

虽然美国拥有这些森林和更小的例外，但是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许多地区要么是无树的沙漠、半沙漠，要么就是草原。在南非，广阔的干旱台地(Karoo)以及大部分高地草原没有森林。但是，没有森林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树木和大型灌木。除了海拔最高最冷的地区之外，南非大部分地区的林地和灌木丛生地都分布着种类繁多的物种。灌木与树、林地与森林的区别虽然深刻地影响了统计概念，但实际上并不太严格。不管在植物学上有多么明确的定义，但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观察者怎么看。

尽管这两个地区树木覆盖的性质有很大不同，但在殖民地开拓造成的冲击和前殖民以及殖民社会对树木的使用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和研究野生动物的情况类似，分解影响林木植被的不同过程肯定有助于我们的研究。有些树因具有木材价值而遭砍伐，可用来做桅顶和乐器等等，有些树木被清除仅仅是为了给殖民者的庄稼和牛腾出地方。同样，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的对自然资源保护的根本原因包括了许多有时是互相矛盾的推动力——从战略因素和科学的担忧到商业考虑和审美的需要，不一而足。本章将要探讨人类对于树木依赖情况的变化以及关于树木保护的争论。

树木与人

人类出于名目多得惊人的基本需要而对树木所产生的依赖程度很容易被低估。原始居民和早期殖民者利用树木盖房造船，获取水果、阴凉和柴火，熏制食物，制成药品、染料、武器和艺术品，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工业技术拓展了人类获取木材并使其商业化的能力。虽然从混凝土到塑料等新材料的不断出现意味着人们在基本需求方面不必再如此严重地依赖于树木，但是这些历史悠久的功能很少被完全取代。

长久以来人类的干涉致使“自然的”森林和林地的概念颇受争议。

生态系统在人类出现以前是稳定的并已经发展到顶级这种传统观念正在受到挑战。气候变化、地质灾变、闪电和动物种类都能从根本上改变植被变化的动力。例如,大象会把树木连根拔起并剥去树皮,帮助了灌木蚕食树木的地盘。它们也通过传播种子“栽种树木”——它们温暖、营养丰富的排泄物为种子的生根发芽提供了理想的温床。^① 相反,美国的科学家们指出,野牛由于踩坏了苗木而阻止了大草原上树木的生长。

35 在世界历史上人为的环境转型中,最基本也是最广泛的是为了放牧和耕种而清理林地。早在欧洲殖民前夕,清理林地就已在南非林木茂盛的沿海地区开展了。到过亦牧亦农的非洲酋邦的旅行者提到德拉肯斯堡山脉和大海之间绵延起伏的农村那葱郁的牧场、田野和林地纵横交错。格兰德河以北的美洲印第安人对树木覆盖的总体影响较小。虽然他们没有放养家畜,但是现在越来越清楚庄稼是缅因以南大多数部落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占到其生存所需的一半以上。一般说来,种植业在土著经济中占的比重越大,人口密度就越大,树木清理的范围也就越广泛。

狩猎—采集者为吸引猎物而烧荒,也从树上采集果实。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以猴面包树的果实为生。人类学家 R. B. 李 1960 年代在昆桑人^②中进行了实地研究,他认为,维持昆桑人生存的半数食物采自这种树。当男人们彼此分享狩猎远征的故事时,女人们在从事同样重要的坚果收集劳动。橡树果面包和玉米粥是加利福尼亚海岸居民渔猎文化的主要成分。不过,这种类型的采集不会对资源造成破坏。

① 在德兰士瓦部分地区肥田时,不起眼的莫伯尼虫(毛虫的一种)可能比大象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最近的估计是,1000 英亩土地上一般数量的毛虫能在一个多月排泄价值 25 万兰特的粪肥(Styles, 1994)。

② 昆桑人(!Kung)是桑人的一个部落。Kung 前面的惊叹号代表该族语言的一个独特发音。——编注

相反，农业要求清除树木。最常用的方法（总是男人的工作）是环剥树皮切断树液的流通和用火烧倒树木。留下根部任其腐烂，但在北美树根稍后就被清除。树灰经常被用作有价值的肥料。即刻可在烧焦的树桩间播种。最极端的情况会用直接在树灰而不是土壤中播种的耕作形式（在中部非洲被称为 *citimene*）。在种植几年之后田地要休耕。次生树木最终会重新覆盖休耕地，尤其是在北美，尽管树种和以前大不相同——硬木和针叶树更少。薪材供应的萎缩和土地肥力的下降要求必须周期性地迁移定居点，因为妇女是主要的采集者和消费者，所以通常由她们来做这项决定。

但是，农业并不是土著人生活方式下造成森林滥伐的唯一因素。修建篱笆和牧场围栏也需要大量木材。在十七世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殖民者生活在特拉华山谷里。许多阿尔冈昆部落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住小木屋的习惯。除了高地草原上树木稀少的部分地区之外，所有的非洲人的建筑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用木材和芦苇搭建的。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非洲人的建筑风格转向使用抹泥枝条^①或土坯 36 建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木材供应发生变化的回应。

正如猎物和狩猎研究一样，对前殖民时代木材采集的可持续性长久以来一直都存在争议，尤其是在把它与轮垦联系起来考虑时。从 1820 年代起就一直在茨瓦纳人中传播福音的苏格兰传教士罗伯特·莫法特站在了南非批评土著民族滥伐森林的传统的最前沿。茨瓦纳人城镇的人口能够达到上万人的规模。据莫法特说，他们是：

一个有砍树癖的民族——不是为了建设自己的城镇而把崎岖的山地夷为平地，而是丝毫不顾景观和经济价值地砍倒每一种树

^① Wattle(枝条)这个词是后来才用于特指一种澳大利亚植物的。因此，抹泥枝条的建筑结构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树木来完成。

木……因此,当他们要确定一个城镇的位置时,其首要考虑就是要尽可能地靠近灌木林地。整个林地就必然被砍光,仅留下几棵孤零零的树:每位大人物的地里留一棵,供遮阳避热,体弱者在树阴下散步或乘凉。(Grove, 1989:169)

因与白人接触而产生的变化,以及因接触往往早先到来的外来物种而产生的变化,加剧了对环境的冲击。生活在大体上没有树木的美洲大草原上的捕猎野牛的部落,为了给自己的马匹提供越冬饲料,大面积剥去了棉白杨和柳树的树皮,还砍掉了河畔林地里的幼树。十九世纪初,像科罗拉多“大树林(Big Timbers)”这样的过冬营地中能聚集将近一千名印第安人和两万匹马和骡子(Sherow, 1992)。对保留地的限制出台后,这些聚集地的规模膨胀起来,对木材的需求成倍增加了。南茨瓦纳人的酋邦领地利用对马车运输的投资,为满足金伯利采矿市场的需求砍伐了大量的骆驼棘(Shillington, 1985:102—106)。

莫法特明确地把茨瓦纳人对树木的破坏性行为归结到他们的异教信仰。但是,自1960年代以来,评论家们强调的是异教的生态优越性。前殖民时代的意识形态与树木保护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这肯定是有据可查的。人们相信树木可以庇护神灵,尤其是在津巴布韦人的宗教崇拜体系中,神龛经常被安置在小树林中。当殖民官员在二十世纪鼓吹“干净”种植即彻底清理田野以增加产出时,遭到了当地人的反对(Wilson, 1989)。农民们之所以反对,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看到了农田中树木的较实用价值,例如提供阴翳、腐质土壤和果实(参见第六章)。但37也有强烈的宗教暗示,那就是他们害怕触怒神灵。在北美和南非,生态敏感性经常表现在对祖先的崇拜和对“神圣”墓地的保护中。

撇开土著灵性与环境态度这一错综复杂的难题不谈,我们似乎能清晰地看到,南非和北美地广人稀时,刀耕火种方法在这两个地区的实践仍是可以容忍的。这种情况随着殖民者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发生了急

剧变化。在南非，从十九世纪后期起，由于白人的侵占，日渐增加的非洲农民耕种着越来越有限的土地。残存下来的小股美洲土著人被聚集到根本不适合农业生产的地方。

树木对当地人和殖民者来说都是一种能量来源。宗教异见者罗杰·威廉斯被迫离开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创建了罗得岛殖民地。他记录了(1643)当地的纳拉干族印第安人如何(基于自身砍光村庄周围地区的树木而不得不整体搬迁的经验)推测英国殖民者之所以背井离乡来到新英格兰，是因为耗尽了故乡的燃料供应(Merchant, 1993: 75)。他们的观点并非毫无道理。十六世纪以来的欧洲木材短缺和其他悲惨境遇共同促成了海外移民。此外，新世界的木柴短缺在殖民的十到十五年后就成了一个地方问题。新英格兰非常丰富的树木助长了殖民者在建造住房和壁炉时都偏大的浪费行为。新英格兰人偏爱的敞开式壁炉跟相对要更拘谨的宾夕法尼亚德国人使用的铸铁封闭炉相比，其效率要低四到五倍。

美洲殖民者将木材用于建筑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木材代替了砖头，雪松木瓦取代了茅草和石板瓦。来自南开普海岸森林的黄香槐和臭木为格雷厄姆斯敦这样的殖民定居点提供了制造地板和家具的原料。新英格兰独具特色的石墙实际上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纪早期(标志着向旧世界的回归)，是当养护那些不耐用的木制篱笆变得过于昂贵之后才出现的。在南非，当地的木材从来都不足以用来扎篱笆。但是，人们砍下荆棘丛做牲畜栏。当有刺铁丝围栏蜿蜒遍布十九世纪后期的乡村时，结实耐用的喷嚏木则被用做固定的木桩。

在殖民时代的北美，树木最重要的非民事用途是用来造船和作为海军补给品。通过这种途径，北美的英属殖民地很快就被纳入国际经济。白栎可以提供木材和板材，而五针松可以制成世界上最好的桅杆。³⁸早在1691年，英国皇家就颁布命令保护海军补给品，达到一定尺寸的树木都被标上了所谓的宽箭头(类似于乌鸦的爪子)。一名皇家林场检

查员明示在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1744—1748)中的民兵,不仅要提防印第安人,还要查看他们用来藏身的树木是否适合做桅杆(Malone, 1964:193)。当挺拔的松树和雪松被砍倒做成木瓦和独木舟时,人们开始谴责这种浪费行为。

禁止砍伐树木是导致殖民者和皇家分道扬镳的一个主要因素,特别重要的原因是波士顿已经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英国的政策阻碍了大规模锯木业的发展,也阻碍了蓬勃发展的板材贸易。板材贸易是为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种植园和大西洋上诸如马德拉群岛这样的“葡萄酒岛屿”提供制桶用的木板的——到十七世纪后期,这些岛屿本身大部分已经光秃裸露。开普的树木变成了定期来往于开普至亚洲和澳大利亚航线上的轮船的燃料来源,英国当局也对那里的海军供给充满忧虑,于是划出了该地区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好望角南部海岸(短命的)普莱腾堡湾(Plettenberg Bay)保护区(1811)。

木材新开发的工业用途包括为车辆、站点、围栏、桥梁、高架结构和枕木提供材料。到1890年,据估计全美仅铺设新铁路和替换旧铁路每年就需要7300万根枕木;在化学处理方法发明之前,枕木使用五到八年就需要更换一次(Pisani, 1985:344)。内河船只和工厂转向使用蒸汽动力也加重了对木材的依赖。木材的相对丰富意味着,在贝塞麦炼钢法^①出现之后的很长时间,木炭依然是炼铁不可缺少的基本燃料。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芝加哥因其作为全国铁路枢纽的地位而成了全国的木材中心,把来自大湖区的木材运往全国各地。为了开拓西部边疆的无树平原,五针松这种最佳的锯材原木树被成片伐倒;著名的茅草屋(和麦秆堆)边疆的现实基础是有限的。

当代观念倾向于把毁林等同于在亚马逊河流域和东南亚对热带硬

^① 又称酸性底吹转炉炼钢法。1855年由英国人贝塞麦(H. Bessarmer)试验成功。——编注

木的大规模商业采伐。南部非洲边疆的商业采伐被限制在相对较少的区域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的树木就可以幸免于难。纳塔尔沿海地区是南非天然植被最茂盛的地区之一，但甘蔗种植的成功永远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景观。在美国，采伐边疆更为清晰可辨。在内战爆发 39 前几十年，采伐边疆从新英格兰殖民地迅速推进到了大湖区，内战后向南部推移，到十九世纪末穿越大陆挺进到了太平洋沿岸的西北地区。但是商品化农业导致的毁林更为分散，树木倒在耕犁和斧头下。另外，诸如烟草这样的农作物也需要大量木材来烘烤烟叶，德兰士瓦和津巴布韦也种植这种美洲的主要作物。

技术变化会增加对木材的需求，但也能缓解对特定树种或地区的压力。1884 年铁路铺设到金伯利并通过它从一千公里之外输入了煤炭，避免了半干旱地区的树木遭受进一步砍伐。十九世纪后期，矿业发展引发了广泛的植树造林。即便如此，白水岭金矿也不能严重依赖木材作为燃料，金矿扩张导致了煤炭行业的迅速发展。白水岭金矿主要的电力公司被命名为维多利亚瀑布电力公司，这显示出对水电供应的良好愿望，但是不切实际，煤仍然是能源供应的支柱，其肮脏呛人依旧。雨后春笋般迅速涌现的矿业与公司城镇消费了大量木材，弄得美国边疆的地表到处坑坑洼洼。虽然美国以木材为主要动力的时间延续得比南非长，但是煤、电力和钢铁最终还是取代了木材在美国采矿业中的作用。

克罗斯比把往往无心的植物交流视为殖民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植物交流后来通过商业和科学指导的系统化的植物进口而得到补充——有时后者甚至超过了前者。由于明显缺乏速生丰产、树干笔直的树种，南非必须优先安排进口木材。拥有丰富的易加工的软木资源的美国，除了比较干旱的西部，大体上在木材流通领域能够自给自足。温带北半球的针叶树不失为弥补“先天不足”的一种有效方法，但主宰南非新植物区系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金合欢树和桉树。像加利福尼亚

这样的地区也是如此,只是范围没有南非那么大而已。这些大洋洲的自然物种不但生长迅速(四年里可以长到二十英尺高)、繁衍能力强、耐旱、可以提供阴凉,而且顺利地适应了新环境,在相当贫瘠的土地上茁壮成长。在加利福尼亚,桉树为该州提供了大部分铁路枕木;在南非,它们被用做电话线杆和坑道撑木——采矿业当时消费了该国 20% 的木材产量。在二十世纪早期的津巴布韦,矿主们被赋予实际上的全权,不
40 但要攫取自己土地上的木材,而且可以采伐其他白人农场上的木材。

1860 年以后,黑色金合欢树不但扩张到纳塔尔的大部分地区,还进入了德兰士瓦境内,它的扩张取决于充足的降水和没有霜冻。最初引进它是为了提供家用木料和燃料以及为牲畜避风遮荫,但到 1870 年代,它开始被作为鞣料树皮的来源而专门栽种。金合欢树为制革业提供了基本原料,制革业是十九世纪为数相当少的几种家庭工业之一。开普平原也种植这种适应性很强的外来植物的亚种,用以固定当地的流沙。尤其重要的是,金合欢树变成了特兰斯凯地区黑人聚居区林地的主要树种。成片栽种是为了给当地人提供燃料和建筑材料,这就形成了本地特色的建筑形式(Sherry, 1971)。金合欢树种植园经常越界侵占草地并侵入既有的林地。金合欢树和桉树因此而成为导致某些野生动物消亡的罪魁祸首。没有几个本地动物种类能够依靠桉树叶子存活下来。这些树木直到现在还蒙受骂名:降低地下水位,耗竭泉源,甚至造成水土流失。

长着锋利的刺和锯齿状叶子的龙舌兰(世纪植物)被从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引进到南非。它在自己的故乡是阻碍欧洲人探险的令人痛苦的障碍物,有时会伤了骑马的人。(它现在依然会制造麻烦,会刺穿越野车辆的轮胎,这一点倒是让沙漠保护主义者甚感欣慰。)在南非,人们种植带有尖刺的龙舌兰做牲畜栏,以防牲畜跑出。这种龙舌兰也是一种极好的、可以防止水土流失的植物,因为它不但可以生长在十分贫瘠的土地上,而且还能阻止牲畜啃食沟壑间的植被;砍下来的话,也可以

当做干旱期间动物的饲料。

开普的官方植物学家、南非 1860 年代保护主义的领袖约翰·克劳姆比·布朗在为引进最适应当地环境且攻无不克的桉树奔走游说时使用了达尔文主义观点 (Grove, 1989: 184)。不过,像布朗这样的狂热支持者可能没有预估到这些外来超级树种带来的某些后果。为了提供树荫和防护林带,人们将柽柳从北非引种到美国西南部。但它一到美国就疯长,很快就变成了野生植物,破坏了当地植被。由于偏好溪流、水库和灌渠附近的潮湿地带,另一种亚洲柽柳在世纪之交被引种过来。显然,种植这种柽柳能控制土壤侵蚀,但是它也挣脱了人们的控制,至今仍难以彻底消灭。在十九世纪大受欢迎的桉树因其具有极强的吸水能力和使土地干化的特性,现在无论在哪里都被认为是一种不利于当地环境的树种。在西开普,像松树和哈克木这样的外来树种侵入了格外异质和敏感的凡波斯(fynbos)植被区。

这两个地区现代环境主义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特征就是植物恐 41 外。面对更加适应环境的外来物种令人窒息的涌入,他们要求重新确定本地原有品种的利益。这种对原有物种纯洁性和生物多样性的专注排斥了生态演替的国际动力机制,引起了棘手的问题:自然渴望这种原始的完美状态吗?外来物种能够本土化吗?所有生物引种都该被铲除并遣返回家,这样一种观点是很难站住脚的。果真这么做了,美国就将不得不靠玉米饼和炒豆为生,南非则要靠跳羚肉饼果腹了。从拓荒妇女精心带到西部的插枝长成的果树 (Kolondy, 1984) 和其他珍贵的财产一起都将不得不被连根拔掉。长期以来美化了开普庭院并逐渐构成了当地特色的东方物种——赤素馨和枇杷也将销声匿迹。加利福尼亚和好望角的葡萄园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是,正如引进外来物种有可能丰富了这些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一样,特定植物获得成功也会威胁到本地物种的多样性。所以,必须严格控制这些疯狂的物种入侵者,甚至要消灭在专门用于保证当地物种繁荣昌盛的生态龛中。

林业与资源保护

在劳动力匮乏而自然资源丰富的美国，保护人类能量几百年来一直都比保存树木更重要。虽然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采用摇晃树干或抛打的方式收集橡树果，但这不符合殖民者的脾性。一位怀疑主义的欧洲参观者在 1790 年代访问了新泽西，他不敢相信地报道说，美国早期拓荒者“为了免去摇树或摘果实的劳作……发现把树砍倒了再采果实更简单”（转引自 Jacobs, 1980: 51）。如果森林因为经济原因而被破坏，它也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受到保护。两个地区第一批殖民地森林保护区，和狩猎规定一样，是遵循欧洲保护逐步减少的自然资源的悠久传统而建立起来的。

在建立仅六年之后，普利茅斯殖民地就在 1626 年开始规范森林砍伐行为，荷兰殖民官员十七世纪在开普敦周围也这么做了。在这一阶段，殖民者甚至还开始种树。总督西蒙·范德施特尔推动在开普种下了 1.6 万棵橡树。橡树虽然是外来物种，但却成了移民定居和殖民文明的一个象征。⁴² 林业看起来也经历了和控制猎物资源相似的、从规范砍伐到创建保护区的发展进程。前述南非 1811 年在普莱腾堡湾建立森林保护区的尝试不久就取消了，美国联邦政府在大约同一时段进行的最初努力也是如此。随着南非在 1845—1847 年间遭受严重的旱灾以及诸如雪松山脉的雪松等原始森林遭毁事件的曝光日益增多，新的森林保护区和防止草原烧荒的措施一起在 1850 年代迅速出现。

格罗夫把这些发生在开普的创举与殖民帝国保护树木的悠久历史联系在一起。他指出，环境退化的经济后果在十七、十八世纪主要贸易和航行路线沿途的岛屿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殖民管理当局被迫要正视诸如毛里求斯和圣赫勒拿岛这样的中途补给站无力供应木材、食物和淡水的问题。其中，森林滥伐给人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也催生了世

界最为完备的早期资源保护主义立法(Grove, 1990)。

到十九世纪中期,对于干化的科学思考进入了林业的争论范围。干化理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根植于民间信仰。赞成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区森林清理的一个充足的理由是,这样可对按照英国农业标准来衡量过于寒冷和潮湿的当地气候产生调节作用(使之变干变暖)。然而,从十八世纪新英格兰评论家的观察资料中可以发现,森林滥伐干化了土壤,使土地在夏天更热,在冬天更冷——这与人们的预期正好相反!他们还记录了森林清理如何增强风力、提高水分蒸发速率和雨水径流量。这导致了更大范围的洪灾和河流流量的紊乱。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科学正式确定了树木覆盖、降雨和土壤侵蚀之间的关系。英国驻印度的官员把森林滥伐和干旱的威胁以及干化联系在一起。到了十九世纪末,森林滥伐对气候和降雨有直接影响的传统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详细讨论。当 1889 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约翰斯敦的特大洪水吞噬数以千计的生命时,分水岭地区的森林滥伐立刻就被认定是造成洪灾的罪魁祸首^①。

1907 年从印度调往好望角负责灌溉事宜的帝国官员 F. E. 坎特哈克不但相信森林在防止土壤侵蚀和泥沙淤塞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还坚定认同森林可以增加雨量的观点。因为,如果认为森林清理会导致气候暖化、干化,那么反之亦然:造林将会让干燥地区变得凉爽、湿润。根据这种理论,树木用根系吸收地下水,然后通过树叶释放,冷却流动的 43 空气,促进水蒸汽的凝结。另外,树冠还可以减少散热,降低温度。十九世纪后半期,相信这种正统的科学理论的美国林务员和科学家们鼓励大平原的移民植树造林。《植树法》(1873)采纳了这种理论。它向宅地拥有者额外授予 160 英亩土地,条件是要在其中 40 英亩栽种树木。

^① 把干化理论当成是影响全球而非地区气候变化的一个因素这种说法一直还有争论。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无树的内布拉斯加州开始了植树节这个每年都要举行的社区植树活动，现在南非也设立了植树节。

从科学和经济这两个不同角度关注森林的活动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开普在某种程度上合流了。1858—1862年担任开普官方植物学家的奥地利人路德维希·帕普是最早对这一地区森林和牧场状况发出警告的人士之一。他对发生在1850年代那些干旱年份中的草原和森林的烧荒行为（由牧人点燃以促进草木生长）尤为担心。资源保护主义思想的种子终于在1859年发芽并结出了初步的绿色果实《开普林草保护法》，这是那个年代最先进的资源保护立法之一。开普殖民政府继续在该地区发挥先导作用，1880年设立了“林木主管”一职，这种模式随后就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殖民政权的威权性质给政府的单方面行动提供了便利。对比起来，软弱的中央政权和强势的地方州政府相结合的统治传统压制了类似模式在美国的产生，更何况当时美国的社会精神特质是不受约束的民众资本主义。因此，美国这方面的早期尝试往往都局限在私有土地上就不奇怪了，如铁路大王乔治·范德比尔特在北卡罗来纳的地产^①。

科学辩论也促使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主要论点集中在乔治·珀金斯·马什的巨著《人与自然；或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地理》（1864）中。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基于广泛游历和认真研究的具有警示作用的欧洲环境史。马什集中论述了放牧和森林滥伐在导致气候干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认为它们是导致古希腊和罗马崩溃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帕普的继任者约翰·克劳姆比·布朗（1862—1866）作为开普官方植物学家，在兜售他的包括了土壤、水、森林和物种在内的一揽子保护计划时也使用了类似的理论（但不是从马什那里得来的）。马什

^① 私人土地上的森林包括农场林地和森林种植园，美国商业木材绝大部分来自这一块。

跟布朗通信时鼓励他把自己丰富的观察和研究发表出来，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南非水文学》(Grove, 1987: 32)。

这些形式各异的探索性活动先于十九世纪后期由美国政府实施的早期林业管理那个最出名的阶段，吉福德·平肖与它有着密不可分的 44 关系。美国环境保护史围绕这一主题做文章已经达到不正常的程度；这种片面的研究甚至把资源保护看成是一种由平肖发明的现象。尽管平肖轻视那些非美国先驱所做的贡献，但是欧洲以外的林业是以旧大陆业已确立的传统做法为基础的。开普殖民当局任命一名法国专家（德瓦瑟洛）为他们的首任林木主管，任命一名德国人为特兰斯凯地区的首任林木主管。同样，美国的第一位林务官是普鲁士人伯纳德·弗诺，他担任了美国农业部林业处的主管。1870 和 1880 年代的其他具有资源保护思想的联邦官员往往也是外国移民，他们为美国自然资源管理注入了欧洲较为成熟的维持生长率和收获率平衡的观念^①。

另外，由于美国没有自己的林学院，平肖不得不前往位于南希的法兰西帝国林学院（1824 年成立）留学。在那里，这位崭露头角的青年林务官学习法国、德国和瑞士严密的林学知识传统。但是，对平肖和美国林业最直接也是起效最快的影响来自英属印度——宗主国的木材需求完全依赖殖民地的森林种植园。在印度受到训练的资源保护者和欧洲人一起加入到新兴的南非林务官僚体系中。平肖的指导老师是生于普鲁士、担任印度帝国林业部主管的迪特里希·布兰迪斯爵士。平肖最后也在他的自传(*Breaking New Ground*, 1947)中承认，“资源保护”这个术语的提出受到了英国森林保护机构的启发。（这个词此前主要局限于描述对果实的保存和蜜蜂的养护。）对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有关林学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和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林学的跨国兴起当成一个专业领域来研究。林学从它的欧洲老家走出来，逐渐进入

^① 这种森林管理的思想在当前流行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中有所反映。

由各种联系、观念、经验、反应、专业知识和刊物组成的交流网络。为林业管理人员设立的培训机构不一而足,从耶鲁林学院(由平肖家族资金支持于1900年建立)到牛津大学林学系,后者得到了殖民部的资助,并于1924年改为帝国林学研究所。

45 林业有时候包括对本土物种的保护,大体上也包括对分水岭地区的保护,但其首要使命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商业性育林。美国十九世纪后期资源保护运动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关注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甚至是美国文明的未来和大国地位。正如弗诺在1902年警告的那样:“爱国精神的消亡会导致一个国家寿终正寝,其自然资源的枯竭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Merchant, 1993:349)与美国的情况相似,帝国林业管理也受制于二十世纪初英国90%以上的木材需求依靠进口这一事实。在英国受训的殖民地林务官对本地和宗主国的木材需求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林业就变得非常功利化,反映了帝国管理殖民地森林和进步运动时期美国管理国家森林的思想。既然大多数人都把森林看作种植树木的农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林业局被置于农业部内。在开普,林业部(1876)的设立比管理农业的部门要早,大约过了二十年时间才被后者合并。

在开普,德瓦瑟洛系统引入了成规模地种植松树的方法。平肖在南希学习时所羡慕的那种排列整齐的法式森林被引进形成了美国式森林图景:树木像农作物一样栽种既易收割又可更新。他领导的林业局还意识到要与企业界建立合作关系,例如给铁路公司提供哪些木材比较适合用做支架和枕木这样的信息。与传统的历史学说法相反,除去民众主义的包装之外,在美国的森林保护史中并没有强烈的、要求讨伐木材大王的内容。在木材过剩和长期存在激烈竞争的时代,这种保护往往得到那些看到法规调节和产量控制确有价值的人士的热情支持。抗议“普鲁士林业管理方法”最积极的是那些觉得自己遭到了商业日益理性化和卡特尔化的排挤的拓荒者类型。

资源保护主义中的功利派和审美派本是能够同舟共济的，但也存在一种分裂的倾向，这在美国特别强烈。那些希望在美国的国有森林（第一批在1891年建立）中让自然维持原状的人士是被边缘化的少数派，被贴上浪漫主义的审美派或非功利性自然保护主义者的标签——尽管他们也看到了中央政府在保护自然方面发挥的持久作用。虽然功利性保护主义的风尚占据主流，而这支在当时仅仅是涓涓细流的非功利性保护主义也值得注意，因为它会扩大而进入现代环境主义的主流（参见第六章）。

同样可以看出，殖民地和南非的林务工作中也有一种潜在思潮着眼于生物多样性，以及更注重审美学和整体性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 46 人宣称森林滥伐是很恶劣的：

在大多数人看来，毁林意味着破坏本国最肥沃地区，意味着本国仅有的美景被损毁……而文明政府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就是要直面反对破坏森林的行为……就像必须反对奴隶制和巫术等其他社会罪恶一样（Hutchins，转引自 Grove, 1989:185）。

美国的女性拓荒者可能比男人对荒野的壮美更敏感。在反映边疆生活的出版物中，她们发表的边疆生活感想表现出对男性砍倒宅地周围每一棵树那种倾向的厌恶。她们更喜爱树木带来的美景和阴翳（Kolodny, 1984）。一些人提出，原始自然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可以让人在休憩中振作疲惫的精神。不过美国美学派保护主义有个旗手约翰·缪尔，就公众接受程度、政治影响（尽管他从未掌管过任何政府机构）和其对荒野进行非功利性保护观点的不妥协性而言，南非肯定没有像这样的人物。类似的常常带有煽动性的语言偶尔也会在南非的讨论中出现，但通常是在讨论野生动物时会更富感情。

以消除浪费和不必要的砍伐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主导了树木保护，

这在对待林火的态度中显现出来。留在砍伐后的林地上的枯根残枝是很危险的易燃物，机车迸射的火星、粗心的猎人、牧人烧荒都可能引发灾难。州一级管理森林的行动一般是在火灾发生之后进行的，像 1894 年导致 418 人死亡的明尼苏达州的辛克利大火。在美国，防火是森林保护概念的核心是通过冒烟熊(Smokey the Bear)的成功表现出来的。用熊来做这种象征源于 1940 年代中期，以冒烟熊为代言的防止林火宣传运动在 1950 年掀起了热潮，当时森林火灾后成为孤儿(据推测)的这头小熊被作为防止林火的象征送到了国家动物园度过余生。在南非，也产生了一个类似的象征，那就是孤单的、颇似斑比的幼羚。它的形象在许多告示牌上仍可看到^①。

开普的灌溉事务主管坎特哈克对造价高昂的水坝和灌溉工程的命运发出哀叹，因为水源地植被迅速消失造成了这些灌溉工程的淤塞。在二十世纪早期，奥兰治自由邦的首席森林保护监督官就提议通过大 47 面积造林来保护卡利登和奥兰治这两条西流大河的水源供应。水源地保护也是在植被曾经茂密的纽约州北部建立阿迪朗达克州立公园(1885)的主要动力——要确保在商业上至关重要的哈得逊河和伊利运河有足够的水深来通航。

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南非，无论是在国有的还是私人土地上栽种的树木大体上都是为了满足商业木材消费者的需要。但是，对农村非洲人来说，他们的最大需求是可以进入当地森林以解决燃料和其他生计需求。政府林业部对这些要求决不是充耳不闻，而是允许非洲人在大型森林种植园周边地区收集被风吹落的树枝等。更重要的是，非洲人

^① 近期生物中心论的观点所产生一个后果是，对于国家公园内林火的态度有所反思。1988 年夏天，那些一生中只访问黄石国家公园一次的参观者惊异地看到林火遮蔽了公园的著名传统景点。尽管公园一再保证这种短期的破坏和美景摧残从长期生态来看是建设性的，但游人从中并没有得到多少快感。

居住的特兰斯凯地区的有远见的林务官不但种植了可以转让的林地，还鼓励在门前屋后植树。非洲首领仍然掌握着一些小块的当地原始林地。到1935年帝国林业会议在约翰内斯堡召开时，社区种植小型森林的思想正在普及。在两个地区，树木在农业土地使用范畴中的作用都得到了承认，这种认识的普及在二十世纪早期开始促进农场林业改善。在美国大平原经历的那个“肮脏的三十年代”中，人们认为树木是在失去肥力的私人土地上可以替代棉花的种植物。由此可见，当代发展观念中由农林业概念导致木材文化的绿化决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

不论在美国还是南非，林业的主要任务都一直是商业林的种植和砍伐，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由于包含了对本地植被的取代，从这个意义上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破坏活动；现在美国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森林可被划为“原始森林”。但是，林业的发展却越来越多样化，也更富有想象力。相对未受干扰的林地在为各种动物提供栖息地和维护植物的多样性方面发挥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赢得了支持（参见第六章）。通过美国1960年的立法，森林具有多种用途的学说正式提出来了，其中包括承认森林在野生条件下具有休闲功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林业局内部的因素实际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在亚利桑那州的希拉国家森林中划出五十万英亩作为荒野保护区（1924）。在南部非洲，支持为满足农村消费者的日常需要而发展小规模农林业的声音占了上风。林务官们逐渐超越了那种只把木材当做商品和只把公司当做其客户的狭隘认识，转而注意到了社会、自然与树木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

参考文献和阅读书目

- Brown, John C. (1875) *Hydrology of South Africa*, Edinburgh: Henry King.
- Carlson, K. (1913) ‘Forestry in relation to irrigation in South Africa’, *Agricultural Journal of 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 V, 219—234.
- Cox, Thomas R., Maxwell, Robert S., Thomas, Philip Drennon and Malone, Joseph J. (1985) *This Well Wooded Land: Americans and Their Forest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Cronon, William (1983)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al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Hill & Wang.
- Grove, Richard (1987) ‘Early themes in African conservation: the Ca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D. Anderson and R. Grove (eds) *Conservation in Africa: People, Policies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Conservation and colonial expansion: 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conservation policies on St Helena, Mauritius and in India, 1660—1860’,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1989) ‘Scottish missionaries, evangelical discourse and the origins of

- conservation thinking in Southern Africa 1820—1900’,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5(2) (January), 163—187.
- (1990)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Nature*, 345 (3 May), 11—14.
- Hays, Samuel P. (1959) *Conservation and the Gospel of Efficiency: The Progressive Conservation Movement, 1890—1920*,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enkel, C. C. (1903) *The Native or Transkeian Territories*, Cape Town: Juta & Co.
- Jacobs, Wilbur R. (1980), ‘Indians as ecologists’, in Christopher Vecsey and Robert W. Venables (eds), *American Indian Environments: Ecological Issues in Native American History*,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Kanthack, F. E. (1908) ‘The destruction of mountain vegetation: its effects upon the agricultural conditions in the valleys’, *Agricultural Journal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XXXIII (2), 194—204.
- (1909) ‘Irrig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Cape Colon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gricultural Journal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XXXIV (6), 645—657.
- Kolodny, Annette (1984) *The Land before Her: Fantasy and Experience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s 1630—186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Malone, Joseph J. (1964) *Pine Trees and Politics: The Naval Stores and Forest Policy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1691—1775*, London: Longman.
- Marsh, George Perkins (1864) (1965 edition) *Man and Natur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erchant, Carolyn (ed.) (1993)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Lexington: D. C. Heath.
- Pinchot, Gifford (1947) *Breaking New Grou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Pinkett, Harold T. (1970) *Gifford Pinchot: Private and Public Foreste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Pisani, Donald J. (1985) 'Forests and conservation, 1865—1890',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2 (2) (September), 340—359.
- Ranger, T. O. (1985) 'Religious studies and political economy: the Mwari cult and the peasant experience in Southern Rhodesia', in W. van Binsbergen and J. M. Schoffeleer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in African Religio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89) 'Whose heritage?: the case of Matobo National Park',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5 (2), 217—249.
- Sherow, James E. (1992) 'Working of the geodialectic: High Plains Indians and their horses in the region of the Arkansas River Valley, 1800—1870',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6 (Summer), 61—85.
- Sherry, J. S. (1971) *The Black Wattle*, Pietermaritzburg: University of Natal Press.
- Shillington, K. (1985) *The Colonisation of the Southern Tswana 1870—1900*, Johannesburg: Ravan Press.
- Sim, T. R. (1907) *The Forests and Forest Flora of the Cape Colony*, Aberdeen: Taylor & Henderson.
- Steen, Harold K. (1976) *The U. S. Forest Service: A Histo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Styles, Chris (1994) 'Mopane worms: more important than elephants?', *Farmer's Weekly* (South Africa), 29 July, 14—16.
- Williams, Michael (1989) *Americans and Their Forest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K. (1989) 'Trees in fields in Southern Zimbabw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5 (2), 369—383.

第四章

农业：无限和有限的开发

无限的开发

狩猎边疆和森林滥伐自有由运动、贸易与木材业构成的动力，但是，我们一直认为，它们都与另一个生态转型过程密切相关，即农业的扩张，尤其是殖民者商品化农业的扩张。新作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饲养极大地改变了这两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最为复杂的法规。1930年代初，随大萧条而来的是大平原上发生的尘暴，它在主流环境史中对美国农业的讨论中占有重要位置。风蚀形成遮天蔽日的滚滚黑色沙尘，流沙淹没了篱笆木桩。那些取了启示录式名字的学术著作对此作了描述，俄克拉荷马植物学家保罗·希尔斯的《行进的沙漠》（1935）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南非在1930年代也发生了类似的环境灾难，那些研究这个题目的少数学者严重依赖干旱委员会充满末日情绪和预警性语言的资料。这是分析殖民者的畜牧业和农业导致的生态问题的关键材料，刻画出了“正在形成的南非大沙漠”的轮廓（干旱调查委员会，1922:2）。“南非大沙漠”这个名词源于美洲大沙漠，后者在十九世纪早期的地图上被用来

标注西经 98 度到落基山脉之间的区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指美国尚未被殖民的土地,许多人认为这块土地将永远不会被殖民,因为它的这副模样是上帝创造的,与那些因为殖民占领而受到破坏的土地正好相反。(到干旱委员会进行调查之时,土地贫瘠已经被归因于人而不是上帝或者自然。)在 1930 年代,两位英国殖民土壤学家 G. V. 杰克斯 51 和 R. O. 维特尝试对土壤侵蚀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其研究成果以《掠夺土地》为书名出版了(1939)。他们指出美国和南非均属于退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其中南非的情况更为危急,但是,美国当局却似乎在治理尘暴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

人们很容易把尘暴看作是长达三个世纪滥用土地必然导致的最终恶果——如果把土著的活动考虑进去的话,时间还会更长一些。然而,在发生如此剧变之前,农业活动导致的环境破坏就已经发生并经历了复杂多变的历史。另外,关于 1930 年代这种强调退化的、带有目的论和宿命论色彩的观点在理论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土壤的暴露与侵蚀在野火、干旱、地质力量以及动物刨穴等自然因素影响下也会发生。人类活动加剧了这些自然过程造成的破坏,而且殖民农业虽然要为主要的环境损失负责,但决不是所有的环境损失都是不可逆转的。从 1930 年代开始,生态史学的开创者詹姆斯·马林就为美国殖民农业提供了最有力的学术辩护。他立场鲜明,坚信人类侵占草地引起的环境变迁只起到加剧而不是根本改变的作用。另外,不论在南非还是美国,早就有人认识到有必要对殖民农业中最为浪费的方面进行约束和控制。

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明显浪费了自然的慷慨赐予,但两国都在有限的几个农产品净出口国中维持了自己的地位。确实,这两个国家的相对富足都是依靠能源密集型和具有潜在污染性的技术来维持的。至少在南非,即使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贫困的黑人群体也从未获得粮食安全保障。但是,我们依然必须对环境绝望主义的肤浅论调保持警惕。如果环境史学家在审视过去时脑海里只有一种认识——掠夺,字典里只

有一个词汇——退化，他们就很难对自然界在不同情况下的重建和再稳定做出恰当的分析和描述。所以，在使用破坏这个概念的同时应该想到另一个概念：转型。

如前所述，土著居民不是单纯依靠肥沃的土地生活，他们实际上也积极肥田。自然资源的位置和实用性深深地制约着人类的农业生产能力。在南非东海岸那依山而下的水源充足的乡间田野上，数百条大小河流奔腾流下德拉肯斯堡山脉然后汇入大海，非洲人居住点可以星罗棋布，农田分散在住所周围的沃土上。而在平坦的内陆高原地区，供水 52 不足导致居住点和田地更为集中。土著居民的祈雨仪式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可以抚慰一直游荡并保护着本族田地的祖先之灵；另一方面，这种仪式在农业周期的严峻时刻能把土著族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在殖民者到来之前仅种植有限的几种作物（高粱、南瓜和豆类）、使用自制的铁锄，但是这种农业形式留下了持久稳定的印记。殖民者自称他们进入的是空旷无人和没有整理过的土地，实际情况是，殖民者在发现荒野的同时，也看到了农田和整理过的高地。

在气候和土壤条件允许的地方，某些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也发展出了相当系统的耕种农业（可能是轮耕）；早期殖民者颇感惊诧地详细记录了切萨皮克地区土著人耕种的田地的面积、多样性和生产率。在这两个地区，早期殖民者和传教士都不赞成土著农业中对妇女的压制。懒惰的非洲男人蹲在树下磨长矛这种传说让他们能够心安理得地霸占原住民的土地。在那些疾病肆虐于北美印第安人社会的地方，殖民者像杜鹃在别的鸟巢中抚养自己的幼鸟一样，耕种那些别人整理的土地，也收获那些并非由他们播种的庄稼。

两个大陆之间最引人注目的交流之一是，非洲人在十九世纪不仅越来越多地把玉米作为粮食的主要来源，而且还全面转向由“玉米、豆类和南瓜”组成的食品结构。这种最初可能是随着早期的葡萄牙船只漂洋过海而来的、补充性的农业体系，极大地促进了非洲人农业的扩

张。直到最近，在南非东海岸定居点周围的田野上依然能够发现用于固氮的豆茎缠绕着玉米；在地面上，南瓜叶不但抑制着野草的生长，还冷却了土壤。

- 新型的农民、庄稼和技术带来的转型效应从殖民者登陆的那一刻起便生根发芽了，但是这些过程直到最近才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克罗斯比坚信，欧洲人的动植物形成了“夹杂着猪哼、牛哞、马嘶、鸟鸣、犬吠和蜜蜂嗡嗡声的、可以自我复制和改变世界的大洪流的一部分”（Crosby, 1986:194）。（美洲印第安人把蜜蜂的嗡嗡声看作白人到来的先兆。）殖民狩猎者把野生动物赶向灭绝后留下的生境被驯养的牲畜迅速占据和改变。猪直接抢夺橡果和蛤，在北美大量繁殖的牛也为了获得生存空间不断侵入并摧毁印第安人的庄稼。殖民者会故意放纵牲畜侵犯土著的土地和食物。

围绕家畜的冲突逐渐加剧，也反映了土著和殖民者在土地利用上的矛盾。由于缺乏家畜，本土美国人不承认动物的私有权——不管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尤其是在它们像绝大多数猪那样可以四处游荡时。动物只有在被杀后才能被拥有。桑人也把非洲人和白人的牲畜当成自由物品。发生在殖民者和东开普拥有庞大牛群的科萨人之间的第一场大规模边疆战争就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争夺祖尔高地而战。祖尔高地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季节性牧场。在欧洲人带来的细菌传染给当地人的同时，他们的牲畜疾病如地中海热、炭疽和结核病也从家畜传给了美洲的野生动物。在南非，疾病的传播可能是反向的，野生动物携带的锥虫病传染了殖民者的牲畜。但是，外来的牛瘟在 1890 年代的流行不但杀死了大量的家畜，也消灭了大量的羚羊。

殖民者在许多地区都采用了当地人的技术和知识。在美洲，玉米和土豆（虽然现在用犁耕种了）是典型；在南非，典型是大尾绵羊和高粱。但是，殖民社会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进步、资本主义企业和政府机构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最终成为促使环境转型的主要动力。农业边疆有

多种类型——通常由拉动或推动边疆拓展的特定经济作物来形塑。不论在南部非洲还是北美，在辽阔的牧业边疆扩张的同时，也伴随着与欧亚大陆类似物种的更全面的移植。在北美北部沿海各州，主要生产谷物的混合型农业从引进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流行起来，西开普也是如此。到了十八世纪末，这些农业体系都既能满足本地市场，又能产出剩余向外出口，例如开普的葡萄酒和新英格兰的牲畜。开往澳大利亚的移民船也在开普靠岸装上活牲，澳大利亚的畜牧业由此启动。

尤其是在较早的、更多以维持生计为导向的阶段，殖民者在带入新式农业的同时并没有彻底抛弃旧式农业，他们的农业表现出多样化经营的特点。橡树和葡萄也许是开普殖民化的最突出象征，但也只是点缀在山间宽阔的灌木带。十八世纪典型的新英格兰农庄有草场、菜园、果园、空场和小树林，外面便是可以提供浆果和猎物的林区。麦茜特 54 (1989:149,116)指出，这些农场经营者把自然看作是需要“追求”和“照料”的生命体。

相反，遍及加勒比和北美大陆南端的种植园体系是对原来生态体系的更为全面的替代。这种源自地中海的资本主义形式在欧洲以外成熟起来，不仅在大西洋诸岛有所发展，而且从十七世纪初开始在美洲逐渐发展到了最高峰。虽然南非殖民者也曾引进奴隶，但是那里的种植园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在废奴后扩展开来的。在铁路出现以前，种植园都位于殖民地的沿海或者河滨地区，因为要面向外面的世界市场，为它生产必需的新商品。只有通过水运，无论是海路还是河流，大宗商品出口才有利可图。作为资本密集性产业，与产出的价值相比它们需要的土地并不多。但是它们是全新的社会形式，通过清除植被、密集生产和加工处理彻底改变了寄居的环境。凡是主要出产蔗糖、棉花、烟草、靛青和水稻的地方，不论是小岛还是大陆，当地的森林和沼泽就会消失，土地只能种庄稼直至被消耗殆尽。不少种植园的作物生产是为了满足新创造出来的消费需求，例如欧洲人对甜味越来越喜好，这些作物不能

在温带气候条件下生产。因此,这些种植园就建立在曾经是丰富的动植物家园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单一种植的生态缺陷很快表现出来。热带土壤一般都比较贫瘠,只不过它们的贫瘠暂时被茂密森林覆盖形成的厚厚的腐殖质掩盖起来。一旦这些植被被清除,大规模的耕耘将把土壤暴露出来,同时整齐排列的种植也给径流提供了理想的排泄渠道,造成土壤侵蚀。单一种植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轮作。美洲殖民者抛弃了土著在单片农田里混种玉米的作法。尽管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用轮作法代替了混种法,但是最普遍的顺序是在收获了烟草之后种玉米,不过,这两种作物都对土壤有害。几轮过后,土地就要抛荒,这种“酸性土地”留给树木去侵占。牲畜的短缺又减少了粪肥的供应。从南美的岩石上刮下的海鸟粪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海上运输(可能要增加三分之一的成本),被撒入富裕种植园主的农田,尤其是在 1840 和 1850 年代的“海鸟粪热”期间。单一
55 种植还加速了土壤中毒素的积累和寄生虫的蔓延。一个在其政治体系中聪明地建立了微妙的制衡机制的国家,在其农业体系中却完全忽视了需要建立起同样的机制。

十八世纪在加勒比种植园岛屿和美国沿海地带发生的森林滥伐和地力耗竭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像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绅士农场主已经在自己的地产上尝试启蒙式的管理,实验深耕、填沟以及使用动植物肥料。种植园地力耗竭问题是围绕奴隶生产的效益的争议内容之一。种植园体系对新鲜土地的需求促使南方种植园经济一路向西扩张直到得克萨斯东部。分成制和雇佣劳动制在十九世纪末代替了奴隶制,但其贪婪程度丝毫没有减少,其实,对环境的影响是在内战(1861—1865)后才达到了高潮。当未来的“土壤保护之父”H. H. 贝内特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饱受土壤侵蚀困扰的棉花种植园中成长的时候,棉花带似乎已被彻底破坏了。

同样,蔗糖的全盛期也通常被与奴隶制连在一起,但是,英国的食

糖消费是在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1834)之后才真正起飞的，并重新推动了甘蔗在热带地区的种植。联合王国的食糖消费量从1830年的人均19磅增加到1890年的71磅(Richardson, 1986:129)。而美国1887年的人均消费是61磅，仅次于英国(Mintz, 1985:188)。纳塔尔和昆士兰、斐济、夏威夷、特里尼达一起在废除奴隶制后成为主要的蔗糖产区。在曾经长满野生香蕉和番荔枝棕榈的、拥有茂密多样的亚热带海岸灌木丛和森林的地方，如今的景观日益变成单调的甘蔗林，点缀着种植的香蕉和金合欢树。

在殖民初期集约的沿岸农业之外，畜牧业也推动着一个流动的、扩张性的、劫掠性的边疆不断前进。在两个地区，绵羊都是推动边疆扩展的突击部队。在南非殖民史的最初两个世纪，迁徙的布尔人的经济一直都要部分地面向沿海的贸易中心，因为它依赖用自己的动物和其他产品来交换对殖民扩张而言必不可少的枪支、弹药、马匹、货车和金属制品，更不用说咖啡了。直到1820年代，它的市场仍是以供应沿海地区所需的鲜肉为主，但在冷藏时代到来之前，动物必须活着到达沿海地区。往返开普敦的输送路线因此而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结果是，沿途的区域被划为公共财产，受到保护，以便羊和牛得到休息和喂养。这在阿非利卡语中叫*uitspanne*，在英语中意为“去轭”——这个词的意思是56给整队的公牛解掉轭，后来还加入了橘子和放松的意思。由于市场主要需要鲜肉，科伊科伊人一直饲养的多毛(并非可用的羊毛)大尾羊基本上也不能幸免。

主要是东开普的英国人殖民地、新的贸易口岸，最重要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产毛的美利奴羊，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改变了放牧边疆的面貌。这些绵羊很好地适应了稀疏的牧草和在卡鲁高地上的半干旱区域进行长途跋涉。早在1840年，羊毛就是南非主要的出口农产品；直到1930年仍然如此，绵羊数量膨胀到近4500万只。这可与美国相比，美国的绵羊数量1880年代早期最多，达到5200万只，但它比南非拥有更为广

阔的牧区。

美洲殖民者的绵羊(大多数也是美利奴羊)取代了更古老的西班牙牧场主和土著美国人的绵羊文化,那些羊是以羊毛更粗的 Churro 种为主的(美洲本地的大角羊从未被驯化)。在 1840 年代里,羊群突破了它们在东北部殖民地的固有势力范围,进入位于伊利诺依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湿润草原地带。不过,在内战前,它们的主要发展地区还是半干旱的西南部。在加利福尼亚,为了满足饥饿矿工的需要,绵羊数量在 1850—1860 年间从两万只上升到一百万只。内战时的制服需求刺激了养羊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平原地区养牛业在 1880 年代崩溃后,绵羊边疆拐了一个 U 形弯后向东占领了腾出来的区域。

对边疆农民而言,绵羊具有许多优点:需要的启动投资少,易储存运输的羊毛和需要鲜肉的市场可以迅速换来现金收入,绵羊比较耐旱,适应高原贫瘠牧场,且温顺易于管理。尽管当时美国有数量庞大的绵羊和史诗般的绵羊推进景象,但研究美国西部的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绵羊,更青睐牛——这反映了十九世纪牧场主对“羊”和不骑马、通常也不是盎格鲁—萨克逊族的牧羊人的偏见。其实,绵羊和牛有时是混在一起放养的。

牛被认为是南非非洲人经济与文化生活的中心。直到 1930 年,在殖民者的农场占到全国总面积的 75% 以上的情况下,当地人仍然拥有南非一半的牛。当地人的农业从锄耕向牛耕的转变强化了“牛是湿鼻神”的说法的凝聚力(Guy, 1987:18)。殖民者接受了非洲人关于牛的许多知识,但是——很大程度上是经过加尔文教的神的授权,使养牛变成 57 了更为精明实际的商业行为。美国东部大多数拓荒家庭都有几头牛(主要是为庄稼提供肥料),较为贫瘠的山地也经常被用做牧场。但是大平原展现了一个天然大牧场,美国历史中关于牛的讨论主要是与内战后在那里兴起的牧牛王国联系在一起的。

取代野牛的肉牛在美国的国内市场远比在南非的大得多,因为南

非大部分非洲人是自给自足的。尤其是芝加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牛城”(Cronon, 1991:207)成了铁路网络的枢纽和牛群再分配的中心。当然,这些牛也践踏、啃食青草,然后改变大草原上的牧草生态。向东辐射的线路使芝加哥能供应全国主要城市的肉类市场,而和西部各个据点联系的铁路为人们进入那块基本上没有可通航的河流、也不适宜粮食作物生长的腹地开辟了通道。

直到1910年代,牲畜都是南非内陆殖民者的支柱。当在此地立足的非洲人和布尔人社会面临着白水岭迅速繁荣成为淘金者的圣地这一崭新机遇,并抓住了这个机遇时,农业生产开始向系统的谷物生产转变——高原玉米大革命。在美国商业生机勃勃的、生产更多样化的边疆,大规模的谷物生产更为迅速地发展起来。铁路和机械把专事谷物种植的新移民带到了芝加哥西部和南部的肥沃土地,事实证明,这里适合种植熟悉的玉米、软质小麦和养猪。到了1880年代,受到一段时间异常丰沛降水的鼓励,小农户一窝蜂地涌向更加干旱的平原。原先养牛大王在没有任何限制的公共土地上自由放牧,使牛群迅速增加并从中大捞一把。但是好景不长,他们就因为接踵而来的干旱、严冬和牧草耗竭而遭受了灾难性损失。1890年左右,南非只有60万多一点的白人殖民者,而美国仅仅在平原地带就有600万以上人口。

在美国,市场的力量驱使农民在像衣阿华这样水源充足、靠近铁路中心的州种植饲料作物。尤其是可以迅速育肥动物的玉米能够转化成鲜嫩的牛肉和猪肉。这有助于节约牧场,但却需要耕种更多的土地。不过,在南非大部分地区和美国比较偏僻的畜牧州里,农民仍然依赖天然牧场。殖民化给南非内陆和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带来了新的民事机构和新技术。美国内战之后,首先进入西部的不光是牛、羊、猪,还有行政和治安官员、拘留所、沙龙、带刺铁丝、钢犁和火器。水的供应对高效的农牧业是至关重要的,钢制风车驱动的凿井技术提高了半湿润内陆地区的承载量。58

在南非,周期性和季节性的干旱形成了流动的、相对独立的游牧和狩猎文化,它比美国的类似文化延续得更久,因为在美“庞大资本”支持的“大人物”更迅速更有效地控制了局面。流动的黑人佃农带着他们的牲口挺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艰难岁月。长途迁徙的生活经历(也包括把牲口赶到市场)后来被布尔人深情地回忆起来,这种感情与美国人回忆西部牛仔时的感情是一样的。但是,由于缺乏美国那种强大的制造神话的产业,布尔人的迁徙岁月并没有浪漫化为一种供广泛消费的、表达民族自我认同的形象。其实,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牛仔大多数是雇佣工人,不是生活在深山密林里的边疆人——而且他们通常都有黑人或西班牙人的血统。虽然这两个国家的这一时期的记忆都被“漂白”了,但是,像《大鹰啸》(*Posse*)这样采用后现代主义视角的西部片已经开始探索给这段历史重新着色。

边疆开拓通常被认为是没有工业的自由拓荒,矿业的影响也与那种农业理想格格不入。加利福尼亚主矿脉上被废弃的城镇和德兰士瓦东部的巴伯顿地区今天看起来可能都很古雅,但在它们的鼎盛期,其环境和十九世纪任何工业区域一样恶劣和荒凉。采矿经常被描绘成一幅夫妻携手挖铲、淘选的动人图景,但实际上,采矿是工业和城市刺入许多尚未拓殖的边疆地区的利刃。到1880年代,钻石占开普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在钻石矿发现十五年后,金伯利就成为南非仅次于开普敦的第二大城市区。“金伯利大洞”(比密西西比河还要宽)现在是一个旅游热点,但原来草原上“蓝色”的含钻矿土都已被挖走了。位于美国西部黑人地区中心的、蒙大拿的比尤特变成了堆积矿渣的不毛之地。熔化炉排出的有毒气体杀死了方圆数英里的植被,排出的含砷废弃物毒化了附近的牲畜及其草料。1898年,比尤特的一位铜业大王斥资一百万美元在附近修建了一座休闲游乐场所——哥伦比亚公园。该园正好位于毒气造成的死亡圈之外,其特色是拥有一个可以种植8.5万株三色紫罗兰的巨大花圃——三色紫罗兰是周边地区唯一能够存活的花

卉；肮脏的底层产业工人子弟被慷慨允许采摘这些花草（Bartlett, 1974: 255—256）。

上游的矿主在开采和加工矿石时需要大量的水。在英国习惯法中，毗邻水源的所有地主都有平等获取这种资源的权利，而在十九世纪的美国西部，这种观念被第一个使用者可将其完全据为己有的法则所取代。这种对水需求极大的产业剥夺了下游农民和越来越多的城市消费者用水的权利。南部非洲并不采用水力采矿法，但是美国西部早在1850年代就利用高压水枪喷出的水流把山坡冲成泥浆汇入选矿槽：“许多两英尺厚的圆石像子弹似的被冲下去”（Bartlett, 1974: 269）。在加利福尼亚，矿渣迅速抬高了河床，尽管修建了堤坝，但重金属污染的脏水卷着废渣淹没了下游的田地和果园。直到1880年代，当农业在州经济中的重要性超过采金业时，政治家们才行动起来，宣布水力采矿法为非法。

政治家们现在进行的干预不仅要保护农业利益，而且要促进农业扩张。美国农业部成立于1862年，开普的对应机构大约在二十年后成立，它们最初都主要从事政府安排的农业科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要让从前只能生长单片草的地方长出双片草来”。美国的这种农业战略体现在政府赠予土地兴建旨在提高机械化和农艺水准的学院（1862），在这些学院设立了实验站（1887），还有建立了联邦农业推广局（1914）。在南非，疾病与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关系密切，控制这些疾病就成为农业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受诸如锥虫病（采采蝇）等热带疾病困扰的地区只是南非的边缘地带。历史证明，像在1880年代横扫世界葡萄园的葡萄病这样的外来疾病对南非来说更为致命。（到了世纪之交，南非从加利福尼亚引进了新的葡萄植株。）后来传入的羊疥癣、牛瘟和东海岸热似乎威胁到了农业的未来。控制这些疾病能迅速提高畜牧水平和产量。

研究动植物疾病也是美国农业部门的一项正式职能。他们对西部

的蝗虫和南部的带病扁蚤发动了一次全面攻势，扁蚤当时正在破坏十九世纪后期政府通过建立畜牧业以使南部经济多样化的努力。对从1894年开始就一直向东扩张的墨西哥象鼻棉虫的讨伐真正调动了联邦基金和专家队伍。残酷打击象鼻虫对美国政府昆虫学家们形成使用杀虫剂的习惯起了很大作用——这种方法最终也被拿来对付南非被认识
60 不足的采采蝇。

资源保护主义政府

甚至早在十九世纪末美国西部的养牛大王被草场掠夺者取代之前，少数联邦政府官员，如著名的美国地质调查局主任约翰·韦斯利·鲍威尔就意识到，在一片降水匮乏的土地上大规模种植来自湿润地带的农作物会带来潜在的环境影响。在他那部发人深省的《关于美国干旱地区土地的报告》(1878)中，鲍威尔强调了环境的制约作用，建议在尚未开垦的西部的大部分地区用大规模的牧场经济取代传统的家庭农场。但是，他的告诫在政府政策和公众对西部种植农业前景的乐观情绪面前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产生任何回响。

从南非殖民农业的早期开始，就有对过度放牧的抱怨。1775年，瑞典旅行家斯帕尔曼写道：“动物最喜欢吃的青草越来越难以扎根成长，相反，牲畜一直就不喜欢的犀牛灌木却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疯长。”(Hall, 1934:67)在美国的高平原上，不能食用的硬秆斑鳩菊、四处蔓延的风滚草(其实是来自俄罗斯的“移民”)、仙人掌果扩散开来，取代了那些适合牲畜食用的草类。牲畜喜欢长满青草的沼泽地和水道旁的低洼地，它们在破坏这些生境、赶走野生动物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为了搞清这些问题，南非官员从欧洲、印度和澳大利亚引进了相关的知识，但特别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当政时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保护主义运动的急先锋。联邦项目主要关注公

地，但是，那些看起来滥用了自己私有资源的人士也受到了冲击。资源保护主义的动力来自美国人的醒悟：即殖民者再也不能在耗竭了土地之后继续前进——这一认识得到了 1890 年正式宣布边疆关闭的支持。

经查证，南非的问题是过度放牧而不是农耕导致的土壤侵蚀。卡鲁地区和高原草场的水源匮乏，导致畜群必须每天来回流动。由于担心盗窃和食肉动物的威胁，很少有农民准备把牲口放养在远离农庄牛栏的草地上，于是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畜群踩坏的远比它们吃掉的多”（干旱调查委员会，1922:14）。

在南非，豺是对绵羊危害最大的捕食者。像美国的牧民一样，南非的牧民也经常呼吁要消灭这些“害兽”。但是，当官员逐渐认识到它们对破坏草原负有间接责任，并且吃掉了多得令人难以接受的羊羔时，豺和像狞獾这样的猫科食肉动物才会被高额悬赏猎杀。在 1910 年代末到 1920 年代初的五年间，仅在开普一地就上缴了 30 万张皮来兑现奖金。西部牧人协会的政治影响力堪与其牲畜对环境的冲击力相比，在它的要求之下，美国国会在 1915 年开始对“控制”食肉动物提供资助。和南非一样，美国每年上缴的（食肉动物）尸体数量（大约是 3.5 万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达到顶峰。农场主（在美国，其盟友是政府食肉动物控制机构）不太可能取代猎人成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首要代表。但是，那些把用氰化物或番木鳖碱毒杀的马尸大块分发到各地者是环境史学家的正当剖析对象。毒杀、陷阱比枪杀更不易区分对象（现在依然如此），这就造成了许多附带杀戮。

资源保护主义者们欢迎消灭豺，觉得这么做可以开辟出一条更合理地利用草场的路子——动物可以在带栅栏、可轮牧的牧场过夜。在这个意义上，“资源保护主义”与美国的资源利用优先思想是非常一致的，有效利用资源是为了追求商品产出的最大化而不是要在农地上维持物种的多样性。害兽仍是一个广泛的范畴，对任何特定物种来说，要在人的眼中平反都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土壤保护的指导思想用一位得克萨斯牧羊人的话来表达就是：“草是真正起作用的。如果我们能够得救，那么草就是我们的救星……草能够保持水土。”(Worster, 1979:78)这一观点激发了南非干旱委员会(1922—1923)的认真思考，它的保护主义话语主宰着这一地区持续了几十年的争论。该委员会的两位阿非利卡人成员曾经在南非战争(1899—1902)后以难民身份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其主席 H. S. D. 杜托依特曾在美国学习农学，后来当了南非农业推广局的领导。R. J. 范瑞南在美国学习土木工程并在内布拉斯加的灌溉工程项目工作，然后返回德兰士瓦加入行政机构。T. D. 霍尔是最早著述系统研究畜牧业历史的南非人之一，他曾于 1910 年代在伊利诺依州学习农业。

在美国，全国范围的土壤侵蚀调查在 1920 年代后期首次获得了国会的资助。调查的重点既包括沟蚀造成的危害——聚集的水流把土壤冲出深沟，也包括不太明显的片蚀或土壤冲刷。H. H. 贝内特最爱用来说服别人的实验是，把一条浴巾摊在倾斜的桌子上，然后用水壶向毛巾上倒水，以此来演示水是怎样被吸收的。此后，他收起浴巾，将水倒在光桌子表面，以此来演示在清除了植被的土壤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水土流失(Brink, 1951:18)。人们开发出在耕地上控制水土流失的技术，例如在山坡地上，在田地和犁垄(或者堤岸)之间沿着等高线按固定的间距修建草带。顺着等高线犁耕成为农业推广官员的口号。南非官员吸收了欧洲和俄国的经验，资助在平坦的高原地区的田野周围建设防风带，使用的绝大部分树种是外来的橡胶树和松树(参见第三章)。在富兰克林·D. 罗斯福在 1930 年代实施“新政”计划之前，在美国平原上几乎没有种植防风林带。无论是在南非还是美国，地表径流都是导致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但是引起美国人强烈关注的尘暴区却是由风刮起的。

南非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过度放牧引起的，而美国的尘暴区与种植业的关系更密切。实际上，美国的牧场主们也忽略了自己制造破坏

的能力，辩称如果把这片区域留给牧草，这场生态灾难就可能会避免。早期的机械化（拖拉机、卡车和联合收割机取代了牛和马）也是造成美国土壤侵蚀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仅福特公司一家在1930年前就售出了65万台拖拉机，而那时南非全国仅有4000台。在某种程度上，南非之所以能在1930年代避免一场更严重的生态灾难，是因为它短缺资本和机械却富有廉价的佃农。在美国，使用新式铧犁的旱作农业技术造成史无前例的大面积土壤暴露。约翰·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1939:417）一书中用“剖开”而不是“犁过”的修辞来描绘它的影响。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需求带动了1910年代的物价上涨。随着诸如苏联和阿根廷这样的地区在1920年代生产的大幅扩张，价格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且开始下跌——当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未受政府规范。在美国和南非，农民试图通过生产更多产品（对环境也更具破坏性影响）来补偿不稳定而且一路走低的价格以及节节攀升的债务损失。于是，牧草被啃得越来越低，被踩得更硬实（用南非人的话说就是“夯实”），处于边缘地带的生态更脆弱的土地也被垦种。所以，价格虽然不断下跌，但南非羊毛产量从1925年的1.85亿磅增加到了1933/1934年的2.97亿磅——美国同期从2.92亿磅⁶³增加到了4.60亿磅。

干旱和接连不断的严重蝗灾加剧了接踵而至的大萧条造成的恶果，而旱蝗灾害往往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干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裸露的土地吸收和储存水分的能力下降造成的，但是它发生在较长的降雨周期中那些异常干旱的年份。美国许多州，特别是南部平原上的那些州，遭遇了有记录以来降水最少的严峻时刻。对这两个国家来说，1934年似乎都是最干旱的年份（尽管美国是在1935年发生了最严重的尘暴，在1936年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高和最低的气温）。

当资源保护主义在总体上与联邦权力联系过于紧密时，农业法规在1910和1920年代失去了支持。多亏美国发生了尘暴，它才重新成为

政治的中心议题。资源保护主义者的议程与干预主义者的许多新政项目,尤其是政府计划利用土地的思想相互交织——这是一种在美国较为陌生的观念,而在一个威权主义中央控制的传统更为牢固的前殖民地则不同。美国的土壤侵蚀局(1933)、后来的土壤保护局(1935)和《泰勒放牧法》(1934)都是这种交织作用的产物,它们都强调技术专家统治。后一项法案规定定居点必须退出全部现存的公地,其中大部分仍是草场,这就结束了长期以来把公地转让给私人的联邦政策。但是,这并不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因为这些土地只是被划分为只要交纳适当使用费就可以使用的牧区。政府干预最积极的鼓吹者 H. H. 贝内特有着完美的把握时机的能力。当国会议员们就他的土壤保护提案的优缺点争论不休时,贝内特故意拖延,直到期待已久的尘暴把肥沃的表土吹进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专门委员会室内。“先生们,这就是我一直在谈的东西!”他指着最近的窗户大喊(Worster, 1979:213)。

到 1920 年代后期,南非的官员们召集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并在农业推广项目中增添了土壤保护的内容。1932 年的《土壤侵蚀法》为农田的保护和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大笔资金。随后又在农业部内设立了土壤和草原保护的分支机构。贝内特 1944 年的南部非洲之行对南非的农业主管部门来说就是一次重大的宣传活动。带着他的传记作者所谓的“美国成就的巨大声势”,贝内特在全国展开了巡回演讲,对(在他看来)南非政府所取得的成绩不大表示遗憾,呼吁南非采取美国建立 64 土壤保护区的做法(Brink, 1951:138—139)。他的这些想法一定程度上在 1946 年的《南非土壤保护法》中得到了体现,该法催生了大体可以自我调控的地方土壤保护委员会。尽管官员们建议采取强制性措施,但是政客们不顾已有成功地消灭了羊疥癣和牛东海岸热的先例,在是否要对白人农民采取这些措施上犹豫不决。实践证明,很难让农民们反对其同类,地方土壤保护委员会通常依靠教育和劝导的办法。

在美国,联邦政府确实收购了一些破产者的土地,并从中获得了环

境效益：在阿巴拉契亚山中建立了谢南多厄国家公园，扩大了印第安人保留地，在尘暴中心区建立了新的野生动物庇护所和草场。草地（总面积相当于马里兰州）最初是以“生态脆弱土地征购紧急项目”的名义取得的，然后用家畜和野生动物代替了农作物。根据 1913 年和 1936 年的《土著土地和信托法》，南非政府主要为扩大黑人保留地的面积而购买了小块土地。所有在这些信托土地上建立的非洲人定居点在规划上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此外还进行了保护诸如图盖拉河这样的东流大河源头区域的尝试。

效率话语主导了 1910 年代到 1950 年代的资源保护主义政策，该政策对边疆的小农户经常是不友好的，对佃耕户更甚。南非的立法和大规模商业化粮食种植业的兴起削弱了非洲人在白人土地上从事的分成制耕作。美国南部的黑人分成农受到拖拉机和种族隔离法的压迫，纷纷退佃迁往北方的黑人聚居区和工厂。南非的农场主害怕他们的羊群和牛群受到佃农牲口的感染，使用了传染病这种借口，与在城市实行种族隔离的牵强理由如出一辙。对用火、筑篱、疾病以及季节性游牧进行控制在资源保护主义者看来虽然有一部分合理性，但却损害了小户佃农的利益。许多分成农由于条件所迫，持续受到被驱逐的威胁而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实现生产的最大化，他们的农业实践可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如果说奉行种族隔离主义政策的南非政府在处理白人农场主的事务时还比较谨慎的话，它对保留地（后来的“家园”）里的非洲人农业就采用了更为武断的方法。大约 40% 的非洲人生活在这些法律专门划分给他们的区域内，拥挤不堪。当时预见环境崩溃会导致非洲人迅速城市化，白人对会被非洲人淹没的恐惧增加了政府进行干预的急迫性。⁶⁵ 1939 年，政府公布了改良非洲人保留地的方案。政府官员可以规划每块土地，划出耕种、放牧、居住用地和林地。分散居住的非洲人将被集中到村庄，牧场也要按有利于白人大农场的线路用篱笆围成营地。这

无疑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在1950年代以前只开了一个小头。但是，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它依然在政府政策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参见第六章）。

十九世纪早期，密西西比河以西“不宜居住”的整个地区被划为印第安人领地，残留的东部部落，如切罗基人被迁移到那里。当这些土地最终也对白人有诱惑力之后，印第安人又被迫迁往更加贫瘠的区域，原来的土地占有者成了其联邦保护人的监护对象。和南非的“家园”一样，印第安人保留地也施行了严厉的改革政策——不过并不比南非的更成功一点。有关在纳瓦霍人保留地上放牧的争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研究个案。纳瓦霍人引进了绵羊和山羊之后，形成了更为丰富的畜牧文化。在1860年代被美国人征服之后，他们继续在保留地内从事畜牧业，其人口数量从当时的8000多持续增长到1930年代的5万左右。随之而来的是，牲畜数量在同一时期从大约3万飙升到137万头。由于他们被圈在一个海拔较高，降水量很少超过十英寸，又被不断壮大的白人羊群四面包围的地区，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严重的过度放牧以及随之而来的土壤侵蚀。

和南部非洲一样，美国的牲畜也集中在供水地周围。为了防止郊狼的侵袭，纳瓦霍人也把自己的绵羊圈养起来，这就加剧了对牧场的不均衡利用。正像南非的黑人农民被指责造成了水土流失一样，联邦的资源保护主义者们也把这一区域的尘暴完全归咎于纳瓦霍人。在这两个国家都实施的技术解决方法包括：减少牲畜数量，通过改良品种提高质量，淘汰没有经济价值的动物，如山羊和马。所有这些做法都忽视了牲畜在部落文化里扮演的多重角色——食物、奶、劳动和声望的来源（后者依据的是数量而非质量）。在1930年代，给资源保护主义者的观点似乎提供了额外证据的是，要防止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昂贵的水利工程胡佛水坝被淤平。根据专家们的意見，大多数悬浮在科罗拉多河里66 的泥沙都是从纳瓦霍保留地排出来的。保护大坝水源地也经常被用作

对非洲人保留地进行改良的紧急理由。纳瓦霍人的牲畜在 1933 年到 1946 年间被减少了一半以上。然而，纳瓦霍人要的解决办法是更多的土地，他们对这种跨民族的保护主义逻辑采取敌视态度；在南非，成为类似政策针对目标的非洲黑人也采取了相似的应对行为。

随着降水量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回升到了多年平均水平以上，纳瓦霍保留地的对抗有所缓和。与整个地区降水的回升相对应，农产品价格上涨了，农业生产重新繁荣起来，这也得益于化肥的使用和深层地下水的抽取。1930 年代的生态灾难并不能阻止迅速地复苏，那些怀疑论者被抛在一边，虽然仍在念叨着“世界末日只不过被延期了”。1950 年代中期，干旱再次光顾了美国平原地区，但是像在“肮脏的三十年代”发生的那种灾难并未全面重现，部分是因为利用了地下水，平原地区仍然是“世界的面包篮”。

不断增长的生产与环境限制之间的矛盾在奥兰治自由邦东部的发展中显现出来，这一块地区是年均降水量大约 25 英寸的高草原，与美国北部高海拔平原地区更相似，而不是位于更南方的典型尘暴区。1948 年，崇拜吉卜林的英国殖民者萨姆·贝尔斯托与一些被鼓动的农民一起，在此前不十分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土地上采用了美国的旱作（保湿）技术种植小麦。他们使用的是构成美国 1930 年代尘暴原因之一的耕作体系：清理出一长条休耕地，不允许其上覆盖任何青草或者野草，任其在一整年里充分吸收雨水。在十年内，这项实验大获成功——正好赶上粮价持续走高和迅速机械化的大好时机，附近草原的广大区域都用新引进的（其中一些是美国制造的）机械垦种了。

当城里的黑人放弃玉米粥而改吃面包时，是农民开创的小麦单一种植帮助南非在当时保持了这种粮食自给自足。虽然山脊上修建了梯田系统，但仍然潜藏着发生环境问题的可能性。不过，潜在的困难被意想不到的自然突变转化了：新的害虫（俄罗斯蚜虫）和杂草的侵袭要求采取与向日葵和玉米轮耕以及更多样化的休耕，这有助于覆盖裸露土

地。当成本(不只是燃料的)从 1970 年代开始上涨后,和美国大平原上发生的故事一样,南非许多边缘土地也被放弃垦种了。到 1980 年代,67 政府对种植本地草种的牧场发放补贴促进了土地利用的多样化。面积较小的地块能生产同样的庄稼。虽然奥兰治自由邦小麦种植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在一些地区浪费了脆弱的表土,但是一些不可预知的压力共同作用维持了大部分土地上的表土。

在战后的南非和美国,大量使用化肥(参见第六章)和水增加了农业产出。对于我们所研究地区的大部而言,水都是维持各种形式的生命的关键自然资源。水短缺(和储存)问题与降雨零星而不规律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大部分降水都集中在夏天,暴风雨过后很快就流失了。大规模修建水坝和沟渠对商业化种植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到 1980 年,南非把 75% 的管道输水投放到了农业领域,这个比例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要高,包括只有 50% 左右的美国。只有在商业化农业的中心加利福尼亚,这个比例才超过了南非。尽管农民游说者用杰斐逊型自耕农的言辞表达出强烈的反中央集权的立场,但是他们的眼睛紧紧盯着改良土壤项目中那些丰厚的联邦资助。一群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狂热专家徒步考察了可以修建大坝的河谷,新发明的钢筋混凝土方法让他们的宏伟结构设计成为现实。在南非,同样以杰出政治家的名字命名的大型水坝是国民党推动农业发展的具体表现。1970 年代在奥兰治河上建成的 H. F. 维沃尔德水坝,通过属于世界上最长之一的地下暗管为数百公里外的、东开普盛产水果和谷物的峡谷输水。

在南非,灌溉工程是为白人而不是黑人农民服务的;在美国西南部,它是城市/商业化农业与小规模的西班牙裔农民争夺的焦点^①。在

① 罗伯特·雷福德的电影《豆田之战》(1988)集中讲述了这类西班牙裔农民和附近新建的休闲中心的斗争,该中心威胁要把“他们的”水转用于保持高尔夫球场草坪的嫩绿,当然这块高尔夫球场是为富有的白人服务的。

南非建坝的高潮时期，位于地处亚热带的马普塔兰边缘的庞戈拉峡谷的乔兹尼坝本来是为浇灌纳塔尔东北部“穷白人”的甘蔗田而设计的，但却造成黑人冲积平原种植农业长期遭受水涝（Ramphele, 1991:67）。在美国西部，农业的用水需求受到了城市（和逐渐增多的郊区）消费者的竞争。加利福尼亚南部的游泳池和家庭淋浴的部分用水来自落基山中的降雪。这些人为的操控把西南部的沙漠变成了阳光带最有利可图的财产，这是1945年后美国人口和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地区。白水岭消费者对水的需求虽然造成了高原上淡水供应紧张，但这里的农民和城市人的冲突才刚刚开始，因为不断增加的黑人聚居区（远离主要城市中心的小镇）私人住房现在才缓慢地接上了主供水系统。一个对未来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是，大坝淹没了峡谷，并把激流变成了细流，毁损野生动物栖息地，因而受到根本上的反对。对很多现代环境主义者来说，水坝逐渐变成崇尚技术的功利性资源保护主义的象征，现在又认为它是环境主义的对立面（参见第六章）。

广布于南非和美国大多数地区的商业化殖民农业确实具有极大的破坏倾向。至于“旧”世界能否复原，仍是有疑义的。或许，二十世纪的农业体系不论在哪里都是“不可持续性的”，甚至在支持这种体系经过改造的自然界中也是如此。但是，它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生态后果仍然是难以预料的。在那些田野废弃了几个世纪，居住区发展起来的地方，生态系统虽然决不会复原，但能通过巧妙组合绿色空间变得更具多样性（和枝繁叶茂）。在那些荒野已经消失了很久、环境已被农业简化的地方，形成了另一种田园之美，就像拥有篱笆树墙和点缀着野花的草地与灌木林的欧洲那样。这样的景观被视为“自然”并受到珍视，尽管它们离不了精心照料和修剪。在几十年叹息绝望之后，几位乐观的植物学家开始得出结论：卡鲁地带的天然草场正在好转，一个原因可能是羊毛价格下跌导致了绵羊数量的减少。在农民转向更加肥沃的西部草

原,新英格兰地区贫瘠多石的土地退耕之后,次生林很快就长起来了。
69 人们在林间漫步时,经常会在不经意间看到摇摇欲坠的干石墙。

参考文献和阅读书目

- Bartlett, Richard (1974) *The New Countr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1776—18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inart, William (198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ndoland 1860—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4) ‘Soil erosion, conservationism and ideas about development: a southern African exploration, 1900—1960’,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1 (1), 52—83.
- (1989) ‘Introduction: The politics of colonial conserva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5 (2), 143—162.
- (1993) ‘La nuit du chacal: moutons, paturages et prédateurs en Afrique du Sud de 1900 à 1930’ (‘The night of the jackal: sheep, predators and pastures in South Africa’), *Revue Français d’Histoire d’Outre-mer*, LXXX (298), 105—129.
- Brink, Wellington (1951) *Big Hugh: The Father of Soil Conserv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 Bundy, Colin (1979)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uth African Peasantry*, London: Heinemann.
- Cowdrey, Albert E. (1983) *This Land, This South: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Cronon, William (1991)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W. W. Norton.
- (1992)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 (March), 1347—1376.
- Crosby, Alfred (1986) *Ecological Imperi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enport, T. R. H. (1966) *The Afrikaner Bond*, Cape Tow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ckinson, E. B. (1978) ‘Wheat development in the Orange Free State: some recollection’, *Fertilizer Society of South Africa Journal*, 2, 73—78.
- Drought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Union of South Africa (1922) *Interim Report* (U. G. 49)
- (1923) Final Report (U. G. 49)
- Dunlap, Thomas R. (1988) *Saving America's Wildlife: Ecology and the American Mind, 1850—199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l-Ashry, Mohamed T. and Gibbons, Diana C. (eds) (1988) *Water and Arid Lands of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naroff, L. Schuyler (1963) ‘Conservation and stock reduction on the Navajo tribal range’, *Geographical Review*, LIII (2), 200—223.
- Ford, J. (1971) *The Role of Trypanosomiasis in African Ecology: A Study of the Tsetse Fly Probl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novese, Eugene D. (196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Studies i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of the Slave South*, New York: Random House.
- Guy, J. (1987) ‘Analysing pre-capitalist societies in southern Africa’,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4 (1), 18—37.
- Hall, T. D. (1934) ‘South African pastures: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31, 59—97.
- (1942) *Our Veld: A Major National Problem*, Johannesburg (Pamphlet).

- Hoffman, M. T. and Cowling, Richard (1990) ‘Vegetation change in the semi-arid eastern Karoo over the last 200 years—fact or fiction?’,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86, 286—294.
- Jacks, G. V. and Whyte, R. O. (1939) *The Rape of the Earth: A World Survey of Soil Erosion*, London: Faber & Faber.
- Jordan, A. M. (1986) *Trypanosomiasis Control and African Rural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lodny, Annette (1984) *The Land before Her: Fantasy and Experience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s 1630—186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Landau, Paul S. (1993) ‘When rain falls: reinmaking and community in a Tswana village, c. 1870 to recent ti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26 (1), 1—30.
- Malin, James C. (1947) *The Grasslands of North America: Prolegomena to its History*, Lawrence: privately published.
- Merchant, Carolyn (1989) *Ecological Revolutions: Nature, Gender and Science in New Englan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Mintz, Sidney W. (1985)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 Opie, John (1987) *The Law of the Land: Two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Farmland Polic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Ramphela, Mamphela (ed.) (1991) *Restoring the Land: Environment and Change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London: Panos.
- Richardson, Peter (1986) ‘The Natal sugar indus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W. Beinart, Peter Delius and Stanley Trapido (eds), *Putting a Plough to the Ground: Accumulation and Dispossession in Rural South Africa 1850—1930*, Johannesburg: Ravan Press.
- Ryder, M. L. (1983) *Sheep and Man*, London: Duckworth.
- Sears, Paul B. (1939) *Deserts on the March*,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Steinbeck, John (1939) *The Grapes of Wrath*, New York: Heinemann.
- Union of South Africa, Province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1924),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Vermin Extermination Commission* (C. P. 3).
- Van der Merwe, N. J. (1953) 'The Jackal', *Flora and Fauna*, 4, 1—82.
- Webb, Walter P. (1931) *The Great Plains*, Boston: Ginn.
- Worster, Donald (1979) *Dust 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5) *Rivers of Empire: Water, Arid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Pantheon.
- (1992) *Under Western Skies: N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ster, Donald, Crosby, A. , White, R. , Merchant, C. and Cronon, W. (1990) 'A roundtable: environment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 (March), 1078—1106.

第五章

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 荒野的重新估价和自然化

在美国和南非的许多白人心目中，国家公园是作为资源保护主义事业的象征。国家公园的倡导者将其视为并描绘成最纯洁也最利他的表现与象征。但是，猎物保护区、国家公园以及类似的荒野区都是受到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控制的区域，进行系统的，有时是强化的管理。这两个国家也有许多黑人把它们视为只是为了迎合富裕悠闲的中产阶级的文化和休闲趣味的场所。研究这些区域的历史必须从这些认识开始。另外，正如我们所强调的，荒野理想是一个文化建构，而不是一个准确的自然存在。美国有句格言说，世界也许是由上帝创造的，但只有国会才能创造荒野。尽管生态关系有其内在的动力，但留给自然的活动空间正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类干预的影响。

非功利性保护主义、旅游业和对自然的描述

受到保护的区域面积并不很大。在美国（不含阿拉斯加），只有1.75%的土地作为国家公园受到保护；南非这个比例略高一些，大约是3%。在这两块次大陆的其他地方，例如阿拉斯加和博茨瓦纳，严寒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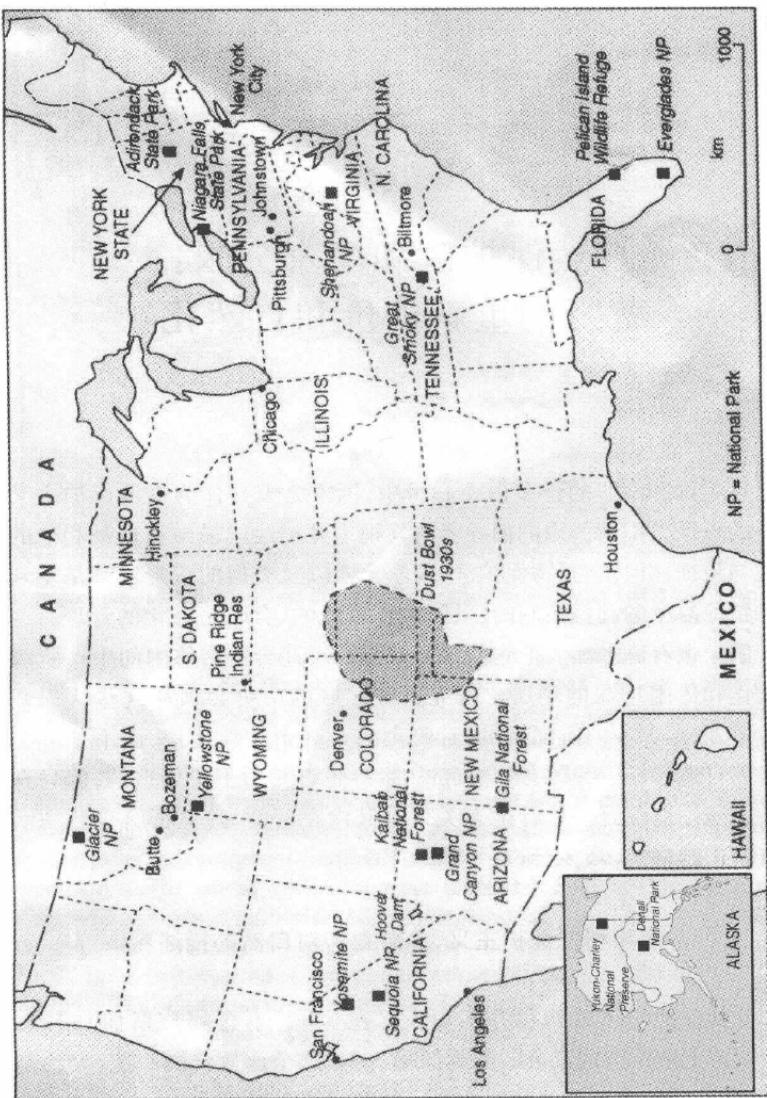


图3 本书提到的美国地点和资源保护单位选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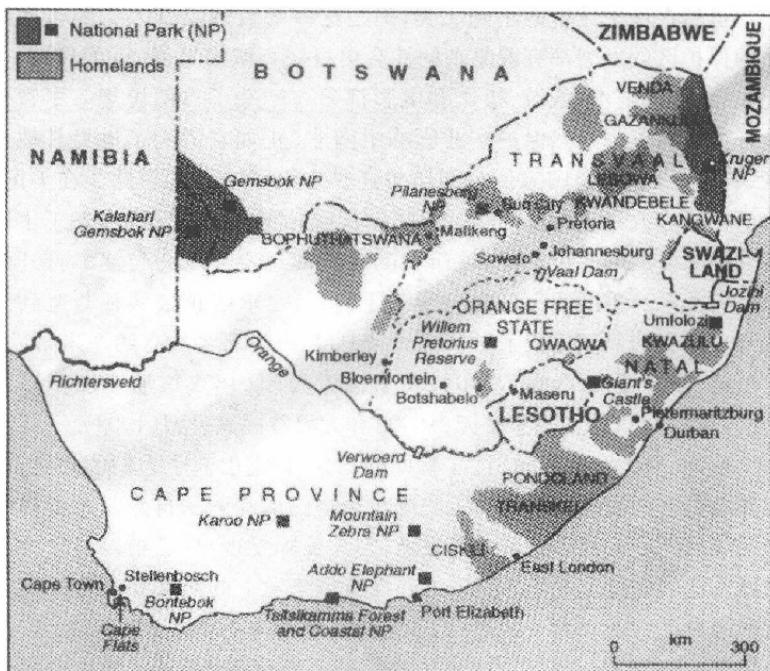


图4 本书提到的南非地点和资源保护单位选列 审图号：GS（2008）675号

■■ 国家公园 (NP) ■■ 黑人家园

酷热妨碍了人们密集定居，被划为公园的土地的比例就更高一些，分别占到大约 28% 和 15%。在美国和南非，大量的土地是作为保护措施不那么严格的州立或省立公园、森林、野生动物保护区/避难所得到保护的。美国的荒野区（不论在公园内还是在公园外）代表着联邦土地管理中最严格的一类。公园是“特殊的”地方，但也不要忘记，即使在公园之外也仍然有一系列的法规控制着人类对脆弱的动植物物种的利用。

虽然在保护区里看不到人类,但是这些为自然及其人类顾客而设立的保护区的发展都有着复杂的社会史:科学、城市发展、审美理解、文化民族主义、艺术、旅游、摄影和电影都参与塑造了自然思想。尽管作为开拓者的美国自然保护实践影响了南非(正如它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但这两个国家的公园历史还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美国,向西扩张进入景色壮丽的落基山脉(有巨幅油画生动记录)点燃了主张建立国家公园的游说活动,城市化的东北部想要界定它与逐渐打开的大陆的关系。美国西部的奇观得到了统计,要求防止公共利益遭到私人开发侵犯的愿望化成了对景观的保护,其中最著名的有约塞米蒂(州立公园,1864;国家公园,1890)、黄石国家公园(1872)、尼亚加拉瀑布(州立保护区)、红杉国家公园(1890)和大峡谷国家公园(1908)。

植物、鸟类和动物的消亡(参见第二章)肯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它并不是在初期的关键动力。关键在于企图从壮丽的自然景观中构建出民族认同——这种需求尤其强烈,因为美国发现,自己难以与欧洲在高度发达的文化上竞争。美国人并没有把皇冠上的明珠和哥特式大教堂奉为自己古老而神圣的遗产,而是把红杉林和“紫色山脉的庄严”奉为瑰宝。(稍后在南非对“永恒山脉间回荡着水声的溪谷”的推崇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做法。)尽管非功利性自然保护主义者给国家公园赋予很高的文化价值,国会之所以能就此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公园内明显缺乏自然资源潜力。除黄石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公园都在地形壮观的区域。

在南非,推动建立保护区的基本动力来自十九世纪后期对掠夺性狩猎和当地丰富猎物种群消失的关注。在1880年代首次讨论并建立的猎物保护区是对狩猎法失败的回应。1886年开普制定法规,试图协调对大型猎物进行有效的保护,1889年在斯威士兰以南建立了庞戈拉保护区。在东德兰士瓦建立了萨比和辛格维齐保护区后,这一思想就以最有力的形式扎下根来。这些保护区和早期纳塔尔的保护区在景观

上并不特殊。它们大部分都在灌木草原区，其魅力来自丰富多彩的木本群落、鸟类和动物，而不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和湍急的河流。

作为萨比保护区首任主管任职很长时间的詹姆斯·史蒂文森—汉密尔顿是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军人和猎手。但是在目睹了南非战争期间非正规兵在东德兰士瓦的毁灭性狩猎之后，他迅速意识到了自然保护的科学依据。虽然起初不情愿授予所有动物相同的地位（他射杀野狗这样的掠食动物，野狗现在是非洲最稀有的哺乳动物之一），但他还是帮助把官方意见转向全面保护。1918年的《猎物保护区委员会报告》包含了这样的思想：野生动物应该作为整体受到保护，而不仅仅作为孤立的猎物种类受到保护。正如帝国式狩猎曾经被看成是军人的户外学校一样，该报告的作者也把保护区视做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的培养基地；动物行为可以在少受狩猎影响的区域里得到研究，而狩猎“在南非的其他地区往往彻底改变了动物的习性”（Carruthers, 1989:205）。

在美国，虽然野生动物保护的倡导者主张公园应该成为野外实验室这一看似精英主义的观点，但是美国的公园政策仍然是以公众有权 75 优先进入的民主传统为前提条件的。所以大多数护林员要迎合热衷于娱乐的观光客的要求，营造出“泰迪熊野餐”（当然，还要有蜂蜜）和鹿儿向车上乞食的迷人景象。在《美国国家公园中的动物》报告中，国家公园管理局才把科学需要推升为行动议程。它提醒说，即使是“宏伟壮观的景色”，也需要“生物，需要植物和以之为食的动物来丰富它的细节”（Runte, 1979:111）。在东部相对柔和的阿巴拉契亚山区，设立大烟山国家公园（1934）和谢南多厄国家公园（1935）部分理由是那里植物种类丰富，但根本的原因在于那里是密集的城市群中仅有的风景如画的山间景观。一个不完全的例外是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国家公园（1934），它也因此而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由于它是既缺乏突出特点又容易引发瘟疫的沼泽，所以就被公园运动中的传统主义者放弃了。

在移民社会中存在着反对建立大型猎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强大力量。农场主、牧场主、矿业公司和土地投机商都能从蚕食受保护的土地或限制其扩张中获得利益。昆虫学家和兽医们担心寄居在野生动物背上的采采蝇的蔓延，也反对在纳塔尔北部建立国家公园。欧内斯特·沃伦医生是推动建立猎物保护区的力量，他把锥虫病的发现者之一戴维·布鲁斯爵士视为“非洲野生动物的头号敌人”(Brooks, 1990: 73)。1920年，农场主和兽医联手，迫使乌姆佛罗齐保护区被废除。但是，从较长的时段来看，双方还是达成了妥协，宣布重新设立保护区，实行更严格的野生动物管理。兽医学的进步拓展了牧场主的放牧范围，于是东德兰士瓦的牧场主们纠缠政府要求获得进入国家公园的权利。但是萨比和辛格维齐保护区幸存下来，部分要归功于那里蚊子及扁蚤的旺盛繁殖力。

在南非，受保护的区域由于地方立法基础并不牢固而有可能被宣布撤销；在美国，即使是国会授权建立的国家公园也会为了把有价值的自然资源排除在外而被重新划定边界。因此，重要的是要培养更广泛的支持者，是建立具有强大的机构支持的正规公园管理体系，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1916)，如南非议会立法设立克鲁格国家公园(1926)。

比照美国环境保护的文献，卡拉瑟斯认为，克鲁格国家公园的创立依靠的与其说是要求保护环境的公众支持，还不如说是白人民族主义⁷⁶的高涨。(早期的猎物保护区基本上是不允许普通大众进入的——这与美国的许多公园不同，美国西部铁路干线的多条支线可以直接抵达许多公园。)为了赢得新近赢得全国大选胜利(1924)的阿非利卡人的支持，大体上是讲英语的国家公园宣传者们明确地使用了克鲁格^①的名字。猎物作为美味喂饱了过去的拓荒者，但是为了新一代，野生动物的

① 克鲁格(Kruger)，或译为克留格尔(1825—1904)：布尔人，南非德兰士瓦省省长，推行民族主义政策。——编注

价值可以得到重新诠释，他们应该看到“像大迁徙的布尔人看到的一样”的景观(Reitz, 转引自 Carruthers, 1989:208)。有趣的是，在白人南非的自我概念及其具象中，狩猎动物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各色俱全的野生动物点缀在邮票上，在1910年联邦成立后不久跳羚的头像就变成了水印，并在克鲁格国家公园建立的1926年首次取代了国王的头像。跳羚的形象成了从香烟到国家航空公司的各种东西的标志。野生动物也成了旅行手册上的主要内容。美国的宣传人员也以类似的方式把公园打扮成令人想起白人殖民前夕这块大陆上的原始景观的替代品。自然裸露的外表被披上了厚厚的文化外衣。

南非自然保护者的动物情结更多地源自帝国和当地的思想而不是美国人的思想，它继续支配着南非的国家公园政策。尽管纳塔尔德拉肯斯山的巨人堡猎物保护区保护了壮丽的自然景观，但是在东开普那片茂密的阿多丛林中，更典型的动机展示出来了，那里一直栖息着一群孤立的小型大象。它们自十九世纪后期就被保护起来，象群数量得到充分增长，以至于当地农民开始呼吁清除象群。到1919年，大部分象被消灭。屠杀激起了公众的反应，阿多在1931年被划为国家公园。公园的水源供应有助于避免象群进入农场。1930年宣布在卡拉哈里大沙漠中成立了大羚羊国家公园，以保护羚羊中这一濒临灭绝的种类和跳羚、狷羚。在东开普给几乎要随着斑驴灭绝的山地斑马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国家保护区。就在这时，南非对野生动物的态度似乎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的象征是，媒体大量报道了一头名叫休伯塔的母河马在海上的历险，它在1928年到1931年间从纳塔尔北部出发沿着东海岸游了一千多公里。休伯塔无视文明的边界，在诸如德班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场之类的地方登陆吃草；它俘获了正在形成群体的野生动物支持者的心(Skead, 1987:906)。在国家公园之外，自然资源保护依然 77 是各省的职责，而且和美国的州政府一样，它们也能设立自己的保护区。在英国人占统治地位的纳塔尔，省立公园董事会在1947年之后有

效地接管了猎物保护工作。通过发起挽救和繁殖白犀牛的运动,它变成了国家自然保护的潮流引领者。

旅游业并非最初设立公园或保护区的主要理由。但是美国自然奇观和南非野生动物的吸引力并没有被早期倡导建立公园者所忽视。美与价值是很容易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地理学家亨利·甘尼特在《国家地理杂志》(1901)上惊呼,阿拉斯加美景之“雄伟”,如果“用直接从旅游者那里赚取的金钱来衡量的话……远比黄金、渔货和木材有价值,因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Nash, 1982:283)。旅游业可以给在受到保护的国有土地上投资提供丰厚的回报,这一点不久就广为人知。史蒂文森—汉密尔顿详细研究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积极推动方法。在南非公园立法时期任土地部长,也是克鲁格的亲戚的皮特·格罗布勒对美国人的创意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功深信不疑。土地虽然免受蹄子、斧子、锄头和犁耙的蹂躏,但还是商品化了。

正如它们把拓荒者带到新开拓的农场一样,美国西部的铁路也是东部旅游者寻找空间和奇观的渠道。“先睹美国”活动明确地与开往欧洲的豪华班轮展开了竞争,它把美国公园中白雪皑皑的山峰赞誉成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美景。南非的铁路旅游变成了为拟议中的克鲁格国家公园赢得公众支持的重要工具。和英国至南非的“联合城堡”蒸汽船航线一样,南非铁路也不断地利用野生动物作广告宣传。有了在津巴布韦观赏野生动物的承诺,旅游者们便甘愿忍受从开普敦到维多利亚瀑布两千公里旅途中灌木草原景观的单调。

汽车很快改变了旅游业的发展步调,给独立的白人中产阶级游客提供了便利。1928年,13万辆车开进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次年,国家公园和纪念地总共吸引了300万游客。1928年只有180辆车到访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到1930年代后期,每年都要接待3万名游客。考虑到南非和美国汽车数量的差别,对南非白人来说,猎物观赏确实大体上成了同样重要的体验。南非的旅游业开始效仿美国的流行模式,而不是东

非精英的帝国狩猎远征队形式。（在凯伦·布里克森的自传《走出非洲》中，她的情人戴尼斯·芬奇—哈顿就是以带领远征队这种生意为生。）

78

两国仍然有一个明显的区别：美国人即便尚未登上远足的小径，也能在他们的国家公园露营。南非人在野外武装露营几年之后，考虑到危险动物的威胁，只好留在他们的小圆屋和福特车里了。那不计其数的狮子（公园最初吸引力的主要来源）尽管对于徒步旅行者会作出更加难以预料的反应，但是实践证明它们不会受到留在车里的人类惊扰。在一队美国游客感染了疟疾之后，克鲁格国家公园 1930 年在潮湿炎热的夏季关闭了大部分地区，使它的危险性进一步降低（Stevenson-Hamilton, 1952/1993: ch. 10）。因此南非当局发现疏导和抑制旅游者带来的冲击更加容易。在一个关键资源的公共所有权广泛确立的国度，公众也能控制公园内的膳宿和服务；而美国公园里的旅游基础设施都交由活跃的私人企业经营，他们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展示经营才智的机会。南非人经过很长时间才面临公园双重使命之间的矛盾，即一方面要行使对自然遗产的托管权，另一方面要发展休闲产业的利益。到 1970 年代，每年参观美国的国家公园和纪念地的游客超过 4000 万人，但南非的这个数字刚刚超过 50 万。

对于以这种方式（即使是通过汽车的挡风玻璃）对荒野自然进行的亲身体验，必须置于更为悠久的传统中来考察，那就是对一个挑战了欧洲文明与控制观念的神奇世界的好奇。公众对进化与博物学的兴趣，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澳大利亚和大西洋彼岸，都达到了约翰·麦肯齐称之为“狂热”的程度（1988:37）。在英国，它在十九世纪后期被列入学校的课程表中，在澳大利亚和大西洋彼岸，课堂自然研究运动强化了公众的这一兴趣。“狂热”现象的一种表现就是狩猎传奇和自然类著作的广泛流行。到二十世纪初期，这种叙事的成功随着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1903）和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人猿泰山》（1914）而得到

确保。在英国,对诸如《所罗门王的宝藏》这样的冒险传奇的长盛不衰的兴趣形成了年轻人对海外领地的认识。巴登—鲍威尔创建的传授狩猎和追踪技巧的童子军(1907)在大西洋两岸蓬勃发展。这场运动受到美国博物学家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的“印第安森林人”和丹尼尔·卡特·比尔德的“丹尼尔·布恩之子”的触动和直接影响。1920年代,英国兴起了一场军事色彩较淡的、男孩女孩都可参与的森林生活运动79(后来演化成“森林人”运动)(Wheen,1991)。

如同强身派基督教和伊顿公学运动场那些典型一样,罗斯福主义推崇的“勤奋的生活”是促进个人活力与国家实力的联系。在世纪之交出现的扛枪的布尔突击队员形象提供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榜样角色,与南非战争中身材矮小的英国志愿兵的瘦弱体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后者是城市生活中累累恶习的畸形产物(Brogan,1987:27)。世纪之交在知识分子和大众语言中流行的环境决定论助长了这种联系。

描写野生动物遭遇的版画生动传神,它是十九世纪的冒险故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照片和立体幻灯片这样的视觉表现形式成像质量的不断普及,进一步汇聚了人们对这些图像关注的焦点。先锋摄影家威廉·亨利·杰克逊把他拍摄的黄石照片分门别类地做成了精美的小册子分赠给议员们,以赢得他们对国家公园的支持。像《自然与摄影》(1902)一书的作者阿瑟·达格莫尔这样的专业野生动物摄影家在本世纪初满足了自然类图书出版商的需求。新的印制方法推出了光纸图片,这预示着咖啡桌上自然类图书的到来,铁路公司也因此而在宣传它们的观光路线方面获得了巨大优势。这种强有力的媒体宣传在大量发行的《国家地理杂志》的页面上进入了千家万户。

同期,关于美国国家公园的第一批电影资料(冰川国家公园,1903;黄石,1909)也被拍摄出来。美国在该产业方面的领先地位让美国观众能够直接观赏非洲的动物。影片摄制起初只是复制了狩猎的文学传奇,特别重视动作、挑战、死亡和富有魅力的主角,不论是人类还是动

物。早在 1912 年，美国富有的猎手保罗·J. 瑞尼制作了《非洲狩猎》，总共获利约 50 万美元。马丁·约翰逊陪同杰克·伦敦游历了南太平洋，然后在美国的小镇上以放映幻灯片为生。他把自己在杂耍表演方面的经验糅进了关于非洲的电影中，其中有人为制造的镜头引诱犀牛、大象和狮子冲到摄影机前。

1920 年代，美国自然博物馆的关键人物，也是研究大猩猩和非洲象的专家卡尔·阿克利说服约翰逊和他的夫人走上了一条不那么追求感官刺激的道路。由于担心非洲哺乳动物会遭遇与美洲野牛相同的命运，阿克利把他的博物馆带进了科教电影业，筹款资助为子孙后代记录非洲动物的长片持续拍摄。作为这项事业的一部分，阿克利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生产一种多功能的、经久耐用的摄影机。乔治·伊斯特曼意识到了这一产业分支的潜力，去肯尼亚拜访了他和约翰逊夫妇 (Bodry-Sanders, 1991: 142—144, 208—213)。在 1920 年代后期和 1930 年代初期，一系列在谨慎的保护主义视角中点缀着“紧张与刺激”的非洲影片拍摄出来了，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观众。在美国狩猎期刊中，以南部和东部非洲为主题的内容在当时也受到了巨大欢迎。

尽管伴随着爵士乐时代新兴流行的是城市—工业和国际化心态，但 1920 年代的美国还出现了大批野外电影。在喧嚣的二十年代，轰鸣的瀑布甚至比狂乱性爱具有更大的卖点。直到 1930 年代，一种高度掠夺利用性的方法支配着动物电影的制作。弗兰克·巴克的《生擒》(1932)展现了猩猩和老虎在舞台上殊死搏斗的场景，尽管他的摄影师和动物饲养员一直抗议，说这两种动物从来不会在野外相遇 (Denis, 1963)。流行电影《金刚》(1933)就是表现这种认识野性的方法的一个缩影。然而以约翰逊夫妇的最好的胶片和更少侵扰的摄影方法(长时间披着兽皮蹲伏在隐蔽处)为基础，另外一种更为谨慎的表现自然的途径在二战后开始流行。阿曼德·丹尼斯的《野性的辉煌》确认了这种致

力于科教和环保的拍摄方法,这部片子也成了雷电华电影公司 1949 年效益最好的影片,并为迪斯尼出品的《沙漠奇观》(1953)等著名的“真实生活历险记”系列奠定了基础。在 1950 年代初期,表现自然的电影转向电视,为生活在都市世界的人们感受野性提供了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媒介。在英国,引领这股潮流的是丹尼斯和前南非猎人乔治·迈克尔。

拍摄野生动物电影的趋势使新的科学方法流行开来,它融会了美国人对壮美景观的过分偏爱和南非人对野生动物的重视,把保护主义思想国际化了。自 1920 年代以来,这些方法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研究动物、植物及其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生态学的崛起。栖息地这个词最先主要是由植物学家使用的一个十八世纪博物学的术语,现在逐渐成为流行的语汇。动物学,作为一个学科,越来越注重对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动物进行研究。十九世纪后期为伦敦和纽约的大型自然博物馆收集标本以及在开普敦和比勒陀利亚进行殖民地收藏,都反映

- 81 了偏重于给动物分类,研究尸体并记录其结构比例。对于活体动物行为的研究在日益增多的野生动物园里进行。自 1940 年代以来,博物学家们已经不再热衷于尝试把活着的金刚——大猩猩带回来研究,转而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在中非条件恶劣的山区观察“大猩猩的一年”。

生物中心主义与公园政治

生态理论当时正在自然资源保护运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美国历史学家们认为,奥尔多·利奥波德及其思想是把世纪之交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和后来兴起的、意识到了自然界的复杂性及其各部分之间相互依赖性的现代环境主义运动连接起来的关键。利奥波德早期供职于美国林业局,接受了平肖的功利主义观点。但在 1920 年代后期他辞去了在林业局的职务,转而探索一种更具整体观的新视野。利奥波德之

所以会转变，根源在于他在 1920 年代参加的食肉动物清洗运动。这场运动导致了鹿群激增，过度啃食了大峡谷北部凯巴布国家森林公园的草场。不久鹿群就崩溃了，鹿的数量迅速减少。利奥波德把这次事件解释为一个可以表明“害兽价值”的极好反面教材。这起事件通过他那本影响深远的遗著《沙乡年鉴》(1949)而变成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寓言，也开启了他(对自然界)的新理解：

我现在猜测，正如鹿群始终生活在对狼的恐惧中一样，青山也会对鹿群怀有同样的恐惧。或许更有理由恐惧，一头雄鹿被狼群消灭了，会在两三年内有另一头代替，但一块被过量的鹿群啃光的草场可能在几十年里都得不到恢复。(Leopold, 1949:132)

最近野生生物学家们重新解释了凯巴布事件，尽管他们认为食肉动物控制对鹿群数量激增的影响被夸大了，但是这无损利奥波德寓言的效力^①。

利奥波德关于人类干预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功能紊乱的观点在穆里兄弟的堪称经典的研究中得到发展，他们对狼和山狗的研究是为当时要定期减少食肉动物数量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做的。这些研究认为，稳定的食肉动物数量有助于维持土地的健康，尽管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好处。一些绵羊和小牛可能会丢掉性命，但是所有那些以植被为食的蝗虫、野兔、老鼠还有其他啮齿动物的繁衍将会受到节制。

差不多与此同时，南非的动物学家们也认识到了食腐动物的价值，例如豺就发挥了“大自然的清洁工”的作用(Fitzsimons, 1919: 92ff.)。史蒂文森—汉密尔顿在 1926 年宣布：“我认为最好应该让公众不仅了解国家，还要了解国内的动物，因为二者都是上帝创造的”，这意味着日

82

^① 因牲畜减少而食物相对增加和实行猎鹿禁令可能是两个重要因素。

后成为克鲁格公园里最受欢迎的动物的狮子也应该展示出来(Carruthers, 1989:215)。吃蛇的蛇鹫误食为害兽准备的毒饵致死,反对毒杀动物的人们从此事引起的震惊中找到了突破口。1933年在伦敦举行的非洲动植物保护大会对害兽(除鼠类等之外)的概念发起了猛烈抨击。到1940年代,喜好老鹰的人们相信,失去作为蹄兔捕食者的老鹰的代价远远大于农场主们通过保住几只羊羔而获得的利润。据现在的估计,一只蹄兔消耗的草场面积只是一只绵羊消耗的七分之一。狩猎者根据这些新发现非常可疑地认为,猎人可以填补通常会因肉食动物被清除而留下的空白生境。至少在博物学家之中,生态理论的这一系列变化都在新的公园管理战略中体现出来了。

除了迎合日益增长的游客需求之外,公园的专业人士也试图建立物种之间较好的“平衡”。不论是小而普通的还是大而独特的物种,不论是不显眼的灌木还是参天大树,也不论是凶狠的还是温顺的动物,在生态共同体中都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公民。但是,由于食物和水资源的限制(承载力的概念),动物的数量也需要控制。在某些情况下,这就意味着要采取一些相反的政策。随着对那些一度遭到恶毒诬蔑者的善意的增加,人们通过屠宰或出售那些啃食青草和嫩芽的食草动物来求得物种的平衡。

对生态学的强调,在公园专业人员看来是最为基础的,但是仍不容易传达给广大公众。亲近野生动物的美好可能性更容易通过新兴的电视媒体广泛传播。在把这种可爱的印象带进欧洲和美国的千家万户方面,电视机是比照片和电影更有效的方式^①。这种亲近关系的有力支持者中,包括一些具有创新思想的制片人,他们在其出品中自觉反映了这

① 一些评论家强调,人最终还是与野兽分离了,野兽留在儿童读物中、动物园的笼子里和野生公园里。但是,通过蓬勃兴起的电视自然纪录片,我们或许比从事狩猎采集的祖先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更了解野生动物的详情。

些价值观。阿曼德和米夏埃拉·丹尼斯 1953 年在内罗毕建立了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电视片的工作室，在他们的后花园有一个包括巫毒秃鹫在内的动物园。其影片在 BBC 播出比丹尼斯夫妇的要早的乔治·迈克尔在他比勒陀利亚的花园里饲养了（分开来养的）宠物狮子和跳羚。乔治和乔伊·亚当森出版了他们与爱尔莎的冒险故事之后，在 1960 年 83 代早期登上了报纸的头条。爱尔莎是他们在 1956 年收养的一只失去母亲的狮崽。

这三头幼狮中最小的那个的故事……被译成了三十三种语言，销售了数百万册，被制成一部电影，而且，我们希望并相信，给人类对待野生动物的方式造成了持久的影响。这是乔伊和我没有想到的事情。（Adamson, 1968:219）

阿曼德·丹尼斯也宣称自己制作了一部最早反映在肯尼亚偷猎大象的电视片（其实，克鲁格国家公园早在 1940 年代就制作了这样的影片）。这些自然保护主义者如此坚信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正确性，以至于忽视了土著居民对保留地的所有权，这也反映出广泛的殖民偏见。十九世纪，对南非国有森林中的大象和水牛进行保护致使非洲人的村庄被强行无偿迁移到经常缺水的地方。猎物保护尽管已经转向了生态学和重视栖息地，但它还是越来越具有排他性的事业，保护区唯一合法的人类角色是护林员、科学家和那些拿着照相机四处拍照的游客。

在克鲁格公园的东部边界，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发生了。在那里，一些所谓的“偷猎者”从前可以自由进入狩猎。1930 年代在南非和莫桑比克边界新建的警察哨所有助于控制事态，但公园的边界从没有彻底安定过（Trapido, 1984）。纳塔尔公园位于非洲人口稠密的祖鲁兰中部。在它的内部和周围，大部分被认为是“偷猎”的行为其实都是非洲社会日常狩猎活动的延续。人们猎杀小羚羊以补充减少的肉类供应，并出

售羚羊毛皮。一位守园人叹息道：“每当土著人需要钱了，他们就会去狩猎，并把一些猎物皮毛制成皮条、皮带、鞭子等卖给甘蔗种植园主”(Brooks, 1990:50)。

偷猎有多种形式，从欧洲人为获取战利品而进行的摩托化狩猎到非洲人为了维持生计而进行的狩猎，不一而足。许多非洲人并不承认新设立的空间边界。政策允许为私人农场肃清采采蝇宿主而消灭野兽，同时又明确规定在毗邻但通常不设栅栏的猎物公园里的野生动物不可侵犯，这就把偷猎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在纳塔尔，小型公园、白人农场和非洲人保留地紧密相邻，这种矛盾尤其尖锐。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偷猎者和护林员之间的肉搏和枪战屡见不鲜。著名的黑人护林员和研究野生动物的口述史学家马古布·恩托贝拉就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样一场遭遇战，当时他打中了一位正在割割疣猪的凶悍偷猎者(Steele, 1968:63)。

公园与相信自己拥有公园资源的人群之间的冲突，在除阿拉斯加之外的美国地区表现得并不明显，因为这些公园都是在人口已经被有效清理了的公共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欧洲裔美国人的荒野观念，按照一位敌视自然保护主义的评论家的话说，就是定格在印第安人被清除但殖民者尚未到达的时间点上的自然环境。1850年代早期，美国军队把最后一批阿瓦尼基印第安人驱逐出他们在加利福尼亚抵抗淘金热中白人入侵的最后据点之一——约塞米蒂峡谷。在这里，草原上公园般的景观中点缀着高大的黑橡树。这种如此符合十九世纪白人美学欣赏品味的怡人景致，实际上是印第安人用火的产物。在随后的几年，首批旅游者就造访此地，那些没有退隐到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在峡谷的旅馆找到了工作，其中生意最为兴盛的一座就是以其部落命名的。一座米沃克人的村庄一直残存到了1960年代，尽管在白人对完美无瑕的荒野天堂的热情讴歌中从未被提及。

相反，在阿拉斯加这个美国最大的州里，土著居民仍然在大部分地

区的人口中占大多数。虽然在全州总人口中只占 16%，但他们主要生活在广布于“丛林”中的小村落里。1968 年在普拉德霍湾发现了石油，加速了对阿拉斯加未被占用的公共土地的划分。这一进程包括：1971 年把该州 10% 的土地的完全所有权正式授予土著居民，但是作为交换，他们不能再主张拥有全州土地。国家公园系统的大规模扩展（1980）——面积一下子增加了一倍多，是保护主义者在阿拉斯加土地划分中取得的最突出的成果（Coates, 1993）。这些保护区是设在土著人一直利用自然资源的区域，所以允许土著人为维持生计而进行的狩猎、采集和陷阱捕兽活动。另外，打着“传统”的旗号而获准使用的还有除雪机、舷外马达、全地形车和丛林飞机等机械化工具，这些技术和活动在以前的美国国家公园中是禁止出现的，荒野纯化论者是极力反对的。对于那些更不妥协的环境主义者来说，穿着海豹皮靴驾着爱斯基摩人的皮艇用鱼叉捕猎才是正确的谋生方法；穿着橡胶靴开着雪地车使用高精度步枪就是虚伪。为了进一步适应阿拉斯加的特殊情况，联邦政府创设了“国家保护区”这一新的类别，允许开展运动型狩猎和商业性的陷阱捕兽活动。⁸⁵ 阿拉斯加的公园比美国其他地区的公园明显地欠发展，阿拉斯加的大多数公园缺乏道路、旅馆、露营地和其他旅游服务设施。同时，飞机和全地形车的使用也打破了那些离最近的未铺设道路也有几百英里之遥的公园的偏僻状态（Coates, 1990）。

在其职权范围内，南非的国家公园取得了重大成功。国家权力便于对自然保护区边界的全面控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南非只剩下几百头大象，但到了 1980 年代，8000 多头大象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在邻国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大象数量的增加更为可观。当非洲其他许多地区的公园因财力不足而导致大象数量锐减的时候——全非洲的大象从 100 万头下降到 60 万头，博茨瓦纳、南非、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象群却大大增加（Barbier et al., 1990: 67）。到 1970 年代，偷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大部分损失不再是使用铁丝陷阱

造成的，而是成帮结伙地使用火枪并和参与远东象牙贸易的中间商有直接联系。内战，尤其是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伤害甚至比商业性偷猎还要严重。不仅军队要依赖这片土地为生，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Renamo)和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Unita)还要用象牙换武器。1980年代一路上扬的价格使得象牙贸易能够维持下来。偷猎者喜欢捕猎有长牙的成年公象，留下以年幼公象和母象为主的象群，这对象群繁衍有长期影响。

从1950年代开始，南非的资源保护主义政策采用了保护栖息地的思想，不再仅仅局限于物种的保存。特别是自1970年代以后新建立的公园，例如卡鲁国家公园，并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动物，而且还要投放选定的物种。西博福特市政当局经过劝说放弃了大片公共土地，它被拓展为包括了“典型的”卡鲁山区与平原栖息地的公园。海岸保护区，不论是国家级的还是省级的，都是根据其代表性的植物和鸟类而不是独特的大型哺乳动物建立的。

在1960和1970年代，美国国家公园的顾问也沿着同样的思路着想。追随其父的足迹，A.斯塔克·利奥波德领导着公园管理局的一个特殊的野生动物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重申了“生态群落的极端复杂性”——呼应了1933年报告中关于“保护我国特有自然86资源”的建议(Runte, 1979:153; 1990:179)。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家们已经赶上了十九世纪艺术家和人种学家乔治·卡特林以及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言人沃尔特·惠特曼，认同像在地貌学上毫无特点的草原这样的普通景观的优美与价值。

最新的资源保护主义潮流的发展在美国不像在南非那么成功——这证明了联邦权力的局限和农场主的固执。白人南非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保守性并不亚于共和党长期执政时期(1980—1992)的美国总统，但是它能够控制并能坚定执行在历史上成为南非特点的国家主导型资源保护主义。在美国，民粹主义和私人农场在地方政治中

的优势地位挫败了在俄克拉荷马州建立高草草原国家保护区的多次尝试。

尽管国家的能动性有局限，但多样化的地方政府可以建立另类的保护区。纽约州北部的阿迪朗达克州立公园（阿拉斯加以外美国最大的一座公园）既包括森林覆盖的山脉（按照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标准不算高大），也包括起伏的乡野。但是与南非的省立自然保护区不同，这里还延续着广泛利用和占有自然资源的传统，包括私人地产和村落定居点。将近 10 万人生活和工作在公园里，50% 的公园土地依然是私人所有，“禁止入内”的标志使公众的自由出入受到限制。这种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与主导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资源保护主义思想是一致的，那里同样也不得不允许人类永久或长期生活在保护区内。设立国家公园的立法（1949）通过规划控制而不是把土地收归国有的方式来限制私人活动。英国的国家主导型的资源保护主义认为，在维护自然方面，由农民自己精心耕作比任何外部政府权威的介入都要更有效、更在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欧洲人与南非人和美国人在自然观方面的不同：欧洲人把自然看作是鲜明的文化产物，而南非人和美国人渴求原始的荒野或“从未改变”的边疆景观。

在任何类型或级别的保护区内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进行保护，就其性质而言都必定是一种有限的策略，因为它只能影响面积较小的区域，还要服从政治和经济的要求。近来，资源保护主义者和商业化农场主找到了一些共享利益的方案，用于尚未得到保护的土地。在南非乡间迅速发展的私人猎物保护区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富裕农场主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大土地所有者长期以来畜养了一定数量的可猎动物，⁸⁷ 用于观赏和狩猎。确实，少数物种，例如山地斑马和南非白纹大羚羊可能正是由于个体农场主的努力才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摆脱濒危境地，幸存下来。与克鲁格国家公园相邻的区域，如提姆巴瓦提，也变成了对游客开放的主要的私人猎物保护区。由于在农场重新养殖本地野生动物

种的生意变得比较有利可图，私人公园大大增加，特别是在德兰士瓦。旅游业、狩猎和休闲就可以维持狩猎农场；其中最发达的还建有旅馆、露营地、游泳池和会议中心。

政府建立的公园中过剩的动物被赶到私人市场上出售，运到全国各地，进而使各地的私人土地自然化。狩猎农场定期举行野生动物公开拍卖，其价格因对良种畜、野味和猎物干肉的稳定需求而不断攀升。奥兰治自由邦的威廉·比勒陀利乌斯猎物保护区的广告宣传有：“野牛 10 头、跳羚 360 只、面斑大羚羊 175 只、角马 265 头、大羚羊 20 只……狮子 3 只”，还说在 1994—1995 狩猎季有 24 次狩猎机会 (*Farmer's Weekly*, 15 April 1994, 6)。由于南部非洲的市场力量、贫困、殖民必然性的丧失都可能把全部国家土地置于难以承受的压力之下，所以，一些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就把私人土地所有者对其猎物的安全控制推崇为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最可靠的方式。

由津巴布韦政府在 1980 年代发起的“营火行动”通过向黑人的公共区域引入野生动物，把保护政策向前推进了一步。其理论是野生动物最适合啃吃当地植被，尤其在比较干旱和贫瘠的农耕区。问题在于要说服当地人食用野生动物而不是牲口，同时要意识到这么做的生态利益。南非大众环境主义的支持者们对公园政策的排外性持批评态度，成功地启动了一些让农村社区保留一些对公园资源的权利的方案。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新近宣布的、在开普北部与纳米比亚接壤的地区建立的里克特草原国家公园 (1992)，这是一片脆弱的山地沙漠区域，拥有独特的植物资源，包括像半人树 (halfmensboom, 一半像人的树) 这样罕见的肉质植物。当那里人第一次听说，为了自然保护，他们中的一些放牧主会被驱逐出保护区，有人就评论道：“他们关心半人树，那么完整的人怎么办呢？”(Cock and Koch, 1991:119)。

非洲人群体的代言人和保护土地活动家都劝说公园董事会相信，当地的纳玛人连续在这个区域放牧几百年并没有对它造成不可挽回的

破坏。经过反复协商，确保了非洲人群体在这片区域放牧和收集蜂蜜⁸⁸这样的天然产品的权利。并承诺用公园的一部分收入建立信托基金，从本地招募导游，创造更多的销售手工艺品的机会。这些策略是作为一种通过创造本地利益来保护公园的手段。这类实验反映的是199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决议精神，它承诺要促进公园与人的关系的“缓和”——即“人性化的自然保护主义”(Anderson and Grove, 1987:79)。

在被誉为美国“最后一条壮美荒野边疆”的阿拉斯加，建立新公园的提议损害了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利益。它禁止往往是住在城里的阿拉斯加白人在公园内进行运动型狩猎、收集薪柴和开采金矿的活动，但允许以渔猎为生的“农村居民”(主要是土著)进行日常生活所需的使用。或许，新限制给在主要是白人的狩猎向导造成了最大的冲击，因为狩猎在阿拉斯加是宗大买卖——阿拉斯加是颇受国际精英们青睐的打猎胜地。第一批公园管理人员的到来经常遭到当地人抵抗。在一座新公园旁边的村庄，一架公园勤务飞机被点燃。一名护林员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在我到里的第一天，加油站的伙计拒绝卖给我汽油”。旅馆也挂出了标牌，拒绝公园工作人员就餐(*National Geographic*, May 1994:93)。

但是，对新规定不满意的群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70年代初期居住在阿拉斯加中东部育空河及其支流沿岸的新一代拓荒者。对于这些逃离现代美国文明、受过教育的年轻“流亡者”来说，育空河流域是美国最后一块能够接续古老移民传统的地方，他们在林中建起小木屋，并以打猎、捕鱼、陷阱捕兽为生。对于这些“沿河而居的人”来说，幸运的是，这片点缀着小木屋、打渔船和陷阱线的地区被辟为保护文化资源的独立王国，而不是辟为可能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国家公园(McPhee, 1977)。他们可以在这里继续自己的生活方式，至少目前如此。

在阿拉斯加和南部非洲，对参与式发展的强调和对人类利用公园资源的让步具有振奋人心的开拓性潜力。但这也不应该蒙蔽我们的双眼，让人看不见其缺点。一方面，就现代人性而言，要想不把飞机、汽车

和不断增加的都市文化带入公园是很难的；另一方面，一贫如洗而渴望
89 获得土地的非洲人一旦在公园内获得立足点，会发现公园资源对他们产生难以抗拒的诱惑。更为彻底的资源掠夺就很可能难以避免，像二十世纪初期约塞米蒂变成游乐场，搞出“火瀑”、把活鸡投入深谷、牛仔马术表演等节目那样，保护区高度商业化形式的再现恐怕也就很难防止了。前博普塔茨瓦纳黑人“家园”政府就曾经把匹兰斯堡保护区规划为庞大的太阳城度假博彩中心的附属物。

来到公园的游客，无论是开车来的还是寻求自然宁静的，都和动植物一样带来了管理上的问题。从野生动物观察者那儿得到的收入可以保护野生动物，所以，打个比方来说，一头活的大象的价值抵得上其象牙的分量。但代价却是消费社会和它试图创造的荒野之间界限的消失。最极端的例子是，微型巴士的隆隆声和靴子踩出的四通八达的小径阻碍了动物的繁殖和植物的再生。

但是，公园和保护区的巨大社会意义不能简单地用它们对自然遗产做出贡献的能力来判断。与一个世纪或更早以前公园形成时期一样，今天的公园依旧是一个把自然和国家概念融为一体强有力的文化表述。公园的政策制订者们意识到这一点。在准许徒步远足者进入公园以及制订了可以吸引高消费水准的游客的服务价格之后，南非的资源保护主义者和保护野生动物的说客们逐渐意识到了通过降低收费把黑人纳入他们事业的重要性。纳尔逊·曼德拉已经参与了环保影片的拍摄。在美国，像亚裔这样的移民群体参观公园的人数日益增加象征着融入一种特殊民族文化，这是很有意思的。站在约塞米蒂瀑布脚下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一堂户外公民课。山岳俱乐部开展了一个项目，旨在使城里的年轻人（其中很多都是黑人）能够领略到荒野的魅力与挑战。在急剧变化的政治氛围中，公园和保护区的未来可能取决于
90 普及一套环境价值体系，和普及一种非种族性的自然遗产意识。

参考文献和阅读书目

- Abbey, Edward (1968) *Desert Solita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Adams, Jonathan and McShane, Thomas O. (1992) *The Myth of Wild Africa: Conservation without Illus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Adamson, George (1968) *Bwana Game: The Life Story of George Adamson*, London: Collins Harvill.
- Anderson, David and Grove, Richard (eds) (1987) *Conservation in Africa: People, Policies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bier, Edward B., Burgess, Joanne C., Swanson, Timothy M. and Pearce, David W. (1990) *Elephants, Economics and Ivory*, London: Earthscan.
- Bartlett, Richard A. (1985) *Yellowstone: A Wilderness Besieged*,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Bell, Ian (1987) ‘Conservation with a human face: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in African land use planning’, in David Anderson and Richard Grove (eds) (1987) *Conservation in Africa: People, Policies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dry-Sanders, Penelope (1991) *Carl Akeley: Africa's Collector, Africa's Saviour*, New York: Paragon House.
- Brogan, Hugh (1987) *Mowgli's Sons: Kipling and Baden-Powell's Scouts*,

- London: Cape.
- Brooks, Shirley (1990) ‘Playing the game: the struggle for wildlife protection in Zululand, 1910—1930’, unpublished MA thesis, Queen’s University, Kingston, Ontario, Canada.
- Carruthers, Jane (1989) ‘Creating a national park, 1910—1926’,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5 (2), 188—216.
- Chase Alston (1986) *Playing God in Yellowstone: The Destruction of America’s First National Park*, Boston: Atlantic Monthly Press.
- Coates, Peter (1990) ‘Re-enacting American history: white and Native American hunting ideologies in twentieth-century Alaska’, unpublished paper, *Past and Present* conference on ‘The Politics of Hunting’, London.
- (1993) *The Trans-Alaska Pipeline Controversy: Technology, Conservation and the Frontier*, Fairbanks: University of Alaska Press.
- Cock, Jacklyn and Koch, Eddie (eds) (1991) *Going Green: Peopl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South Africa*, Cape Tow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nis, Armand (1963) *On Safari*, London: Collins.
- Dunlap, Thomas R. (1988) *Saving America’s Wildlife: Ecology and the American Mind, 1850—199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itzsimons, F. W. (1919)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outh African Mammals*, 4 vols; vol. 2, London: Longman, Green & Co.
- Flader, Susan (1974) *Thinking Like a Mountain: Aldo Leopold and the Evolution of an Ecological Attitude Toward Deer, Wolves and Forest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 Imperato, Pascal J. and Imperato, Eleanor M. (1992) *They Married Adventure: The Wandering Lives of Martin and Osa Johnso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Ise, John (1961) *Our National Parks: A Critical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eopold, Aldo (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Kenzie, John (1988) *The Empire of Natu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cPhee, John (1977) *Coming into the Count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Marnham, Patrick (1987) *Fantastic Invasion: Dispatches from Africa*, London: Penguin.
- Mighetto, Lisa (1991) *Wild Animals a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 Ethic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Murie, Adolf (1944) *The Wolves of Mount McKinley*,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Park Service, Department of Interior.
- Nash, Roderick (1982) *Wilderness and American Mi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thman, Hal (1989) *Preserving Different Pasts: The American National Monuments*,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Runte, Alfred (1979) *National Park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1990) *Yosemite: The Embattled Wildernes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Sax, Joseph L. (1980) *Mountains without Handrails: Reflections on the National Park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kead, C. J. (1987) *Historical Mammal Incidence in the Cape Province*, vol. 2,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Cape Province*, Cape Tow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 Steele, Nick (1968) *Game Ranger on Horseback*, Cape Town: Books of Africa.
- Stevenson-Hamilton, James (1952, 1993) *South African Eden*, Cape Town: Struik.
- Trapido, Stanley (1984) ‘Poachers, proletarians and gentry in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Transvaal’, unpublished paper given at the African

环境与历史

- Studie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Wheen, Francis (1991) ‘The Green Shirts’, *The Independent Magazine*, 5 October, 34—40.
Worster, Donald (1977)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第六章

从资源保护到环境主义运动和其他

实践证明，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是最能吸引白人关注环境的焦点，因为这两项内容为走出自然保护主义者遇到的两难境地开辟了一条路：那就是如何既享受城市—工业社会的好处，同时又能拯救少许自然。如前所述，尽管受保护的区域都是“特殊的”地方，但绝不是可以免受看似隔了段距离的现代文明的烟雾影响。燃煤火电厂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能降低大峡谷的能见度，致使从峡谷的一侧看不到另一侧。如果在水源地周围建设重大的采矿项目，黄石国家公园内各条河流的生态将受到威胁，这种担心正在与日俱增。因此，对于所有自然保护主义者而言，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仍是在与自然的日常关系方面那些艰难抉择，这涵盖了环境的各个层面，从比较自然的到比较人工的，从一般的到特殊的。这意味着，对环境的关注必须转向处在城市和农业心脏地带的、关键的生产和消费区。

环境思想

在本章，我们将首先考察西方环境主义的主导话语，然后试图通过分析第三世界关注的问题和穷人的环境主义对其进行补充。美国历史

学家着迷于找寻环境主义的文化和历史根源(Oelschlaeger, 1991)。尽管对人类在自然中的适当地位的这种争论源远流长(Glacken, 1967),但是一个特殊的思想谱系被分离出来,它似乎生发出了最基本的问题。

93 十九世纪初的(最初与华兹华斯和卢梭联系在一起的)浪漫主义和原始主义通常被视为开端,它们把个人的创造力、幸福和满足感与亲近未经改变的自然联系起来。野生的自然常被用作鞭笞发展观和经济增长崇拜的有力武器。环保学界已经确认了新英格兰的超验论者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亨利·大卫·梭罗的反物质主义怀疑论,特别欣赏爱默生那句哀叹:“物质已经骑在鞍上驾驭人类”(Nash, 1982:86—87)。

山岳俱乐部(1892)的创始人约翰·缪尔在世纪之交接过了火炬,当时由于边疆逐步关闭和旧世界城市—工业灾祸涌现,也形成了日益同情自然的舆论环境。奥尔多·利奥波德和他的生物中心哲学(参见第五章)通常被认为是这思想链条中与现在有关系的下一个环节,当环境主义在1960年代首次成为流行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时,其价值被重新发现。

1950和1960年代的时代情绪产生了一系列观念,其后果远远超越了资源保护主义之父们更有针对性的焦虑。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的北方国家,草根^①“抗议”运动登上历史舞台,它厌恶盛行一时的现代主义、社会保守主义,以及战后经济繁荣中幼稚的技术崇拜论。环境主义与1960和1970年代改革主义大气候中活跃的其他抗议运动共同成长起来,如反消费主义、反战运动、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尽管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但却汇合成为年轻人(1970年,美国一半人口的年龄在25岁以下)反主流文化价值和结构的运动,并相互促进。新环保主义的主题不再是保护树木、土壤或者野生动物这样的某个特定组成部分,而

① 草根是美国的一个政治术语,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进步运动时期。在高度政治化的1970和1980年代,该词在南非家喻户晓。

是要全面对抗工业主义产生的阴险的副产品。1945 年以来发明的生产方法要为到 1970 年为止人类制造出来的 80% 的污染物负责。环境主义产生的先决条件是战后的新秩序,包括大型科技及其与大型商业的结合,还有富裕社会及其排放物的扩散。

反污染在美国和英国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在世纪之交的进步主义改革时期通过常常由妇女领导的城市改善运动而成型,如芝加哥那些由艾丽斯·汉密尔顿领导的反对铅和磷等工业毒素的活动(Gottlieb, 1993 a, b)。臭名昭著的伦敦 1952 年烟雾(Brimblecombe, 1987: 161—178)以及 1940 年代在匹兹堡发生的烟雾——如 1930 年代的尘暴一样,都非常明显地标示了人类玷污自己巢穴的趋势。尽管烟雾、沙尘和滥伐森林为环境破坏提供了直接和惊人的证据,但是许多最为严重的环境威胁就其影响而言越来越不易察觉,也越来越严重。相比之下,十九世纪的资源保护主义者们面对的问题比较温和。那时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蓝天绿水是不会被污染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环境问题会对人的生命本身构成威胁。

在对付像斑疹伤寒的宿主白虱这样的敌人时,杀虫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留下了很多辉煌的军用记录;战后它们又被投入到家中的前线,对那些威胁到田园牧歌之梦的最新版本——郊区花园和高尔夫球场的害虫和野草发起了攻击。草坪是一种新型的单一种植地块,与普通玉米地每公顷消耗的燃料、水和肥料相当,并且一样易受害虫和野草的侵扰。新型农药就像灵丹妙药一样受到农场主们的热烈欢迎,被誉为对付那些长期以来困扰他们的害虫的核武器。在南部非洲,DDT 具有对付携带疟疾的采采蝇和蚊子的巨大潜力。主要行动是在热带疾病依然猖獗的南非北部边缘地区和纳塔尔展开的。为了消灭采采蝇,津巴布韦的大片地区在 1950 年代也大量使用 DDT。在妄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棉铃虫的战斗中,美国南部也笼罩在 DDT 的包围中。

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是一本不可思议的畅销书,它把杀

虫剂这个神秘的农业术语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和公共热点问题。该书立刻被誉为环境保护运动里的《汤姆叔叔的小屋》。^① 它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蕾切尔·卡森作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和学识渊博的科普作家，用独特的方法把传统的野生动物保护问题与城市—工业问题联系在一起。书名描绘一个曾经在春天鸟语花香的小镇呈现死一般的寂静。尽管她不承认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但是，卡森给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添加了性别的维度；现代科学被视为带有帝国主义式的、雄强的男性霸权，与柔弱的女性化自然对立。

对核辐射的危害进行长达十年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公众对《寂静的春天》(在《纽约客》上连载)的热烈反应。曼哈顿工程之后，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发达国家都受到了原子的力量和潜力的诱惑。原子能被视为解决能源问题的途径和实现全球统治的工具。电影和电视上展示的蘑菇云的视觉美感掩盖了它潜藏的危险。有害辐射的寿命很长这一发现给人类上了一堂生动的课程，提醒人们行星上各种生命形式是在同一个系统中互相联系的。这为公众接受卡森关于毒素在食物链中不断积累的知识奠定了基础(Lutts, 1985; Coates, 1989a)。

另一位训练有素的生物学家巴里·康芒纳发现1950年代在内华达州进行地表核试验时残留的同位素通过青草和牛奶而进入人类身体，最后变成沉积在婴儿牙齿中的放射性锶—90。在1960年代末，人们意识到工业影响无处不在，即使是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也不能幸免，最有力的证明是在南极企鹅的脂肪组织中也发现了DDT。这些史无前例的武器的破坏力引起了强烈的道德关注，加上人们对其给全体物种健康造成的危害认识日益增长，进而推动了反核运动。正如战争事关重大而不能只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科学也不能放心地留给那些雄心勃

^① 斯托夫人(H. B. Stowe)那部催人泪下的小说唤醒了美国北方民众对南北战争以前南方奴隶制罪恶的觉悟。

勃、盲目迎合所谓的军工复合体的要求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而不是生物学家)去研究。

那些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采取行动保护树木、土壤与水供给的人们,虽然言辞激烈,但确实相信以科学和技术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创造性能从自然储备库中获得取之不尽的资源。相反,大多数现代西方环境主义对应用于工业生产的科学技术与产物心存疑虑。工业污染造成的灾难景象刺激了环境主义行动分子,包括核泄漏,受到清洁剂污染、污水与化肥的超标排放而奄奄一息的湖泊,易燃的河流,油轮泄漏,钻井平台的油喷和酸雨。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动机不再是要对日渐减少的自然资源进行保护,而是对环境要素正在被毁灭的担忧。按照最近时髦的说法,新产品是不可以生物降解的。整个地球似乎正在被人类产出的垃圾淹没。在美国,环境主义运动在 1970 年 4 月 22 日表现出新的势头,那就是“地球日”运动——一场席卷美国中小学和大学的、由一系列的示威、宣讲会和其他提高公民环境意识的事件构成的浪潮。由基层民众推动的这场新兴运动与中央政府及其官僚机构推行的旧的资源保护主义运动大不相同。

另一条环保思路有时与对污染的忧虑不大一致,它着重关注的是人口增长。保罗·埃利希是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也是“人口零增长”游说团体的创始人。他强调人口增长可能超越有限的自然资源,在这一方面,他是坚定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他的研究和呼吁明确地把环境主义推向第三世界。或许对这种悲观思考最吓人的表达是其畅销书 96《人口爆炸》(1968)封面上的图画,一个快乐的婴儿坐在一个泡泡里,头顶一根点燃的导火索——这正好与他那不吉利的开场白吻合:“试图养活所有人的战斗结束了”。根据埃利希的注释,“人口爆炸”这个名词大约在 1954 年就出现了,其书名取自一本相对默默无闻的同名小册子。但在当时由于缺乏充分的社会环境,这一思想没有激起类似的情绪。

尽管埃利希那本书封面上的婴儿是白人,但作者并没有对美国人

口在 1940 年到 1970 年间增长了 7000 多万(也就是说增加了 50% 多)而危言耸听。(埃利希说他本人只有一个孩子并做了输精管结扎术。)他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更为惊人的人口增长率——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那是 3% 的年增长率。在印度德里拥挤不堪的街道上的亲身经历使他坚信,人口而非污染才是最紧迫的威胁。作为一种思想,人口过剩的说法影响了对非洲英属殖民地的思考,并在美国人讨论海外援助项目时自然地成为议题。到 1970 年代,对全球环境优先议题的争论已经约化为对立的两极,即人口数量对消费与污染量。

作为提倡“社会公正”的环境主义的先驱,康芒纳强调,第一世界消费水平是比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更为急迫的问题。在假定的极端状况下,埃利希认为,除非采取果断的严厉措施,不然地球要面临“生态浩劫”,他还援引了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在一篇重要演讲中提出的观点,即美国家庭养的一条狗给世界营养和能量供应造成的负担比二十五个普通印度人带来的还要沉重(Ehrlich, 1970: 171—172)。康芒纳相信,经济发展可以解决即将到来的人口危机,他认为对第三世界人口增长的过分关注使人们的注意力离开了真正的问题——即财富分配不公问题^①。这些观点与现有的人口变化理论是一致的。这些理论认为,日益增加的财富和城市化会引起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媒体对 1994 年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会议的报道也显示,有关争论仍然倾向于这些既有的观点。

这些新思想和新议题的引入绝对没有埋没全部原有的自然保护主义的优先议题。不断增加的富裕程度、闲暇时间和教育为从前属于精英阶层专有的思想和追求拓宽了受众范围。美国人现在能同时兼顾自然保护和经济发展。荒野受到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休闲价值,

^① 埃利希越来越认同并强调: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和限制西方的消费水平是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上应对人口问题的办法(Ehrlich, 1971: 79—80)。

对它的热情导致环境主义明确反对修建大坝和综合开发河谷的理论。而这些理论作为流传下来的资源保护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包括了政府控制、创造就业机会、能源供应、航运以及——尤其是对美国新政的拥护者而言——减轻农村贫困。对约翰·缪尔美学精神重新产生广泛兴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反对 1950 和 1960 年代里这种类型的资源保护主义——最明显的一个项目是想把水库蓄水倒灌进神圣的大峡谷。生态自然的论据强化了环境主义中的美学派的观点。用水坝蓄水灌溉的土地日渐盐碱化，实际上是在扼杀土壤。

可以说北美和西欧的民众环境主义是一种“饱肚子”的现象，它对中产阶级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不论是在约翰内斯堡的霍顿还是洛杉矶的好莱坞，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个核心方面就是把自然作为优质生活的一部分来消费。它发源于现代性的象征物的大规模扩展，这在郊区、汽车、道路、停车场和购物中心表现得最为明显——还有居住环境的日益人工化，空调使用是一个突出表现。抗议在葡萄园中使用杀虫剂时，美国的环境主义者与劳工之间有可能会形成不稳定的跨阶级联盟，但是具有重大影响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议程并不属于蓝领和美国有色人种的优先选项。

尽管其对民众的吸引力是有局限的，但西方环境思想和话语还是迅速国际化了。这得益于一群新兴的、多样的国际活动组织的推动，例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1956)、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1961)、地球之友(1969)和绿色和平组织(1971)。这种全球性的传播反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关于世界遗产地(1973)的思想中。非洲与美国的荒野地区及其生物是全人类的遗产。更多的“大象之友”会出现在伦敦和纽约，而不是在那些与它们生活更近的乡村非洲人中间。

种族、环境主义与社会不公

由于美国是一个具有庞大中产阶级而且过着舒适生活的白人占大多数的富裕国家，⁹⁸ 南非是一个贫穷黑人占绝对多数而新兴的环境主义几乎尚未渗透进去的国家，在这个时候要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任何有益的比较似乎都不大可能，因为二者之间差异巨大。不过，尽管美国产生了新鲜的绿色思想，但它对那些与广泛的贫穷联系在一起的环境问题也绝不陌生。同样，南非也并不是与第一世界的消费和污染问题毫无干系。非白人“少数族裔”已经占到了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并将在下世纪初形成多数，至少在一些地区会是如此，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和总体上的西南部。另外，如果把阿拉斯加计算在内，土著美国人在三分之一的美国领土上形成人口多数。有钱人和穷人（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等同于有色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是南非和美国共有的特征。

在南非，对旧式资源保护政策的反对最初并非源自兴起于美国1960年代的、强调环境舒适和“自然权利”的环境主义运动。相反，它源自反对政府在非洲人保留地采取资源保护措施的黑人大众运动。土地改良和恢复计划（参见第四章）打破了非洲人的定居和耕作方式，由此产生的社会混乱激起了反抗运动。非洲人不仅用经济和技术理论向干预的官员提出警告，更利用了零零星星的民间智慧，其观点有时是用祖先崇拜的隐喻来表达的。

最近有些作者超越了这些没有书面文字的社会的本土思想，试图挖掘黑人知识分子关注环境衰退的悠久历史。由 D. D. T. 贾巴武领导的非洲人农民联盟就是一个在两次大战之间试图把“黑人家园”的环境退化和更广泛的种族隔离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组织（Khan, 即将出版）。他们尖锐地指出，如果非洲人想要突破环境衰败的恶性循环，他们就需要更多的土地。然而，贾巴武的改良理论是在对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

学院的一次印象深刻的访问后受到启发而形成的，它设想要发生一场基本上还是沿着白人官员倡导的技术决定论的路线的农业转型（参见第四章）。

在战后新的大众环境主义形成之前的几十年，非洲的民族主义者和政治领袖发现很难把农村居民保护古老实践和本地知识的观点包容进来。民族主义者对未来的规划是一种现代化的规划，是与公民权利、经济发展和政治权力的实现相配套的。这一时期的黑人思想家在吸收和改进资源保护主义思想以赢得更多选民支持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限的。结果是，黑人倾向于抵制大多数自然保护主义措施，视之为“威权主义”政策，是白人少数强加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一部分（Ramphele, 1991:13）。

南非农村环境问题与贫困和人口急剧增长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现象交织在一起。1904年，南非总共只有不到400万非洲人，而到1991年达到将近3000万。1910年代之后，南非的非洲人保留地加起来仅占该国总面积的13%。到1960年，不到40%的黑人人口生活在保留地内。在种族隔离猖獗的年代，对行动自由的严格控制导致非洲人在这些保留地内的积聚，以至于家园内的人口从1960年的400万迅速上升到1980年的1100万^①。

在两次大战之间被诊断为在生态上受到了损害的地区被消耗得更加严重。把农村居民吸收进村庄的改良体系制造的环境问题和它解决的一样多。原本想把放养的牛和山羊都圈在建有栅栏的牧场内，但这实际上没坚持多久。其结果是，牲口不再在晚上赶回分散的家庭，而是

^① 非洲人保留地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在1913年和1936年的立法中正式形成并有所扩大。面积扩大的保留地是1948年以后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基础和关键，阿非利卡人的国民党政府把保留地重新命名为黑人家园，意在要把这些家园变成南非巴尔干化的基础。

集中返回村庄，致使这里变成了新的水土流失地区。由于缺乏自来水，当地水源常常不足，还受到了污染。这些集中的定居点附近的薪柴也同样是匮乏的（见下文）。由于大规模的人口移动致使现有问题更加恶化，新居民点周围的土地变得光秃赤裸。

经济剥夺与环境退化之间的关系在南部非洲长期以来都是明显的，在美国也变得越来越显著了。该国许多经济上被剥夺最厉害的区域也是生态上最为脆弱和遭受蹂躏最严重的地方。虽然公民平等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个独特的黑人中产阶级形成，但是，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在社会—经济上的从属地位在 1950 和 1960 年代民权运动胜利之后鲜有改观。非白人下层阶级由于在实际上而不是法律上被隔离起来，因而生活在“第四”世界里。西部农村的印第安保留地或者南部的农村黑人社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与南非的“黑人家园”地区并无二致。种族隔离时代的非洲人城镇虽然特别地用警戒线与城市边缘地区分割开来，但也可以同美国北方城市的黑人棚户区相比。

到上世纪末，土著美国人被概括为“正在消失”的美国人，但是印第 100 安人口在降到这个历史最低点后开始以比美国其他族群都要快的速度增长。南达科他州松树岭保留地的人口在 1960 年到 1980 年间翻了一番，全国土著总人口超过了 100 万。与此同时，保留地面积进一步缩小。为了把印第安人转化为个体农场主，一些受条约规范的保留地被分割成单独的地块，“剩余的”土地重新收归公有，但最终还是落入私人之手。另一些保留地被水坝工程淹没了。

今天，保留地面积总共只占包括阿拉斯加在内的美国领土面积的 4%，它们处于各种各样的联邦保护单位和私有土地的重重包围之中。失业率在拉科塔苏族的松树岭保留地最高时达到 85%。松树岭位于美国最穷的县内（美国最穷的十个县中有三个与印第安保留地重叠），就在被官方誉为美国“民主圣地”的拉什莫尔山下。这里人们的预期寿命比国家平均水平要低得多，而新生儿死亡率却比国家平均水平高出

许多。保留地内几乎没有活水，居民们不得不开着拉水车跑出去很远，从灌溉沟渠、牲畜饮水池以及其他可能受污染的水源取水。

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半自治状态意味着它们可以不受像赌博禁令这样的州法律的约束，但相当重要的是环境法令也在此列。此外，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出台的大量联邦环境立法也把印第安保留地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联邦环境保护署也没有管辖权。失去了生存条件的土著美国人只好到外面去寻找像矿工、牛仔、农民和铁路建筑队这样的工作，住在位于欧洲裔美国人社会与定居点边缘的农村棚户区里——正如绝大多数生活在黑人家园的非洲人要在矿山和城市当流动劳工一样。联邦政府推动的、以同化论为指导的重新安置项目促进了这种趋势，美国50%的印第安人口现在居住在城市。

不过，许多人已经习惯季节性回归残存的渔猎和采集场所，这不仅可以补充收入，还可以满足文化需求。但是，进入权是有限制的；那些从印第安人土地上划出来的野生动物避难所和国家森林现在大都变成了为城市白人运动家服务的猎场，印第安人诸如收割野生水稻、收集枫树糖浆以及种植药用植物这些维持生计的活动被排除在外。在南非，虽然非洲人家园内的资源也有压力，但小自耕农种植绝没有崩溃，而且 101 至少还有一些人把这种方式视为通向未来的可行之路。同样，并非所有的美国印第安人都把更高的就业水平（本质上意味着在公司和制造业中从事工资劳动）视为前途所在。

在南非农村，对自然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偶尔会引起暴动。最著名的一个事件是 1960 年的庞多兰起义。利害攸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政府出于美学和生态的考虑企图保护海岸森林，而这正是农村居民一直以来捡拾薪柴、采集草药和捕猎小型动物的场所。森林进入权上的对立由于实行村庄化和改良政策的威胁而加剧。与政府保持一致的酋长的家宅被烧毁，有些酋长甚至被害。政府出动了装甲部队和直升飞机，才恢复了对该地区的控制。

美国印第安人(从1924年起获得公民权和选举权)并没有经历一个可以让反抗运动具有明确目标的正式的种族隔离制度。但是1960年代的“红色权力”运动集中在争取重新获得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权上——这和南非农村的某些情况是一样的。印第安人在全国各地与州一级的渔业和狩猎管理当局发生了冲突,他们想索回祖先无需执照在任何季节都可以依靠狩猎捕鱼来养活自己(无论在保留地内外)的权力。在十九世纪与联邦签订的条约中赋予印第安人在“惯常进行生产活动的地方”(许多都在保留地以外)捕鱼的权利,基本上已经被废除了。尽管官方理由通常是为了保护处于哺乳期的动物,但印第安人把这种情况视为是对白人狩猎运动和渔商利益的屈服。图拉利普部落的珍妮特·麦克劳德宣称:华盛顿州“必须认识到,硬头鳟鱼是跟在五月花号后面游过来的”(Steiner,1968:55)。

在沿太平洋的西北部,公民抵抗采取了一系列故意违规捕鱼随后被捕入狱的形式,例如马龙·白兰度故意在一片有争议的水域下网。这些活动自然会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旧金山湾的恶魔岛是一座被废弃的联邦监狱,印第安人后来占领它长达一年多(1968—1970),宣称该岛类似于典型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其中一个原因是“这里的土质坚硬多石,没有生产能力,土地也不能供养任何猎物”。抗议者们呼吁要在岛上建立土著美国人生态研究中心:“我们将致力于减少湾区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恢复这里的鱼类和动物”(Zinn,1980:516,518)。印第安人的捕鱼和狩猎权最终得到了最高法院的确认(1979),但是拿回祖先的土地仍然任重道远,因为大部分土地已经转为私人所有^①。

归还那些仍由联邦所有的公园、避难所和森林至少是可行的,尽管

^① 印第安人诉讼委员会(Indian Claims Commission)在1940—1970年代间发挥作用。在它的干预之下,一些小块土地回到了印第安人手里,但大部分并没有归还,而是以经济补偿的形式完成的。不过,阿拉斯加是一个巨大的例外。

可能受到相关自然资源保护机构的强烈反对(Gordon-McCutchan, 1991)。一些环境主义者在认同生态友好的印第安人遗产这种浪漫思想的同时,也同样担心归还可能带来的混乱。他们从在保留地设赌场及其带来的“罪恶”的成倍增加中获得了证据。令人吃惊的是,索尔·科斯纳的“太阳连锁集团”建立的赌场也散布在南非的黑人“家园”里——赌场在过去的白人南非是非法的。坐落在前博普塔茨瓦纳境内的太阳城可以与坐落在康涅狄格州马山图克的佩科特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庞然大物狐林赌场比肩。土著美国人的代表左右为难,一方面要确保自己开发土地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要平息开发带来的恐惧。后一种观点中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即恢复联邦森林、公园和避难所的土著所有权只是简单地移交管理权,而不是要废除保护类别(LaDuke, 1992)。

在种族隔离制度确立,政府决心要把非洲人家园合并之后变成独立的国家时,黑人只能通过利用这种制度提出土地要求。白人统治在过去几年的逐步开放为土地改革创造了新的机会。在过去几十年中因为位于白人农田内而被政府强占的一些黑人私有农场,现在已经重新回到黑人所有者手中。除了这类土地适当地得以物归原主外,一个更为广泛的土地重新分配计划招致了自然资源保护和政治上的严重难题。首先,南非的人口构成不同于土著土地要求已经得到相对满足的美国、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例如,如果一个“祖鲁”部落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承认,那么就有几百万人有资格要求得到土地所有权——其结果将是增加黑人农村地区现有的环境压力。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政府反正是一直避免鼓励这种在政治上造成民族分裂的土地要求。其次,在黑人集体购买土地的地方,政府规范这种新型占有方式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从自然资源,特别是可耕地角度来衡量,印第安保留地在一定程度上和国家公园一样,代表了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废弃土地。然而,先前的毫无价值的土地由于采矿潜力而已被重新评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及战后时期,整个西部的矿业经历了一次繁荣:泡沸石(一种黏土)、石油、煤炭的开采,尤其是 1950 年代的铀矿开采。美国商业在 103 1960 年代末期开始有兴趣对印第安人所有的矿物进行利润最大化的露天剥采——1970 年代的能源短缺进一步刺激了这种兴趣,受开发思想支配的部落委员会为了微薄的矿区使用费和少量工作机会就正式批准了矿产的开发。最近,印第安土地再次引人注目,因为它有可能用作城市垃圾、医疗和放射性废弃物的储存地。

同时,受到薪柴、电力和水供给不足困扰的保留地也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来自附近加工厂的污染压力。南非黑人妇女头顶柴火笨拙地从输电线下走过,与这幅令人震撼的画面同样具有讽刺性但或许不为人们熟知的是:从四角燃煤火电厂和葛兰峡谷水电站发出的高压线需穿越纳瓦霍保留地,向南加州的城市和拉斯维加斯跳动的霓虹灯输送电力。美国开采的三分之一低硫煤和三分之二铀矿位于保留地内。在开采铀矿的保留地内,癌症和新生儿缺陷的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许多。

南非与北半球的矿业面临许多类似的环境问题。南非的大部分能源来自廉价但储量丰富的低品位煤。为了满足南非最大的城市群和急需能源的工业的需要,大量的煤——国内消费量的 50% 以上用于发电,特别是在德兰士瓦。由于意识到国内缺乏石油储备,为了应对国际的禁运,南非政府投资建设了世界上最大的煤变油加工厂,到 1980 年代初期,这个厂加工提炼了全国煤炭产量的 20%。由于缺乏电力和薪柴供给,在像索韦托这样最大的黑人城镇,煤炭是主要的家用燃料来源。随之而来的一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在德兰士瓦的南部和东部造成了严重污染。约翰内斯堡的烟雾可以和欧美工业心脏地带的相提并论。

在 1930 年新政之前,美国十家农场中有九家仍然使用马和人力驱动,也没有自来水,同时,四分之三要从溪流中取水,家中使用烧柴的炉子取暖。后来,煤和电力逐步取代了柴火,联合国 1978 年的数字显示,整个北美消耗的木材不到非洲作为燃料使用的十六分之一(Simmons,

1989:301)。在南部非洲很难得到煤的农村地区,大量的非洲人也没有办法获取电力,只能依赖妇女收集、用头顶回来的木柴。在天然木材十分稀缺的莱索托,像泥炭块一样的干粪就成为替代燃料。这使人想起美国大平原上印第安人和首批白人旅行家以及殖民者把野牛碎块用作燃料的往事——现在已只是模糊的记忆,主要保存在劳拉·英格斯·怀尔德^①的故事中,虽然仍有辛辣意味。把肥料用作燃料剥夺了土地急需的营养,反映了燃料和肥料只能取其一的两难选择。对黑人定居点周围的木材的需求不仅剥光了当地的植被,而且随着这种资源越来越稀缺,妇女每天花在捡拾薪柴上的时间急剧增加。另外,需要用头顶的负担越来越重会导致脊椎发生问题。

大型林业规划虽然可以满足生产从新闻纸到尿布的工业需求,但对满足上述紧迫需要没有什么影响。为了解决非洲农村的薪柴危机,已经提出了三条主要路径。在非洲农村的厨房中,最常见的煮饭方式是在三脚铁罐下使用明火。一些论者集中探讨改进这种用火方式来达到燃料使用效率的最大化。他们循着本·富兰克林^②的足迹,关注的是提高炉子的效率。其次,蒙斯洛(1988)主张对植树造林战略进行重新定位(参见第三章)。他建议,林务员不能仅仅为了造林而种树。相反,应优先提倡把许多树种纳入小农种植体系的分散化农林业。这种方法通过补种一些本地树木来改变单一种植倾向,可以保证环境效益——这是一条触及本地知识和经验的柔性途径。

第三,如果能够付得起建设电网的成本,南非有充足的发电能力为农村家庭供电。在许多人看来,农村电气化是新南非政府所能采取的

^① 怀尔德(Wilder, 1867—1957)美国作家,著有《大森林里的小木屋》、《草原上的小木屋》等系列作品。——编注

^② 美国实业家富兰克林(1706—1790)曾改良取暖的炉子,可大大节省燃料。——编注

最环保的一项措施,它还能把妇女从单调而辛苦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不过,高硫量的烟雾也要考虑进成本。另外,像在 1930 年代由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拉来电的阿巴拉契亚农村地区一样,电力会把紧密依赖自然界的古老生活方式剥夺得一干二净。

环境贫困会造成健康和经济后果。在本世纪初的几十年中,白人医务人员一直抱怨,肺结核之所以在非洲人中广泛流行,原因之一是在通风差的茅草屋中烧柴释放出的浓烟呛入肺部。更可能的原因是营养不良以及矿山区周围容易感染疾病的环境,这些因素导致了肺结核发病率直到今天持续居高不下。城市的肮脏和艾滋病一起在美国主要城市掀起了一场类似的疾病高发潮。城市贫民也饱受高浓度高危害的污染物的折磨——例如铅和二噁英。美国黑人环境主义活动家通过调查证实,有毒废弃物倾倒场所在他们社区的比例太高。得克萨斯的休斯顿从 1920 年代起就把城市固体垃圾场设在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区旁边。不止一个南非城市让非洲人居住区和污水处理厂相邻。

环境史学家们受到敦促,要把性别、阶级和种族的范畴更为认真地纳入分析框架,以纠正他们对非城市、非工业环境的偏爱。同样,这两个地区的环境主义者也面临压力,要设法超越他们先前只关注白人和传统选民的取向。那些试图以 1960 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为蓝本建立双种族改革联盟以及希望赋权当地社区的人们坚持认为,社会经济公正必须成为城市的“后院”环境主义的核心目标之一 (Sierra, 1993; Merchant, 1992: 162, 164—167, 192—193; Gottlieb, 1993b)。追求社会公正的目的要求重新定义人们熟悉的环境主义的要素。在美国,“蓝领”行动家(许多是妇女和有色人种)正在努力绿化城市的水泥丛林,那里的自然特征仅限于从人行道缝隙中挤出和从荒弃空地中钻出的顽强的野草。他们强调要利用市中心工业削减等趋势提供的机会,把荒地转化成公园、生产性花园以及城市农场,还要发展节能的公共住房和公共交通项目。

富裕国家收紧环境法规——特别是在污染控制方面，会给发展中国家造成消极影响。尽管美国在1972年就禁止使用DDT，但美国继续生产并销往尚未受到严格保护的地区。工资要求低、环境管制弱、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政治上十分虚弱的国家也处在有毒废弃物工业的“垃圾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索尔(Thor)化工公司在夸祖鲁边境地区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汞回收厂。这家工厂的有毒废物进口一部分被美国跨国公司美国氰胺公司(American Cyanamid)控制。进口有毒废弃物激起参加了工会的化工厂工人、环境主义者(非洲地球生命组织和绿色和平组织)、黑人农民和白人商业化农场主在1990年组建了自己的反抗联盟。氰胺公司设在美国的邦德溪工厂也面临着同样的抗议(Cock and Koch, 1991: 25—26, 82—83)。做废弃物生意的商人瞄准了“黑人家园”，提出了颇具诱惑力的经济条件。美国国会中的“黑人议员小组”正 106 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禁止美国向夸祖鲁/纳塔尔的工厂出口有毒废弃物。

1960年代以来，一些公司被更为严格的环境控制政策赶出美国其余各州，但这些公司却在南方受到热烈欢迎，它们那些“地方上不想要的用地项目”(LULU)享受免税优惠。这些用地项目包括建造工厂、造纸厂、危险废弃物焚化炉、废弃物倾倒与填埋场。结果是南方的空气和水变成了全国最肮脏的(Schueler, 1972)。在1990年庆祝“地球日”二十周年的各项活动中，杰西·杰克逊在受到有毒废弃物危害的非裔美国人社区开展的“毒物之旅”是一项独具特色的活动。

少数族群的反污染战士抱怨美国主流环保组织沉迷于荒野保护之类的“精英阶层”的目标。类似的分歧最近在南非也出现了，受到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影响的激进分子重新发现了生态问题——以前被贬为殖民霸权战略的一部分而长期遭到忽视。这场基础广泛的运动围绕劳工权利而不是现有自然保护要素，强调工作场所就是环境。工业健康专家和激进的律师们在过去十年与强大的新兴的黑人独立工会一起，宣

传石棉粉尘和除草剂对人体的危害。小型社区环保团体数量的迅速增加把工作场所的问题拓展到要求提供诸如清洁饮用水这样的基本服务。流行杂志《新土地》(*New Ground*)捕捉到并宣传了他们的新思路。更多现有的自然保护社团就有责任回应这种由于快速的政治变化造成的、更加“以人为本”的取向(Khan, 1994)。

虽然推动力来自民间,但是,新环境主义也变得和旧的资源保护主义运动一样依赖于干预主义政府。美国联邦立法的基石——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携充分的民意,在尼克松的共和党政府任内通过。该法要求联邦政府在做决策时需要考虑环境影响报告书,也要求设立能够协调污染控制和处罚违法公司的执行机构环境保护署(EPA, 1970)。到1980年,环保署有1.3万名雇员和56亿美元的预算,是联邦政府内最大的管理机构。由于缺乏狂风暴雨式的中产阶级运动,南非没有相应的、民众推动的立法。但是也有数量众多的法令,其中不少是从大的政府官僚机构内部产生的,它们都对控制工农业具有潜在的
107 影响。

1982年,南非通过了一项影响深远的综合性《环境保护法》,又添上汇总了一系列早期土壤保护措施的《农业资源保护法》(1983)。根据后一项法案,农场主在未知会地方官员之前,甚至不能在其私有土地上开辟新的粮田。1990年代早期对农民实行的干旱救济补助也与能否满足政府对牲畜数量的限制挂起钩来。同样,如果美国农民把划为容易流失的土地用以农业生产,那么他就会丧失参加1980年代中期美国农业部农作物支持与保险项目的资格。

南非的激进环境主义牢牢地立足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批判中,是把下层群众的利益置于核心位置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取向。相反,在美国,激进环境主义更倾向于生物中心论,重在维护自然界脆弱的和受到侵害的成员的利益。最极端的是,这种深层生态学的观点坚持自然物种与地点的内在权利,而不管它们的经济、美学和休闲价值

(Naess, 1972; Devall and Sessions, 1985; Nash, 1989)。当太平洋西北部沿岸的斑林鸮和原始森林成为那些主张地球第一的环保人士的口号时,人类要求清洁饮用水的权利驱动了另一种要求实现社会正义的环境主义运动。也许要等到人类这些基本需求都得到满足的时候,支持猫头鹰和大象的选民会更为强大——假定那时还有猫头鹰和大象存在的话。

后记：驯化野性

我们试图书写一部环境史,而不是环境主义者的历史。这就要求我们试着去考察生态变化与经济/文化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不是要拥护环境思想的某种“伟大传统”,而是试图考察,针对环境损失和自然补偿的不同的、有时甚至冲突的观点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理解这些问题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所评估变迁过程的时间跨度。对一代人来说,表土或者原始森林的损失是难以挽回的,但是,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之后,这些损失可能就远没有那么具有灾难性了,甚至从地质或气候的尺度来看已经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们在进行破坏的同时也在进行转型。改变的速率加快了,无法排除毁灭性的后果,但是树木在倒下的同时也会有新的长起,即便它们不能代替原有的。通过考察广大地理范围内完全不同的地区,可以增强对长时段转型的调查研究,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对比性的结果。

108

列举美国和南非的不同点并不难。除了面积、土壤和气候等自然地理上的特点外,美国面积更大、人口更多,并是以移民为多数建立起来的国家。在比南非早得多的阶段,美国就发展了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它虽容许一些种族从属于另一些种族,但也允许更加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组织。其结果是,环境政策成为激烈争论的主题,利益集团被动员起来提出自己的理由并利用相互制衡的体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民主并非总是有助于提出的依靠政府干预的环保创意。相反，南非建立的是排他性的种族主义政治体制，公民社会较为有限，政府对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享有更大的权力。同时，我们还想强调在经验和解释上有启发性的共同点。两国在气候类型、本土实践以及引进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方面的共性为比较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如果把南非和泰国或者把美国和尼日利亚放在一起比较，就不会有这么多收获了。

欧洲的扩张及其在南部非洲和北美建立的社会启动了对殖民地大陆的生态影响深远的一系列变化。逐渐主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资本主义制度往往为了达到眼前利益的最大化对资源进行疯狂掠夺，是一种真正的掠夺经济(*raubwirtschaft*)^①。企业家和私营主通过杀光野鹿、过度牧牛、为了获得四五次的小麦大丰收而连续深耕，或者只要国际金价合适就不停的采金等手段来拼命挣钱，快速致富^②。但是，在这些转型的趋势中也酝酿着遏制其破坏环境的能力。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很难预料，在特定情况下，它能为过去的受害者带来利益。

野生和野牛吃的草正在美国的平原上得到恢复，跳羚(和莼草一起)正在返回卡鲁和附近的草场——这两个地区都曾受到严重滥用，鲜明地体现了不受限制的私人所有和荒野去自然化造成的悲剧。像女演员简·方达和有线新闻网(CNN)大老板西奥多·特纳这样赫赫有名的牧场主正在位于博兹曼附近的、新近购得的蒙大拿牧场上饲养大平原动物。¹⁰⁹ 描写像《死亡时刻》(1989)这种血腥的狩猎传奇的作家、惊险小说家威尔布·史密斯在南非卡鲁地区购买了许多农场，其目的是清除也许并不引人注目但却是外来物种的绵羊，使野生动物能够恢复。他

① 德国经济地理学家埃内斯特·弗里德里希(Ernest Friedrich)在1904年普及了这个术语。

② 英文中 buck 一词既指雄鹿，又是美元的俗称。这一用法源自皮革贸易，一件成年鹿皮可以卖得一西班牙元。

最新的一本畅销书《大象之歌》找寻的是“反抗邪恶、贪婪和腐败势力”(护封上的推荐广告)的、重获新生的、具有移情作用的自然保护主义。这些主张恢复生态系统的环保主义者的热情,加上国家公园范围的扩张以及重新供养动物,共同促使野牛、捻角羚和跳羚的数量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显著增加。但是,原生动物回归卡鲁地区和大平原恰好与最新一轮农业危机赶在一起。后尘暴时代的农业景气的恢复不是通过更加谨慎的农业实践,而是通过技术修复获得的(参见第四章)。上千年积累起来的地下含水层下降的速度比通过降水补充水位的速度要快得多。谷物和牛肉价格持续下跌、土地不断贬值、政府补贴削减和肥料、燃料和抽水成本不断上涨都预示着,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中,农业和牧业越来越没有前途。对于南非的牛羊饲养者来说,在整个1980年代,羊毛价格一路走低,但利率一路走高。这种处境迫使他们去开拓替代性的土地利用方案。

罗伯特·斯科特是落基山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他建议把蒙大拿州大约十分之一的土地划为一个非洲式的猎物保护区,代替了牲畜的野牛、鹿、麋鹿还有羚羊可以在这个称为“大旷野”的保护区里自由生活。理查德·考林是一位南非植物学家,他不那么招摇地建议,卡鲁地区应该重新公社化,这样就能再次把游牧民和野生动物吸引来。生态旅游和运动狩猎经济的设想与德博拉和弗兰克·波珀有着特殊的关联。

一个美国版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建立在废弃的农场和城镇上,是突破传统资本主义的繁荣与萧条循环周期的一种可持续模式。作为“野牛公地”概念的主要倡导者,波珀夫妇“预言会出现一支支驰骋在堪萨斯的远征队”。一些牧场主已经在组织与南非一样的能赚钱的狩猎远征队(1989:110,112;Cowling,1991)。

野牛或者跳羚公地的全面恢复需要政府大量购买边缘土地或地力耗尽的私有土地。雄心勃勃的新政拥护者曾经这么设想过,但在1930

年代落实时却受到限制，仅仅创建了面积只有几百万英亩的草场。比较可行的私人猎物养殖方式在南非已经建立起来，并在美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生态和经济理由正在改变人们的习惯。野牛能度过干旱和暴风雪的劫难而幸存下来，在贫瘠的草场上，它们啃食得比普通牛要轻，但更有效。野牛能掘开五英尺厚的积雪吃掉埋在下面的草（普
110 通牛用鼻子而不是蹄子），还能用身体组成的围栏保护其幼崽抵御春季风暴的袭击。

不是所有农场主都能利用这种有利条件。虽然猎物养殖在既有嫩枝又有牧草的德兰士瓦很受欢迎，但在比较寒冷的高草原上经营草场的地主发现，在普通牛肉市场仍然上涨的情况下，自然植被的单调使野生动物养殖难以获利。许多美国牧场主也表现得缺乏弹性。按一位对当地人所谓的“加利福尼亚化”（不是指郊区和购物中心的扩张而是指环境议程的推广）怀有敌意的南达科他牧场主的话说，就是“这些镇子变小了或者消失了无所谓，即使这里只剩下一个该死的农场主也无所谓——因为这个家伙会把牛肉价格提升到美国家庭愿意支付的水平”（*The Sunday Telegraph Magazine*, 6 June 1992: 53）。不过，牛肉的霸权并非牢不可破。野牛畜牧主（现有 1000 人左右）竭尽全力满足来自对既可口胆固醇含量又低的野牛肉排的需求（甚至远销到比利时）。为了在被制裁时期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据说南非曾把它的雄鹿肉伪装成东欧的鹿肉来出售。猎物制品市场的复苏容易让人回忆起十九世纪致使动物濒临灭绝的可怕情形，但现在或许能确保这些动物的增殖。

就像津巴布韦营火行动的非官方形式，放养野牛对那些渴望复兴奄奄一息的保留地经济、希望与昔日文化重新联系起来的土著美国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随着栅栏被拆除、土地集中并将公有的野牛（tata-nka）放养在牧场上，土著美国人就有机会挽回野性，恢复其与原始居民和公地思想相联系的良性畜牧传统。

然而，即使是在保护区，野牛数量的增加也不意味着荒野的回归。

尽管它们可以在牧区内自由活动，但仍然是农场的牲畜。凯文·科斯特纳的电影《与狼共舞》赞美人和自然中尚未驯化的野性，但出演影片中那群野牛的其实是南达科他州一个牧场的“驯化的”野牛群。重新自然化的荒野有着不止一丝驯化的痕迹。

111

参考文献和阅读书目

- Abbey, Edward (1977) ‘The second rape of the West’, in *The Journey Home: Some Words in Defense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Dutton.
- Brimblecombe, Peter (1987) *The Big Smoke: A History o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 London; Methuen.
- Bullard, Robert D. (1990) *Dumping in Dixie: Race, Class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Carson, Rachel (1962)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Coates, Peter (1989a) ‘Project Chariot: Alaskan roots of environmentalism’, *Alaska History*, 4 (2) (Fall), 1—31.
- (1989b) ‘Support your right to arm bears (and peccadillos): The higher ground and further shores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3 (3) (December), 439—446.
- (1993a) *The Trans-Alaska Pipeline Controversy: Technology, Conservation and the Frontier*, Fairbank; University of Alaska Press.
- (1993b) *In Nature’s Defense: Americans and Conservation*, Keele; Keele University Press/British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 Cock, Jacklyn and Koch, Eddie (eds) (1991) *Going Green: Peopl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South Africa*, Cape Tow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mmoner, Barry (1971) *The Closing Circle: Confronting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Cape.
- Cowling, R. (1991) 'Options for rural land use in southern Africa: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M. de Klerk (ed.), *A Harvest of Discontent: The Land Question in South Africa*, Cape Town: Institute for a Democratic Alternative in South Africa.
- Devall, Bill and Sessions, George (1985) *Deep Ecology*, Salt Lake City: Peregrine Smith.
- Dunlap, Thomas R. (1981) *DDT: Scientists, Citizens and Public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urning, Alan B. (1990) *Apartheid's Environmental Toll*, Worldwatch Paper 95 (May).
- Ehrlich, Paul (1968) *The Population Bomb*, New York: Ballantines/Friends of the Earth.
- (1970) 'Eco-Catastrophe!' in *The Environmental Handbook*, New York: Ballantines/Friends of the Earth.
- (1971) *Playboy* Interview in *Project Survival*, Chicago: Playboy Press.
- Fleming, Donald (1972) 'Roots of the new conservation movement',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6, 7—91.
- Fox, Stephen J. (1985) *The American Conservation Movement: John Muir and His Legac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Fugle, R. and Rabie, A. (eds) (1992)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South Africa*, Cape Town: Juta.
- Glacken, C. (1967)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rdon-McCutchan, R. C. (1991) *The Taos Indians and the Battle for Blue Lake*, Santa Fe: Red Crane Books.
- Gottlieb, Robert (1993a) 'Reconstructing environmentalism: complex movements, diverse roots',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7 (4) (Winter), 1—19.

- (1993b) *Forcing the Sp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 Graham, Frank (1970) *Since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Hays, Samuel P. (1987) *Beauty, Health and Permanenc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ley, B., Siegfried, R. and Sunter, C. (1989) *South African Environments into the 21st Century*, Cape Town: Tafelberg.
- Khan, Farieda (1994) ‘Environmentalism in a changing South Africa’,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York.
- (forthcoming) ‘Rewriting South Afric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role of the Native Farmers’ Associa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0 (4).
- Knox, Margaret L. (1993) ‘Their mothers’ keepers’, *Sierra*, 78 (March/April), 50—57, 81—84.
- LaDuke, Winona (1992) ‘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A North American primer’, *Akwe:kon Journal* (Summer), 52—71.
- Lear, Linda (1993) ‘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7 (2) (Summer), 23—48.
- Lutts, Ralph (1985) ‘Chemical fallout: 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radioactive fallout, an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Environmental Review*, 9 (Fall), 211—225.
- McAllister, P. A. (1989) ‘Resistance to “Betterment” in the Transkei: A Case study from Willowvale District’,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5 (2), 346—368.
- McGucken, William (1991) *Biodegradable: Detergent and the Environment*,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 Mbeki, Govan (1964) *The Peasants’ Revolt*,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elosi, Martin (ed.) (1980) *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

- 1870—193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1981) *Garbage in the Cities: Refuse, Reform and the Environment*, 1880—1980,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 (1993) ‘The place of the city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7 (Spring), 1—23.
- Merchant, Carolyn (1992) *Radical Ecology: The Search for a Livabl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 Munslow, Barry (1988) *The Fuelwood Trap: A Study of the SADCC Region*, London: Earthscan.
- Naess, Arne (1972)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 *Inquiry*, 16, 95—100.
- Nash, Roderick (1982)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hapter 16) in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The Rights of Nature: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Norwood, Vera (1993) *Made from This Earth: American Women and Na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Oelschlaeger, Max (1991) *The Idea of Wilderness: From Prehistory to the Age of Ecolog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latzky, L. and Walker, C. (1985) *The Surplus People: Forced Removals i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Ravan Press.
- Popper, Deborah and Popper, Frank (1989) ‘The fate of the plains’, in Ed Marston (ed.), *Reopening the Western Frontier*,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 Ramphela, M. (ed.) (1991) *Restoring the Land: Environment and Change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London: Panos.
- Schueler, Donald G. (1992) ‘Southern exposure’, *Sierra*, 77 (November/December), 42—49, 76.
- Sierra (1993) ‘A place at the table: *Sierra* roundtable on race, justice, and the environment’, 78 (May/June), 51—58, 90—91.

- Simmons, I. G. (1989)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 History,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 Steiner, Stan (1968) *The New Indians*, New York: Delta.
- Wilson, F. and Ramphela, M. (1989) *Uprooting Poverty: The South African Challenge*, Cape Town: David Philip.
- Wylie, D. (1989) ‘The changing face of hunger in southern Africa’, *Past & Present*, 122, 159—199.
- Zinn, Howard (1980)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Longman.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书页码, 见本书边码)

- Aborigines 土著, 4—5, 18, 19, 20
Adamson, George and Joy 亚当森, 乔治和乔伊, 83—84
Addo elephant national park 阿多大象国家公园, 77
Adirondack state park 阿迪朗达克州立公园, 47, 87
African Farmers Union 非洲人农民联盟, 99
African Hunt (1912) 《非洲狩猎》, 80
Agave (century plant) 龙舌兰(世纪植物), 41
Agriculture 农业, 6, 12, 36
Complementary farming system 补充性的种植制度, 53
Conservationist state 资源保护主义政府, 61—69
Dry farming system 旱作制度, 63
Fertilizers 化肥, 68
Mechanization 机械化, 67
Monocultural 单一种植, 55—56, 105
Plantation system 种植园制度, 55
Price volatility 价格不稳定性, 63—64
Regulation of 法规, 64
State subsidization 国家补贴, 67—68
Unlimited exploitation 无限的开发, 51—60
Agriculture, Department of 农业部, 60
Agroforestry 农林业, 48, 105
Ahwahneechee Indians 阿瓦尼基印第安人, 85
Akeley, Carl 卡尔·阿克利, 80
Alaska 阿拉斯加, 21, 72, 85—86, 99, 101, 112

- Alcatraz Island 恶魔岛, 102
Aleuts 阿留申人, 21
Algonkian Indians 阿尔冈昆印第安人, 36
American Cyanamid 美国氰胺公司, 106
American Fur Company 美国皮毛公司, 21
American Indians *see* Native Americans
美洲印第安人, 见土著美洲人
American Museum of National History
美国自然博物馆, 80
Anasazi 阿纳萨齐, 4
ANC government 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府, 103
Anderson, David and Grove, Richard
安德森, 大卫和格罗夫, 理查德, 89
Animals, domestic; see also Wildlife 家养动物, 参见野生动物, 18
Antelope 羚羊, 22, 24, 25, 31, 47, 54
Anti-nuclear movement 反核运动, 96
Apartheid 种族隔离制度, 100, 103, 114
Arbor Day 植树节, 44
Astor, John Jacobs 阿斯特特, 约翰·雅各布, 21
Atomic power 原子能, 95
Audubon movement 奥杜邦运动, 29
Australia 澳大利亚, 54
Baden-Powell, Robert S. S. 巴登—鲍威尔, 罗伯特, 79
Bairstow, Sam 贝尔斯托, 萨姆, 67
Barbier, Edward B. *et al.* 巴比尔, 爱德华等, 86
Bartlett, Richard 巴勒特, 理查德, 59—60
Beard, Daniel Carter 比尔德, 丹尼尔·卡特, 79
Beaver 海狸, 21, 22, 24
Beinart, William 贝纳特, 威廉, 18
Bennett, H. H. 贝内特, 63, 64
Betterment system 改良制度, 66, 67, 100
Big Open game reserve “大旷野”猎物保留地, 110
Biko, Steve 比科, 斯蒂夫, 7
Biocentrism 生物中心主义, 94
Park Politics 公园政治, 82—90
Bison, *see* Buffalo 野牛
Blixen, Karen 布里克森, 凯伦, 78
Bodry-Sanders, Penelope 博德利—桑德斯, 佩内洛普, 81
Boers 布尔人, 5, 17, 21, 23, 58
Boll Weevil 象鼻棉虫, 60
Bontebok 南非白纹大羚羊, 88
Boone, Daniel 布恩, 丹尼尔, 21
Boone and Crockett Club 布恩与克罗克特俱乐部, 29
Bophuthatswana 博普塔茨瓦纳, 103

- Botany 植物, 6
 Importation of 引进, 40—41
 Xenophobia 排外, 42
- Botswana 博茨瓦纳, 72, 86
- Brandis, Sir Dietrich 布兰迪斯爵士, 迪特里希, 45
- Brando, Marlon 白兰度, 马龙, 102
- Brimblecombe, Peter 布林布尔库姆, 彼得, 94
- Bring 'Em Back Alive* (1932) 《生擒》, 81
- Brink, Wellington 布林克, 韦林顿, 63, 64
- Brockway, Lucile 布罗克韦, 露西尔, 6
- Brogan, Hugh 布罗根, 休, 80
- Brooks, Shirley 布鲁克斯, 雪莉, 76, 84
- Brown, John Croumbie 布朗, 约翰·克劳姆比, 41, 44
- Bruce, Sir David 布鲁斯爵士, 戴维, 76
- Buck, Frank 巴克, 弗兰克, 81
- Buffalo 野牛, 19, 20, 22, 25, 37, 58, 80, 110, 111
- Buffalo Commons 野牛公地, 110
- Burroughs, Edgar Rice 伯勒斯, 埃德加·赖斯, 79
- Cape Forest and Herbage Protection Act 开普林草保护法, 44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5—6, 13, 69, 94, 109
- Carmichael, Stokely 卡迈克尔, 斯托克利, 7
- Carrington, Frederick 卡林顿, 弗里德里克, 26
- Carruthers, Jane 卡拉瑟斯, 简, 75, 77, 83
- Carson, Rachel 卡森, 蕾切尔, 95—96
- Catlin, George 卡特林, 乔治, 86
- Cattle 牛, 牝畜, 53, 54, 56, 57—58, 100, 111
- Cell, John 塞尔, 约翰, 7
- Cherokee Indians 切罗基族印第安人, 11, 66
- Civil rights 民权, 99
- Clark, William 克拉克, 威廉, 20
- Climate 气候, 9—10, 35, 43—44, 53, 61, 67
- Coates, Peter 科茨, 彼得, 85—86, 96
- Cock, Jacklyn and Koch, Eddie 科克, 杰克林和科赫, 埃迪, 88, 106
- Columbia Gardens 哥伦比亚公园, 59
- Comparative analyses 比较分析, 7—9, 108
- Conservation (自然资源) 保护, 13, 93—111
- Aesthetic 美学保护, 47, 98
- Agricultural 农业保护, 61—69
- of Forests 森林保护, 42—48

- Conserv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ct (South Africa) (1983) 农业
资源保护法(南非), 108
-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frican
Flora and Fauna (1933) 非洲动
植物保护协定, 83
- Cooper, J. Fenimore 库珀, J. 费尼莫
尔, 23, 25, 34
- Costner, Kevin 科斯特纳, 凯文, 111
- Cowboys 牛仔, 25, 39, 59
- Cowdrey, Albert 考德雷, 艾伯特, 10
- Cowling, Richard 考林, 理查德, 110
- Coyote 郊狼, 24, 82
- Crockett, Davy 克罗凯特, 达维, 21
- Cronon, William 克罗农, 威廉, 1, 5,
6, 58
- Crosby, Alfred 克罗斯比, 阿尔弗雷
德, 1, 2, 4, 9, 40, 53
- Cumming, R. G. 卡明, 25—26
- Dams 水坝, 47, 68—69, 104
-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 查尔斯, 20
- DDT滴滴涕, 95—96, 106
- De Kiewiet, C. W. 德基维特, 20
- De Vasselon de Régné, Count M. 德瓦
瑟洛, 45, 46
- Deforestation 森林滥伐, 4, 14, 39—40,
43, 47, 56
- Degradation 退化, 3, 13, 52, 100
- Denis, Armand; and Michaela 丹尼斯,
阿曼德和迈克拉, 81, 84; 83
- Desiccation theory 干化理论, 43—44,
49
- Devall, Bill and Sessions, George 德沃
尔, 比尔和塞申斯, 乔治, 108
- Disease 疾病, 8, 10, 22, 54, 60, 65, 79,
106—107
- Disney, Walt 迪斯尼, 瓦尔特, 81
- Drought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South Africa) 干旱调查委员会(南
非), 51, 61, 62
- Du Toit, H. S. D. 杜托依特, 62
- Dugmore, Arthur 达格莫尔, 阿瑟, 80
- Dust Bowl 尘暴, 51, 65, 66, 67
- Eagles 鹰, 31, 83
- Earth Day 地球日, 96, 107
- Earthlife Africa 非洲地球生命组织,
106
- Eastman, George 伊斯特曼, 乔治, 81
- Ecology 生态学, 2—3, 13, 83, 107
- Ecosystems 生态系统, 3
- Ehrlich, Paul 埃利希, 保罗, 96—97,
112
- Elephants 象群, 21, 22, 35, 77, 80, 84,
86, 110
- Elliot, William 艾略特, 威廉, 21
- Emerson, Ralph Waldo 爱默生, 拉尔
夫·沃尔多, 94
- Ends of the Earth Club 天涯海角俱乐

- 部, 27
- Environment 环境**, 13
- Damage to 环境破坏, 95—96
 - Films about 环境电影, 90
 - Issues concerning 涉及环境的问题, 1—2
 - Poverty and 贫困与环境, 105—106
 - Problems of 环境问题, 104—105
 - Regulation of 环境条例, 106—108
-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ct (South Africa) (1982)** 环境保护法(南非), 108
- Environmental history 环境史**
- Comparative approach 比较视角, 7—9
 - the Frontier 边疆, 9—14
 - Nature of 环境史的特点, 1—6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A) (EPA)** 环境保护署(美国), 101, 107
- Environmentalism 环境主义**
- Ideas and language of 思想和话语, 93—98
 - Popular 民众环境主义, 88
 - Social inequality 社会不平等, 98—108
 - Eucalyptus 桉树, 40, 41
-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大沼泽国家公园**, 76
- Faragher, John Mack** 法拉格, 约翰·麦克, 11
- Farmer's Weekly** 《农场主周刊》, 88
- Fashion 时尚**, 18, 21
- Fernow, Bernard** 费尔诺, 伯纳德, 45, 46
- Film-making 电影制作**, 80—81, 83—84
- Finch-Hatton, Denys** 芬奇—哈顿, 戴尼斯, 78
- Fire 火**, 4, 6, 18, 38, 47, 49
- Fitzsimons, F. W.** 菲茨西蒙斯, 83
- Flores, Dan** 弗洛雷斯, 丹, 22
- Fonda, Jane** 方达, 简, 109
- Forest and Stream** 《森林与溪流》, 27
- Forestry, Schools of 林学院**, 45
- Forests 森林**, 34—35, 102, 105
- Conservation 森林保护, 42—48
 - Doctrine of multiple use 多重利用的理念, 48
- see also Trees* 参见 树木
- Franklin, Benjamin** 富兰克林, 本杰明, 105
- Fredrickson, George** 弗雷德里克森, 乔治, 7
- Friedrich, Ernest** 弗里德里希, 埃内斯特, 112
- Friends of the Earth 地球之友**, 98
- Frontier 边疆**, 61
- Environment 环境**, 9—13

- Society 社会, 7—8, 25, 27, 59
Fuel 燃料, 104—105
Fur trade 毛皮贸易, 21—22
- Galton, Francis 加尔顿, 弗朗西斯, 20
Game Reserves 猎物保留地, 17, 29—
31, 72, 75, 76—77, 110
Game Reserves Commission, Report of
(South Africa) (1918) 猎物保护
区委员会的报告(南非), 75
Gannett, Henry 甘尼特, 亨利, 78
Garveyism 加维主义, 7
Giant's Castle game reserve 巨人堡猎物
保护区, 77
Gila National Forest 希拉国家森林, 48
Glacier national park 冰川国家公园,
80
Glacken, C. 格拉肯, 克拉伦斯, 93
Gordon-McCutchan, R. C. 戈登—麦
卡琴, 103
Gore, Sir St George 戈尔爵士, 圣乔
治, 26, 27
Gottlieb, Robert 戈特利布, 罗伯特,
94, 106
Grand Canyon 大峡谷, 74, 93, 98
Grassroots 草根, 94, 111
Grazing Frontiers 放牧边疆, 57
Great American Desert 美洲大沙漠, 51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64
Great Plains 大平原, 48, 57, 58
- Great Smo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大
烟山国家公园, 76
Great Zimbabwe 大津巴布韦, 4
Greenpeace 绿色和平组织, 98, 106
Grinnell, George Bird 格林内尔, 乔
治·伯德, 27
Grobler, Piet 格罗布勒, 皮特, 78
Grove, Richard 格罗夫, 理查德, 2,
37, 41, 43, 44, 47
Gump, James 冈普, 詹姆斯, 8
Guy, J. 盖伊, 57
- Haggard, H. Rider 哈格德, H. 赖德,
21, 79
Hall, T. D. 霍尔, 61, 62
Hamilton, Alice 汉密尔顿, 艾丽斯, 94
Harris, Joel Chandler 哈里斯, 乔尔·
钱德勒, 23
Harris, William Cornwallis 哈里斯, 威
廉·康沃利斯, 18, 25
Health *see* Disease 健康, 参见疾病
H. F. Verwoerd Dam 维沃尔德大坝,
68
Homelands (South Africa) 黑人家园
(南非), 65—66, 99—100, 101,
106, 114
Betterment of 改良家园, 66, 67
Hoover Dam 胡佛水坝, 66
Huberta (Hippopotamus) 休伯塔(河
马), 77

- Hunter-gatherers 狩猎采集者, 4, 10, 14, 19, 36
- Hunting 狩猎, 85, 101, 102
Controls on 狩猎控制, 27—31
Permissible 允许狩猎, 85—86
Pre-colonial 前殖民时代的狩猎, 17—20
Role of 狩猎的作用, 17
Settler 殖民者的狩猎, 20—27
Sports 运动型狩猎, 25—27, 32
- Imperial Forestry Conference (1935) 帝国林业会议, 48
- Imperial Forestry Institute 帝国林学院研究所, 45
- Incas (last Carolina parakeet) “印加斯”(最后一只卡罗来纳长尾小鹦鹉), 22
- India 印度, 43, 97
- Indian Claims Commission 印第安人诉讼委员会, 112
- Institute of the Rockies 落基山研究所, 110
-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1956) (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98
- Irrigation 灌溉, 47, 68, 98
- Ivory 象牙, 12, 19, 21, 86
- Jabavu, D. D. T. 贾巴武, 7, 99
- Jackal 豺, 18, 24, 61—62, 83
- Jacks, G. V. 杰克斯, 51
- Jackson, Jesse 杰克逊, 杰西, 107
- Jackson, William Henry 杰克逊, 威廉·亨利, 80
- Jacobs, Wilbur R. 雅各布, 韦尔布, 42
- Jefferson, Thomas 杰斐逊, 托马斯, 56
- Jennings, Francis 詹宁斯, 弗朗西斯, 11
- Johnson, Martin, and Osa 约翰逊, 马丁和奥萨, 80
- Jozini Dam 乔兹尼坝, 68
- Kaibab National Forest 凯巴布国家森林, 82
- Kalahari Gemsbok national park 卡拉哈里大羚羊国家公园, 77
- Kanthack, F. E. 坎特哈克, 43
- Karoo national park 卡鲁国家公园, 86
- Kerzner, Sol 凯兹纳, 索尔, 103
- Khama (Tswana chief) 卡玛(茨瓦纳人酋长), 28
- Khan, Farieda 卡恩, 法里达, 99, 107
- Khoikhoi 科伊科伊人, 57
- Khoisan 科伊桑人, 6, 8, 10
- Kimberley 金伯利, 12, 37, 40, 59
- King Kong (1933) 《金刚》, 81
- Knox, Margaret L. 诺克斯, 玛格利特, 104

- Kolodny, Annette 科洛德尼, 安妮特, 42
- Kruger, Paul 克鲁格, 保罗, 21, 27, 77
- Kruger national park 克鲁格国家公园, 76, 77, 83—84, 88
- !Kung 昆桑人, 36
- Kupperman, Karen O. 库伯曼, 卡伦, 11
- LaDuke, Winona 拉杜克, 威诺纳, 103
- Lamar, Howard and Thompson, Leonard 拉马尔, 霍华德和汤普森, 伦纳德, 8
- Land Grant colleges 政府赠予土地的学院, 赠地学院, 60
- Leatherstocking (alias Natty Bumppo/Hawkeye) 皮袜子(又名纳蒂·邦波/鹰眼), 23
- Lee, Richard 李, 理查德, 18, 36
- Leopold, A. Starker 利奥波德, A. 斯塔克, 86
- Leopold, Aldo 利奥波德, 奥尔多, 1, 28, 82, 94
- Lesotho 莱索托, 105
- Lewis, Meriwether 刘易斯, 梅里韦瑟, 20
- Lion 狮子, 18, 79, 83, 84, 88
- Living Desert, The* (1953) 《沙漠奇观》, 81
- Lobengula (Ndebele chief) 洛本古拉 (恩德贝勒人的酋长), 28
- Logging frontier 伐木边疆, 39
- London, Jack 伦敦, 杰克, 79, 80
- LULU 地方上不想要的用地项目, 107
- Lutts, Ralph 卢茨, 拉尔夫, 96
- McCarthy, Michael 麦卡锡, 迈克尔, 27
- McCloud, Janet 麦克劳德, 珍妮特, 102
- MacKenzie, John 麦肯齐, 约翰, 29, 79
- McPhee, John 麦克菲, 约翰, 89
- Malin, James 马林, 詹姆斯, 52
- Malone, Joseph J. 马罗恩, 约瑟夫, 39
- Mandela, Nelson 曼德拉, 纳尔逊, 90
- Marks, Shula 马克斯, 舒拉, 21
- Marsh, George Perkins 马什, 乔治·珀金斯, 2, 44
- Martha (last passenger pigeon) “玛莎” (最后一只信鸽), 22
- Mashantucket Pequot Indians 马山图克的皮魁印第安人, 103
- Merchant, Carolyn 麦茜特, 卡罗琳, 6, 29, 38, 46, 54, 106
- Michael, George 迈克尔, 乔治, 81, 83
- Miller, Alfred Jacob 米勒, 阿尔弗雷德·雅各布, 20
- Mining 采矿, 11—12, 37, 40, 59—60, 103—104
- Mintz, Sidney W. 明茨, 西德尼, 56

- Miwok Indians 米沃克印第安人, 85
Moffat, Robert 莫法特, 罗伯特, 37
Mopane Worm 莫伯尼幼虫, 48—49
Muir, John 缪尔, 约翰, 1, 47, 98
Munslow, Barry 蒙斯洛, 巴里, 105
- Naess, Arne 奈斯, 阿恩, 108
Nama People 纳玛人, 88
Namibia 纳米比亚, 86, 88
Narragansett Indians 纳拉干族印第安人, 38
Nash, Roderick 纳什, 罗德里克, 78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USA) (1969) 国家环境政策法(美国), 107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国家地理杂志》, 78, 80, 89
National Park Service 国家公园管理局, 76, 82
Native, use of term 土著, 术语的用法, 14
Native Americans 土著美洲人, 3, 8, 9, 12, 14, 18, 36, 99, 100—104
Natives Land and Trust Acts (South Africa) (1936) 土著土地与信托法(南非), 65
Nature 自然, 44, 90
 Concepts of 自然的不同概念, 3
 Film-making 电影制作, 80—81, 83—84
Impact on adventure stories 对冒险故事的影响, 79—80
Photography 摄影, 80
Transformation and destruction 转变(转型)与破坏, 108—111
Navajo Indians 纳瓦霍印第安人, 19, 66—67
New Deal 新政, 64, 104
New Ground《新土地》, 107
Niagara Falls 尼亚加拉瀑布, 74
Noble savage 高贵的野蛮人, 20
Ntombela, Magqubu 马古布·恩托贝纳, 85
- Oelschlaeger, Max 厄尔施莱格, 马克斯, 93
Operation Campfire 营火行动, 88, 111
Otter 水獭, 21
Ox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orestry 牛津大学, 林学系, 45
- Pappe, Ludwig 帕普, 路德维希, 44
Parks 公园, 31
 Biocentrism 生物中心主义, 82—90
 National 国家公园, 72, 77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参与式发展, 88—90
Permissible hunting in parks 准许在公园里狩猎, 85—86
Recreation 休闲, 79

- as Trustees of natural heritage 公园作为自然遗产托管者, 79
- Zoological preoccupations 偏重野生动物, 77
- Pelican Island (Florida) 鹈鹕岛保护区(佛罗里达), 30
- Pesticides 杀虫剂, 95—96
- Photography 摄影, 74, 80
- Phylloxera 葡萄病, 60
- Pigs 猪, 53—54
- Pilanesberg reserve 皮拉内斯堡保护区, 90
- Pinchot, Gifford 平肖, 吉福德, 45, 46
- Pine Ridge reservation 松树岭保留地, 101
- Pisani, Donald 皮萨尼, 唐纳德, 39
- Plains Indians 大平原的印第安人, 5, 19—20
- Polygamy of 一夫多妻制, 31
- Plettenberg Bay reserve 普莱腾堡湾保护区, 39, 43
- Plymouth Colony 普利茅斯殖民地, 42
- Poachers 偷猎者, 27, 28, 84—85, 86
- Pollution 污染, 93, 94—95, 100, 104, 105—107
- Pondoland revolt 庞多兰起义, 102
- Pongola reserve 庞戈拉保留地, 75
- Popper, Deborah and Frank 波珀, 德博拉和弗兰克, 110
- Population 人口, 10, 112
- Expansion 膨胀, 97, 101
- Removal 迁移, 100
- ‘Population bomb’ 人口爆炸, 97
- Powell, John Wesley 鲍威尔, 约翰·韦斯利, 61
- Pre-colonial societies 前殖民社会, 3, 19, 37, 53
- Predatory economy 掠夺经济, 109, 114
- Preservation, reasons for (非功利性) 自然保护, 理由, 75—77
- Preservation of Wild Animals, Birds and Fish in Africa; Convention for (1900) 非洲野生动物、鸟类和鱼类保护协定, 29
- Racism 种族主义, 7—8
- Social inequality 社会不平等, 98—108
- Rainey, Paul J. 瑞尼, 保罗, 80
- Ramphela, Mamphela 蓝菲勒, 曼菲拉, 68
- ‘Red Power’ movement “红色权力”运动, 102
- Redford, Robert 雷福德, 罗伯特, 69
- Reiger, John 雷格尔, 约翰, 27
- Renamo 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 86
- Reservations (USA) 保留地(美国), 66, 101, 102—104
- Resources 资源, 4
- Pressure on 对资源的压力, 101—

- 102
- Richardson, Peter 理查森, 彼得, 56
- Richtersveld national park 里克特草原国家公园, 88
- Rinderpest 牛瘟, 54, 60
- Ritvo, Harriet 里特沃, 哈里特, 25
- Robinson, Glen O. 罗宾逊, 格伦, 31
- Roosevelt, Franklin D. 罗斯福, 富兰克林, 63
- Roosevelt, Theodore 罗斯福, 西奥多, 27, 29, 61
-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 皇家鸟类保护协会, 29
- Runte, Alfred 伦特, 阿尔弗雷德, 76, 86
- Sabi reserve 萨比保留地, 75, 76
- San Bushman 桑布须曼人, 3, 11, 17, 18, 19, 21, 36, 54
- Savage Splendour* (1949)《野性的辉煌》, 81
- Scab 羊疥癣, 60, 65
- Schama, Simon 莎曼, 西蒙, 11
- Schueler, Donald G. 许勒尔, 唐纳德, 107
- Scott, Robert 斯科特, 罗伯特, 110
- Sears, Paul 西尔斯, 保罗, 51
- Selous, F. C. 塞卢斯, 26—27
- Sequoia national park 红杉国家公园, 74
- Seton, Ernest Thompson 西顿, 欧内斯特·汤普森, 79
- Settlement, patterns of 定居点的模式, 10—13
- Sheep 绵羊, 11, 18, 54, 56—57, 58, 61, 66, 82, 83, 110
- Shenandoah national park 谢南多厄国家公园, 65, 76
- Sherow, James E. 希罗, 詹姆斯·E., 37
- Shillington, K. 希林顿, K., 37
- Sierra* 《山岳》, 106
- Sierra club 山岳俱乐部, 90
- Simmons, I. G. 西蒙斯, 104
- Singwitsi reserve 辛格维齐保护区, 75, 76
- Sioux Indians 苏族印第安人, 5, 11, 17, 19
- Skead, C. J. 斯基德, 21, 77
- Slash and burn system 刀耕火种, 38
- Slaves/slavery 奴隶/奴隶制, 7, 9, 10, 12, 112
- Smallpox 天花, 10
- Smith, Wilbur 史密斯, 威尔布, 109—110
- Smokey the Bear 冒烟熊, 47
-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ild Fauna of the Empire (SPWFE) 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学会, 29
- Soil 土壤

- Conservation 保护, 62, 65
Erosion 侵蚀, 43, 51—52, 61, 62—
63, 64
Exhaustion 耗竭, 56
Soil Conservation Act (South Africa)
(1946) 土壤保护法(南非), 65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USA) 土壤
保护处(美国), 64
Soil Erosion Act (South Africa)
(1932) 土壤侵蚀法(南非), 64
Soil Erosion Service (USA) (1933) 土
壤侵蚀局(美国), 64
Somerset, Lord Charles 萨默塞特勋爵,
查尔斯, 26
Sons of Daniel Boone 丹尼尔·布恩之
子, 79
Sotho 索托人, 5
Sparrman, Anders 斯帕尔曼, 安德斯,
61
Springbok 跳羚, 31, 77, 83, 88, 109,
110
Steele, Nick 斯蒂尔, 尼克, 85
Steinbeck, John 斯坦贝克, 约翰, 63
Steiner, Stan 斯坦纳, 斯坦, 102
Stevenson-Hamilton, James 史蒂文
森·汉密尔顿, 詹姆斯, 30, 75,
79, 83
Stowe, Harriet Beecher 斯托, 哈丽雅
特·比彻, 111
Styles, Chris 斯泰尔斯, 克里斯, 49
Sugar 蔗糖, 55, 56
Sun City 太阳城, 90, 103
Tallgrass Prairie National Preserve 高草
草原国家保护区, 87
Taylor Grazing Act (USA) (1934) 《泰
勒放牧法》(美国), 64
Technology 技术, 5—6, 39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田纳西流域
管理局, 105
Thomas, Elizabeth Marshall 托马斯, 伊
丽莎白·马歇尔, 19
Thomas, Keith 托马斯, 基思, 30
Thor Chemicals 索尔化工公司, 106
Thoreau, Henry David 梭罗, 亨利·大
卫, 1, 26, 94
Timbavati 提姆巴瓦提, 88
Timber Culture Act (USA) (1873)
《植树法》(美国), 44
Tourism 旅游, 74, 83
Impact of automobile on 汽车对旅游
的影响, 78—79
Transformation 转型, 3, 108—109
Transvaal Game Preservation Association
德兰士瓦猎物保护协会, 29
Trapido, Stanley 特拉皮多, 斯坦利,
27, 84
Trees 树木, 6, 63
Domestic use of 家庭用途, 36—38
Invasive qualities of 树木的人侵性,

- | | |
|--|----|
| 40—41, 42 | 11 |
| Non-domestic use of 非家庭用途, | |
| 36—38 | |
| and People 树木与人, 35—42 | |
| and Religious beliefs 树木与宗教信仰, 37—38 | |
| <i>see also</i> Forests 参见 森林 | |
| Trekboers 布尔迁徙者, 11, 12 | |
| Trypanosomiasis 锥体虫病, 10, 54, 60, 76, 95 | |
| Tswana 茨瓦纳, 28, 37 | |
| Tuan, Yi - Fu 段义孚, 30 | |
| Tulalip Indians 图拉利普印第安人, 102 | |
|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特纳, 弗里德里克·杰克逊, 8, 11 | |
| Turner, James 特纳, 詹姆斯, 30 | |
| Turner, Ted 特纳, 泰德, 109 | |
| Tuskegee Institute (Alabama) 塔斯基吉学院(阿拉巴马), 99 | |
| Umfolozi game reserve 乌姆佛罗齐猎物保留地, 76 | |
|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98 | |
| Unita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 86 | |
| Van der Stel, Simon 范德施特尔, 西蒙, 42 | |
| Van Kirk, Sylvia 范基尔克, 西尔维亚, | |
| Van Keenen, R. J. 范基恩, R. J., 62 | |
| Vanderbilt, George 范德比尔特, 乔治, 44 | |
| Victoria Falls Power Company 维多利亚瀑布电力公司, 40 | |
| Voortrekkers 大迁徙的布尔人, 77 | |
| Walker, Eric 沃克, 埃里克, 8 | |
| Washington, Booker T. 华盛顿, 布克, 7 | |
| Washington, George 华盛顿, 乔治, 56 | |
| Water 水, 6, 63, 68 | |
| Watershed protection 流域保护, 47 | |
| Wattle 金合欢树, 40—41 | |
| Wattle and daub 抹泥枝条, 36—37, 49 | |
| Wheen, Francis 惠恩, 弗朗西斯, 79 | |
| White, Richard 怀特, 理查德, 11 | |
| Whitman, Walt 惠特曼, 沃尔特, 87 | |
| Whyte, R. O. 维特, 51 | |
| ‘Widowed land’ “寡妇地”(相对于“处女地”), 10 | |
| Wilder, Laura Ingalls 怀尔德, 劳拉·英格斯, 105 | |
| Wilderness 荒野, 3, 72, 89 | |
| Wilderness Areas 荒野保护区, 72 | |
| Wildlife 野生动物 | |
| Adaptability of 适应性, 24 | |
| Balance of species 物种平衡, 83 | |
| Extinction of 物种灭绝, 22—23, 41 | |
| Filming of 电影拍摄, 83 | |

- Management of 野生动物管理, 31—32
as Miscreant 作为恶棍, 24
as Predators 作为掠食者, 24, 30, 61—62
Preservation of 非功利性保护, 75—77
as Primary food supply 作为初级食物供应, 23
Protection of 野生动物保护, 28—31, 45, 87—88
Religious beliefs concerning 有关宗教信仰, 19
Willem Pretorius game reserve 威廉·比勒陀利乌斯猎物保护区, 88
Williams, Roger 威廉斯, 罗杰, 38
Wilson, K. 威尔逊, 37
Wilson, Monica and Thompson, Leonard 威尔逊, 莫尼卡和汤普森, 伦纳德, 20
Wolf 狼, 24, 82
Woodcraft Indians 印第安森林人, 79
Woodcraft Folk 森林人运动, 79
World Wildlife Fund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 98
Worster, Donald 沃斯特, 唐纳德, 5, 6, 62, 64
Xhosa 科萨人, 54
Yale Forestry School 耶鲁林学院, 45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黄石国家公园, 49, 74, 80, 93
Yosemite Falls 约塞米蒂瀑布, 90
Yosemite national park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 74, 78
Yosemite Valley 约塞米蒂峡谷, 85
Yukon 育空河, 89
Zero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零增长, 96
Zimbabwe 津巴布韦, 12, 86, 88, 111
Zinn, Howard 津恩, 霍华德, 102
Zoology 动物学, 81
Zulu 祖鲁, 11

人文与社会译丛

第一批书目

- | | |
|---|--------|
| 1.《政治自由主义》,[美]J.罗尔斯著,万俊人译 | 28.80元 |
| 2.《文化的解释》,[美]C.格尔茨著,韩莉译 | 24.50元 |
| 3.《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法]B.斯蒂格勒著,裴程译 | 16.60元 |
| 4.《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德]A.G.弗兰克著,高铭等译 | 13.60元 |
| 5.《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波]F.兹纳涅茨基、
[美]W.I.托马斯著,张友云译 | 9.20元 |
| 6.《现代性的后果》,[英]A.吉登斯著,田禾译 | 22.00元 |
| 7.《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美]M.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 | 14.20元 |
| 8.《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英]E.P.汤普森著,
钱乘旦等译 | 54.50元 |
| 9.《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波]F.兹纳涅茨基著,郑斌祥译 | 11.50元 |

第二批书目

- | | |
|---------------------------------|--------|
| 10.《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美]D.克兰著,赵国新译 | 13.00元 |
| 11.《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美]R.M.昂格尔著,吴玉章等译 | 15.20元 |
| 12.《后形而上学思想》,[德]J.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 15.00元 |
| 13.《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美]M.桑德尔著,万俊人等译 | 15.00元 |

14.《临床医学的诞生》,[法]M.福柯著,刘北成译	25.00 元
15.《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英]J. C. 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	15.80 元
16.《俄国思想家》,[英]I. 伯林著,彭淮栋译	35.00 元
17.《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加]C. 泰勒著,韩震等译	34.50 元
18.《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美]L. 施特劳斯著,申彤译	11.80 元
19.《现代性与大屠杀》,[英]Z. 鲍曼著,杨渝东等译	28.00 元

第三批书目

20.《新功能主义及其后》,[英]J. 亚历山大著,彭牧等译	15.80 元
21.《自由史论》,[英]J. 阿克顿著,胡传胜等译	27.00 元
22.《伯林谈话录》,[英]I. 伯林等著,杨祯钦译	23.00 元
23.《阶级斗争》,[法]雷蒙·阿隆著,周以光译	13.50 元
24.《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美]M. 沃尔泽著, 褚松燕等译	24.80 元
25.《大萧条的孩子们》,[美]G. 埃尔德著,田禾等译	27.30 元
26.《黑格尔》,[加]C. 泰勒著,张国清等译	43.00 元
27.《反潮流》,[英]I. 伯林著,冯克利译	48.00 元
28.《统治阶级》,[意]G. 莫斯卡著,贾鹤鹏译	30.80 元
29.《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德]J.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36.00 元

第四批书目

30.《自由论》(修订版),[英]I. 伯林著,胡传胜译	38.00 元
31.《保守主义》,[德]K. 曼海姆著,李朝晖、牟建君译	16.00 元
32.《科学的反革命》,[英]L. 哈耶克著,冯克利译	15.20 元

33.《实践感》,[法]P.布迪厄著,蒋梓骅译	22.60元
34.《风险社会》,[德]U.贝克著,何博闻译	17.70元
35.《社会行动的结构》,[美]T.帕森斯著,彭刚等译	43.50元
36.《个体的社会》,[德]N.埃里亚斯著,翟三江、陆兴华译	15.30元
37.《传统的发明》,[英]E.霍布斯鲍姆著,顾杭、庞冠群译	21.20元
38.《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美]L.施特劳斯著,申彤译	25.00元
39.《追寻美德》,[美]A.麦金太尔著,宋继杰译	18.90元

第五批书目

40.《现实感》,[英]I.伯林著,潘荣荣、林茂译	30.00元
41.《启蒙的时代》,[英]I.伯林著,孙尚扬、杨深译	17.00元
42.《元史学》,[美]H.怀特著,陈新译	33.50元
43.《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英]J. B.汤普森著,高铭等译	24.50元
44.《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加]J.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29.50元
45.《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美]R. K.默顿著,唐少杰等译	48.00元
46.《黑皮肤,白面具》,[法]F.法农著,万冰译	14.00元
47.《德国的历史观》,[美]G.伊格尔斯著,彭刚、顾杭译	29.50元
48.《全世界受苦的人》,[法]F.法农著,万冰译	17.80元
49.《知识分子的鸦片》,[法]R.阿隆著,吕一民、顾杭译	20.50元

第六批书目

50.《驯化君主》,[美]H. C.曼斯菲尔德著,冯克利译	28.00元
51.《黑格尔导读》,[法]A.科耶夫著,姜志辉译	45.00元
52.《象征交换与死亡》,[法]J.波德里亚著,车槿山译	22.50元
53.《自由及其背叛》,[英]I.伯林著,赵国新译	25.00元

54.《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英]I.伯林著,马寅卯译(即出)	
55.《运动中的力量》,[美]S.塔罗著,吴庆宏译	23.50元
56.《斗争的动力》,[美]D.麦克亚当,S.塔罗,C.蒂利著,李义中等译	31.50元
57.《善的脆弱性》,[美]M.纳斯鲍姆著,徐向东、陆萌译	55.00元
58.《弱者的武器》,[美]J.C.斯科特著,郑广怀等译	29.50元
59.《图绘》,[美]S.弗里德曼著,赵国新译(即出)	

第七批书目

60.《现代悲剧》,[英]R.威廉斯著,丁尔苏译	18.00元
61.《论革命》,[美]H.阿伦特著,陈周旺译	25.00元
62.《美国精神的封闭》,[美]A.布卢姆著,战旭英译,冯克利校	35.00元
63.《浪漫主义的根源》,[英]I.伯林著,吕梁等译	28.00元
64.《扭曲的人性之材》,[英]I.伯林著,岳秀坤译	22.00元
65.《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美]P.查特吉著,范慕尤、杨曦译	18.00元
66.《现代性社会学》,[法]D.马图切利著,姜志辉译	32.00元
67.《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英]R.伯恩斯坦著,黄瑞祺译	25.00元
68.《以色列与启示》,[德]E.沃格林著,霍伟岸、叶颖译	48.00元
69.《城邦的世界》,[德]E.沃格林著,陈周旺译	36.00元
70.《历史主义的兴起》,[德]F.梅尼克著,陆月宏译	48.00元

第八批书目

71.《环境与历史》,[英]W.贝纳特,P.科茨著,包茂红译	25.00元
--------------------------------	--------

72.《人类与自然世界》,[英]K.托马斯著,宋丽丽译	35.00 元
73.《卢梭问题》,[德]E.卡西勒著,王春华译	15.00 元
74.《男性气概》,[美]H. C.曼斯菲尔德著,刘玮译	28.00 元
75.《战争与和平的权利》,[美]R.塔克著,罗炯等译	25.00 元
76.《谁统治美国?》,[美]W.多姆霍夫著,吕鹏、闻翔译	35.00 元
77.《健康与社会》,[法]M.德吕勒著,王鲲译	35.00 元
78.《读柏拉图》,[德]T. A. 斯勒扎克著,程炜译	28.00 元
79.《苏联的心灵》,[英]I.伯林著,潘永强、刘北成译	28.00 元
80.《个人印象》,[英]I.伯林著,林振义译(即出)	

第九批书目

81.《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法]B.斯蒂格勒著,赵和平、印螺译	25.00 元
82.《抗争政治》,[英]C.蒂利著,李义中译	28.00 元
83.《亚当·斯密的政治学》,[英]D.温奇著,褚平译	21.00 元
84.《怀旧的未来》,[美]S.博伊姆著,杨德友译	38.00 元
85.《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丹]E.博斯拉普著,陈慧平译	30.00 元
86.《风景与认同》,[英]W. J.达比著,张箭飞、赵红英译	35.00 元
87.《政治革新与概念变化》,[美]T.鲍尔、J.法尔、R. L.汉森编, 朱进东译(即出)	
88.《大西洋的跨越》,[美]D. T. 罗杰斯著,吴万伟译(即出)	
89.《过去与未来之间》,[美]H.阿伦特著,王寅丽、张立立译(即出)	
90.《语言的未来》,[法]P.朱代·德拉孔布、H.维斯曼著,梁爽译(即出)	

有关“人文与社会译丛”及本社其他资讯,欢迎点击 www.yilin.com 浏览,对本丛书的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 renwen@yilin.com。

环境与历史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环境与历史》为审视公众关心的许多“绿色”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历史视角。

——《科技与社会通报》

令人钦佩……[此书的]分析水平使之成为环境史教材的上佳选择。

——《今日非洲》



ISBN 978-7-5447-0741-1



9 787544 707411 >

凤凰出版传媒网: www.ppm.cn

定价: 25.00 元